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推动区域服务业开放发展的研究 王晓红 谢兰兰 (005)

· 宏观经济 ·

论我国改革开放的时空辩证关系 韩功华 (027)

发展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对策建议 宋瑞礼 (035)

· 国际经济 ·

全球三大生产网络比较研究 李 娣 (043)

创新经济制高点的争夺：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本质及中国应对策略

曾志敏 陆芃樵 张若梅 (061)

我国自由港建设的机制及实践探索 王珍珍 陈 婷 赵富蓉 (073)

关税削减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

——基于地区与行业视角的分析 郑 鑫 薛同锐 (086)

奥运经济效应及我国发展冰雪经济的国际经验比较与借鉴 田 栋 (100)

• 名人观察 •

由疫苗安全到公共安全：忧思与治理

贾 康 欧纯智（112）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8）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6）



CONTENTS

Research on the model city of service outsourcing to promote the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ervice industry *Wang Xiaohong and Xie Lanlan* (005)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in China’ 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n Gonghua (027)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developing consumption – oriented economy
Song Ruili (03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ree largest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world *Li Di* (043)

Competition for the leading role of innova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Trump’ s
trade war against China and China’ s coping strategies
Zeng Zhimin , Lu Pengqiao and Zhang Ruomei (061)

Research into the mechanism and practice of free trade port construction in China
Wang Zhenzhen , Chen Ting and Zhao Furong (073)

The impact of tariff cuts on employment changes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perspectives
Zheng Xin and Xue Tongrui (086)

The Olympic economic effe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ice and snow economy in China *Tian Dong* (100)

From vaccine safety to public safety: worries and governance
Jia Kang and Ou Chunzhi (112)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8)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6)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推动区域 服务业开放发展的研究

王晓红 谢兰兰

摘要：示范城市是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产业规模高速扩张，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定位不断明晰，区域分工体系逐步建立，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示范城市作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创新高地，政策集成效应显著。31 个示范城市为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辐射带动服务经济发展、促进大学生就业、提升服务业国际化人才素质和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改革开放 服务外包 示范城市 服务业开放

作者简介：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谢兰兰，廊坊师范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小到大，规模不断扩大、领域逐步拓宽、区域范围不断拓展，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为推动我国服务业深度融入全球服务业分工体系，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和提升服务业的国际化水平，助推我国迈向服务经济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是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战略和路径一直是以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引领，因此，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与示范城市的主导引领作用密不可分。通过示范城市在体制机制、开放路径、服务模式、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先行先试探索和示范效应，在全国层面进行复制推广，并不断扩大示范城市的数量。目前，各具特色的 31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分布在东中西部不同的区域，为带动区域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和服务业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发展进程

按照规模发展和推动作用来衡量划分，我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初具规模（2006—2008 年）

2006 年，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将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列入国家规划，提出“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建设若干服务业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2006 年 10 月 13 日，商务部发布《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这是首次将服务贸易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纳入发展重点，并首次提出将“服务外包基地”作为重点发展对象，由此开启了我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发展的先河。2006 年 10 月 16 日，商务部下发《关于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的通知》，提出“十一五”期间在全国选择一批中心城市作为开展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基地城市，在宏观政策、规划设计、人才培养、招商引资、综合协调等方面给予支持，并通过专项扶持基金支持基地城市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人力资源培养、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等方面的建设。目标是在五年内建设 10 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 100 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并培育 1000 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商务部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认定工作全面展开。2006 年 10 月 23 日，商务部、信息产业部和科技部认定成都、上海、深圳、西安、大连 5 个城市为首批“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12 月 25 日将北京、天津、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 6 个城市认定为第二批“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2007 年和 2008 年又增列了合肥、长沙、广州、重庆、哈尔滨 5 个城市。截至 2008 年底，全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共 16 个。

（二）第二阶段：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快速发展（2009—2015 年）

200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发展目标，提出要转变经济贸易发展方式，优化出口结构，大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2009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将 16 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加上南昌、苏州、大庆、无锡共 20 个城市确定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2010 年初增列厦门市为第 21 个示范城市，继续在示范城市实行税收优惠、财政资金支持、实用人才培养、特殊劳动工时、金融支持、知识产权和信息保护等鼓励和支持措施，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服

务外包，建设若干服务外包基地”，进一步促进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发展。这一时期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得到快速发展，服务外包产业规模上了一个大的台阶，成为推动当地服务业开放的主要引擎、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及扩大大学生就业的主要渠道，有效带动了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业态创新。

政策引领是这一时期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国家和地方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见表 1）。

表 1 近年我国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时间	政策措施
2009 年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国办函〔2009〕9 号） 2. 商务部、工信部《关于境内企业承接服务外包业务信息保护的若干规定》（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2009 年第 13 号令）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36 号） 4. 海关总署、商务部《关于开展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进口货物保税监管试点工作的通知》（署加函〔2009〕435 号） 5.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信部、商务部、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鼓励政府和企业发包促进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财企〔2009〕200 号） 6. 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关于金融支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银发〔2009〕284 号）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支持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国际通信发展的指导意见》（2009 年 3 月 21 日）
2010 年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复函》（国办函〔2010〕69 号） 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示范城市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10〕64 号） 3. 工信部《关于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及简化外资经营离岸呼叫中心业务试点审批程序的通知》（工信部通字〔2010〕50 号） 4.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支持和鼓励服务外包企业海外并购的若干意见》（商合发〔2010〕358 号） 5. 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管理指引》（银监发〔2010〕44 号） 6. 海关总署、商务部《关于全面推广实施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进口货物保税监管模式的通知》（署加函〔2010〕281 号） 7.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56 号）
2011 年	1.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 号）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 号）

续表 1

时间	政策措施
2013 年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复函》（国办函〔2013〕33 号）
2014 年	1. 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14〕67 号） 2.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26 号） 3.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59 号）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这一时期，各示范城市根据本地区的发展状况，加大对服务外包产业的扶持力度，在体制机制及促进政策上日趋完善。

2009 年，上海市发布了《关于促进本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在财税政策方面，对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免税费，对重点企业、服务外包公共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平台的建设、企业国际资质认证、品牌建设等给予资金扶持；在人才保障方面，对录用新员工的企业和培训外包人才的培训机构给予相应的培训支持。对符合人才引进条件的人员在户籍、居住证申领、居留许可证出入境等方面给予便利。服务外包人才创业可享受融资担保、场地扶持和培训补贴。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行综合工时制；通过金融创新、支持企业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和上市、保险、简化外汇业务手续等加强对服务外包企业的金融支持。此外在检验检疫通关管理监管、前置审批和工商登记便利、知识产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予以保障。

2011 年，南京市发布了《关于加速推进南京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十二五”期间南京市国际服务外包产业设定发展目标，构建了完善的政策措施保障体系。在财税政策方面，市、区县及园区总投入不低于 50 亿元，用于服务外包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兑现各级服务外包产业扶持政策。对经过政府评定的服务外包载体平台给予资助。对符合认定条件的境内外知名外包企业落户，实行税收减免、优先安排项目用地等。资助企业参加展会和推介活动，奖励企业开展品牌建设，分档奖励骨干型企业，对申请国际资质认证的企业给予认证维护费用等。在人才保障方面，分档奖励经认定的国际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奖励具有示范效应、年度培养国际服务外包专业技术人才达到一定规模的公共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平台。在金融服务方面，鼓励外包企业加强和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开展服务外包合同质押贷款、股权融资，鼓励企业采用互保、综合授信等方式获得信贷、金融支持。市级创业投资引导资金优先支持具备一定发展潜力、高成

长性的国际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此外，在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保护、企业营商环境方面均出台了配套法律法规。

（三）第三阶段：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规模继续扩大和质量不断提升时期（2016 年至今）

2016 年 5 月，商务部发布《关于新增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通知》，根据全国各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情况并结合区域布局，统筹考虑东、中、西部服务外包发展，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有序扩容。新增了青岛、宁波、沈阳、长春、南通、镇江、福州（含平潭综合实验区）、南宁、乌鲁木齐、郑州等 10 个具有发展潜力的示范城市，引导市场资源继续向示范城市集聚。截至 2016 年，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已经发展到 31 个，初步形成了东、中、西部各具特色、竞争有序的发展局面。“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示范城市作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的高地，继续发挥先行先试示范带动作用，通过经验复制和政策推广带动全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表 2 我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发展情况

认定时间	示范城市（基地城市）
2006 年 10 月	成都、上海、深圳、西安、大连
2006 年 12 月	北京、天津、南京、杭州、武汉、济南
2007 年 10 月	长沙
2007 年 12 月	合肥
2008 年 7 月	广州、重庆、哈尔滨
2009 年 1 月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深圳、武汉、大连、南京、成都、济南、西安、哈尔滨、杭州、合肥、长沙、南昌、苏州、大庆、无锡
2010 年 2 月	厦门
2016 年 5 月	沈阳、长春、南通、镇江、福州（含平潭综合实验区）、南宁、乌鲁木齐、青岛、宁波、郑州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自“千百十工程”实施以来，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及所在省、市积极落实国家关于促进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政策，并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商务部 2016 年对 31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评估结果显示，目前多数城市已经出台了金融、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措施，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引资引智等方面成效显著。在内外部市场需求不断释放和政策支持体系日趋完善的背景

下，示范城市加快发展建设，对推动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成为推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2016 年，31 个示范城市承接服务外包执行额高达 999.2 亿美元，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657.9 亿美元，占全国市场的比重分别为 93.8% 和 93.4%，与 2015 年扩容前的 21 个示范城市相比，比重分别提高了 9.4 个百分点和 6.6 个百分点。在国家和地方对示范城市各项优惠支持政策措施促进下，新增的 10 个示范城市合同执行额 102.1 亿美元，占 31 个示范城市执行总额的 10.2%，部分城市如南宁和南通，增速达 91% 和 38%。

2017 年商务部等 5 部委下发《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充分发挥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的高地”，并做好示范城市的经验复制和政策推广，由此推动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不断创新，向高质量发展。

二、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主要发展特征

（一）产业规模高速扩张，业务结构不断优化

2010—2017 年示范城市承接的服务外包执行额、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以超过 30% 的年均增速增长。其中，服务外包执行额由 185.4 亿美元增长至 1154.3 亿美元，7 年间扩大了 5.3 倍；离岸外包执行额由 135.4 亿美元增长至 730.1 亿美元，7 年间扩大了 4.4 倍。从市场主体规模看，2010—2017 年示范城市累计新增服务外包企业 1.9 万家，新增从业人员 453.9 万人，2017 年全国占比分别为 59% 和 64.3%。说明我国以示范城市为载体的服务外包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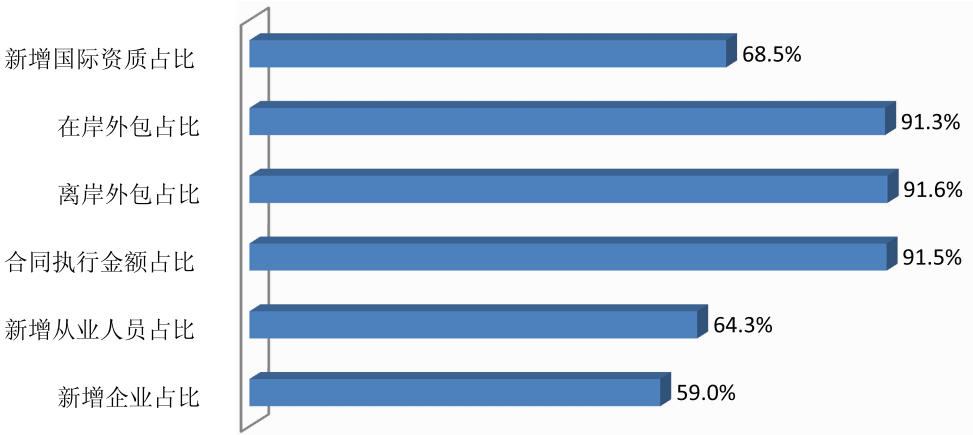


图 1 2017 年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业务全国占比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贸司。

表 3 2010—2017 年我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产业发展状况

单位：万人、亿美元、项

年份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示范城市个数	21	21	21	21	21	21	31	31
示范城市新增外包企业数	2625	2702	2541	2325	2200	1437	3226	2462
全国新增外包企业数	3756	4233	4220	3599	3309	5644	5506	4173
示范城市占比（%）	69.9	63.8	60.2	64.6	66.5	25.5	58.6	59.0
示范城市新增外包从业人员	54.3	66.5	71.5	56.6	49.4	24.2	84.2	47.2
全国新增外包从业人员	78.1	85.4	110.7	106.5	71.1	127.7	121.2	73.4
示范城市占比（%）	69.5	77.9	64.6	53.1	69.5	19.0	69.5	64.3
示范城市外包合同执行金额	185.4	294.4	417.2	556.9	711.9	816.3	999.2	1154.3
全国外包合同执行金额	198	323.9	465.7	638.5	813.4	966.9	1064.6	1261.4
示范城市占比（%）	93.6	90.9	89.6	87.2	87.5	84.4	93.9	91.5
示范城市离岸外包	135.4	219	305	402.9	497.1	561.2	657.9	730.1
全国离岸外包	144.5	238.4	336.4	454.1	559.2	646.4	704.1	796.7
示范城市占比（%）	93.7	91.9	90.7	88.7	88.9	86.8	93.4	91.6
示范城市在岸外包	47.9	74.5	112.2	154	214.8	255.2	340.9	424.2
全国在岸外包	53.5	85.5	129.3	184.4	254.2	320.5	360.5	464.7
示范城市占比（%）	89.5	87.1	86.8	83.5	84.5	79.6	94.6	91.3
示范城市 ITO	86.3	126.6	171.4	221.9	267.2	288.7	315.8	344.3
全国 ITO	91.7	138.7	188.7	248	293.5	316.9	330.5	364.2
示范城市占比（%）	94.1	91.3	90.8	89.5	91.0	91.1	95.6	94.5
示范城市 BPO	27.2	34.8	46.8	55.5	69.3	78.4	105.3	120.1
全国 BPO	29.3	38.2	52	63.5	79	91.7	116.6	129.3
示范城市占比（%）	92.8	91.1	90.0	87.4	87.7	85.5	90.3	92.9
示范城市 KPO	19.2	57.6	86.8	125.5	160.6	194.1	236.8	265.7
全国 KPO	20.2	61.5	95.6	142.6	186.7	237.8	257.1	303.3
示范城市占比（%）	95.0	93.7	90.8	88.0	86.0	81.6	92.1	87.6
示范城市新增国际资质	683	532	552	706	881	468	927	892
全国新增国际资质	1065	878	991	1190	1389	1491	1643	1303
示范城市占比（%）	64.1	60.6	55.7	59.3	63.4	31.4	56.4	68.5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贸司。

引领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是示范城市的重要使命。示范城市通过创新服务平台、培育引进创新创业人才、推广新技术应用等措施，带领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加速创新发展，实现由依靠人力低成本竞争的优势向依靠知识技术竞争的优势转变，服务外包业务结构高端化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从三大领域来看，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知识流程外包（KPO）业务份额由 2010 年的 65:21:14 调整为 2017 年的 46:16:38。在 ITO 业务内部，与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和云计算相关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业务比重也在提升。同时，外包产业内 ITO、BPO 和 KPO 的业务融合进一步带动了数字化、智能化的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综合性外包业务比重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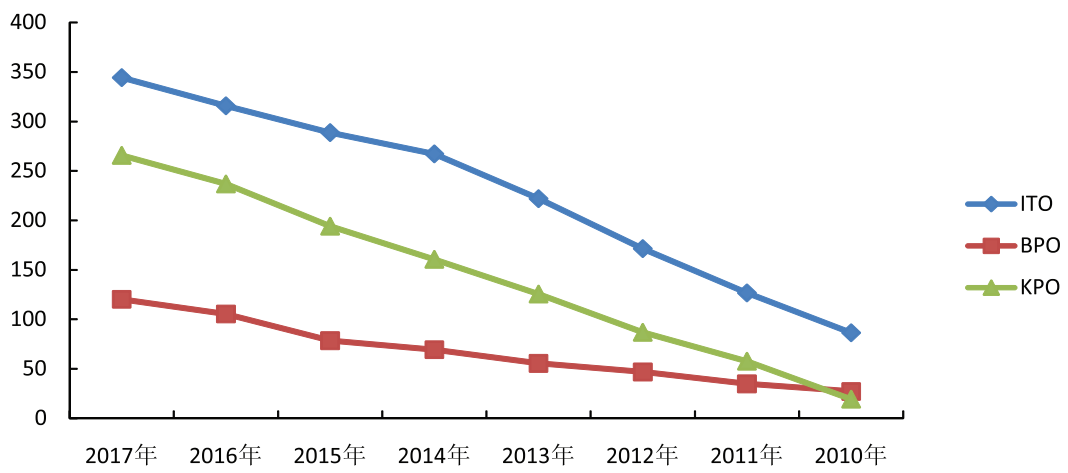


图 2 2010—2017 年示范城市 ITO、BPO、KPO 比重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商务部服贸司有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二）错位竞争和差异化发展态势更加鲜明，分工体系逐步建立

以示范城市为核心的服务外包政策体系，不断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速集聚扩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及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引导下，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产业由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到差异化发展、错位竞争，各示范城市立足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加强对特色产业的发展引导，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产业定位不断明晰，在各自特色业务领域成为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对区域内服务外包带动效应逐步显现，并形成了以示范城市为中心，周边城市为辅助的区域分工协作体系。如，北京服务业基础雄厚，总部经济发达，产业和人才的高端化、国际化优势在全国突出，重点打造信息技术、研发设计、客户服务与财务共享中心；上海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医药研发服务方面领先全国；杭州专注向通信服务、物联网研发、金融服务外包等领域拓展；苏州在工业设计和工程技术方面形成了较强竞争力；大连重点打造亚太软件和服务创新中心，形成了应

用软件开发、共享中心、产品研发等特色领域；哈尔滨重点发展工业研发、云计算、动漫等领域服务外包；大庆是示范城市中依靠服务外包产业实现资源转型的典型城市，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石油石化软件与外包服务、金融外包服务等多业态竞相发展的态势，并推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服务外包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十分突出。如，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为中心，全国规模最大、集聚程度最高的服务外包城市群。宁波、镇江、南通、徐州也形成了高速发展态势。以示范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周边城市共同发展的区域服务外包产业生态系统。如，通过北京市的辐射效应带动了石家庄、保定、唐山等河北省周边城市服务外包的发展。通过上海的辐射，苏州、昆山形成了以金融服务外包为特色的发展布局。

表 4 我国示范城市的服务外包特色领域

示范城市	特色领域
上海	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医药研发服务
深圳	嵌入式软件系统、大型行业（电信、金融、制造业）应用软件与服务、IC 设计、互联网服务业与软件出口外包
大连	保税研发测试中心全国首创、对日外包服务发展基础雄厚
济南	交通运输业、零售和批发、能源、信息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等领域
西安	嵌入式应用软件开发、面向装备制造、能源、医疗等领域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工程和技术研究、技术转让、工业设计行业应用软件的研发以及数据分析
哈尔滨	工业研发、云计算、动漫等领域服务外包
杭州	通信服务、物联网研发和金融服务外包
合肥	软件研发、软件技术服务、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运维、电商平台服务、IT 咨询服务、IT 解决方案、检验检测外包服务、工业设计外包
苏州	跨国公司共享中心、工业设计、软件研发、生物医药研发、信息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 服务、信息运维
大庆	金融服务外包和石油石化技术外包
厦门	互联网营销推广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采购外包服务、软件研发外包 及运维
沈阳	工业软件研发、云计算、物联网、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移动位置服务等
长春	软件研发、汽车电子、金融证券、政府服务、电力设计、水利水电设计、汽车焊装夹具 等方面的工业设计

续表 4

示范城市	特色领域
南通	软件研发、软件技术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医疗服务、财务与会计审计服务相关的专业技术服务、工业设计和工程技术外包
镇江	船舶设计、船舶控制、智慧物流、电气检测、集成电路测试、医药检测、视光学等第三方检验检测外包服务
宁波	服务港口经济，发展物流供应链管理、国际航运服务、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工业设计
福州	软件研发、信息系统运维、集成电路及电子电路设计
乌鲁木齐	面向中西亚地区的小语种多语言软件研发、安防技术服务、动漫网游设计、信息系统维护、电子商务公共平台服务

资料来源：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2017》。

（三）以园区集聚服务外包企业，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力

示范城市对服务外包产业的集聚和示范引领作用主要是通过服务外包园区来实现的。在示范城市内，各类园区高度集聚资源、人才、技术、政策等创新要素，在集聚服务外包企业、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创新服务外包模式、集成服务外包政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在一线示范城市，服务外包园区实现了 80%~90% 以上的服务外包业务收入。大量外包企业通过入驻园区，享受政策、人才、信息、技术等平台资源优势，这些企业通过集聚高端生产要素，在商业模式和技术领域不断引领创新，推动所在城市和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反哺地方经济。

表 5 我国部分示范城市服务外包园区发展概况

示范城市	园区概况
北京	5 个服务外包示范区：海淀区、昌平区、朝阳区、大兴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典型园区：中关村软件园 中关村软件园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专业化园区。截止到 2017 年底，园区集聚了联想（全球）总部、百度、网易北京研发中心、腾讯（北京）总部、新浪总部、滴滴总部、亚信科技、科大讯飞、华胜天成、文思海辉、博彦科技、软通动力、中科大洋、启明星辰、中核能源、广联达等逾 600 家国内外知名 IT 企业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总部经济达 80% 以上，在园从业软件工程师达 7.3 万人，拥有千百十工程企业 28 家、国家规划布局重点软件企业 28 家、跨国公司研发总部 7 家、上市企业（含分支机构）59 家、中国软件百强企业 15 家、收入过亿企业 66 家。2017 年，园区企业总产值达到 2094.4 亿元，总利润 194.3 亿元，创历史新高

示范城市	园区概况
上海	5 个服务外包示范区：浦东新区、长宁区、新静安区、黄浦区和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12 个专业园区；典型园区：浦东软件园、张江生物医药基地 浦东软件园：2016 年，拥有企业 1594 家，总产值超过 660 亿元，浦软孵化器新引进项目 78 个，融资企业数和融资额均创历史新高 张江生物医药基地：集聚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 CRO 企业，提供药物产品开发、临床前试验、临床试验、药物注册申请与信息咨询等，几乎涵盖药物研发全过程。产品服务面涉及肿瘤药物、代谢病药物等多个重点研究领域，是国内 CRO 企业群体发展最成熟、业务覆盖范围最完整的区域之一
哈尔滨	8 个服务外包园区；典型园区：中国云谷 中国云谷集聚企业 300 余家，签约投资亿元以上重点项目 13 项，协议投资额 310 亿元，初步形成了云数据中心、电子商务、大数据与计算应用四大板块
苏州	1 个国家级示范基地：苏州工业园区；2 个升级示范城市：昆山市和太仓市；9 个省级示范区；典型园区：苏州国际科技园 苏州国际科技园是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中国欧美软件出口工程试点基地、中国留学人员苏州创业中心、服务外包示范基地以及苏州市云计算产业基地。集聚了云计算、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数码娱乐和行业应用等高新科技特色产业集群
杭州	2 个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9 个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园区 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园区：2016 年，两个示范园区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38.8 亿美元，占杭州离岸执行额的 66.1%，涉及信息与软件、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生物医药、金融服务、文化创意设计等行业
广州	3 个服务外包示范区：南沙经济开发区、黄花岗科技园、天河软件园；1 个省级示范区；典型园区：天河软件园 天河软件园：园区集聚了 1800 多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613 家，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万元以上企业超过 650 家，超亿元以上企业超 170 家。园区聚集了总部企业 28 家，境内外上市企业（含新三板挂牌企业）累计 63 家，2017 年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1540 亿元
济南	10 个服务外包园区；典型园区：齐鲁软件园 齐鲁软件园：截止到 2016 年底，园区集聚企业 2300 家，实现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 1281 亿元，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 4 亿美元，入园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达 350 家，服务外包企业 319 家，外包从业人员 7.5 万人
合肥	6 个省级以上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典型园区：合肥高新区 合肥高新区是安徽省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重点开展软件研发、信息技术、动漫及网游设计研发、检验检测等服务外包业务
天津	3 个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开发区、保税区和高新区）和 6 个外包园区；典型园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业务主要集中在软件开发、研发设计、信息安全、商务流程、金融后台、人力资源、医药研发等外包领域，境外业务主要来自日本、德国和美国

续表 5

示范城市	园区概况
大连	10 个软件服务外包园区；典型园区：大连软件园 大连软件园：目前已经集聚中外软件企业近 80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 48 家，2016 年软件产值近 700 亿元。园区企业主要从事应用软件开发和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和资源共享中心、嵌入式软件开发和外包、产品研发中心、工业设计等信息技术、IT 服务
大庆	5 个服务外包专业园区；典型园区：大庆服务外包产业园 大庆服务外包产业园：园区入驻企业 750 家，外包企业 450 家，从业人员 2.1 万人；2011—2014 年，连续 4 次被国家工信部、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联盟评为最具发展潜力园区和智慧园区。园区重点发展石油石化外包服务、金融外包服务、云服务、物联网及嵌入式系统、创意服务、电子商务等服务外包行业领域。2016 年，园区企业实现收入超百亿元，其中外包类收入超 50 亿元

资料来源：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2016》《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2017》。

通过园区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有效提升了区域内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各示范城市不仅形成了一批特色产业高地和特色产业集群，而且培育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能力和龙头作用的服务外包领军企业。如，我国服务外包领军企业东软、文思海辉、软通动力、微创软件等，以及历年服务外包百家成长型企业，绝大部分孵化、成长和壮大于示范城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龙头企业总部选择在示范城市的外包园区落户。以北京中关村软件园为例，目前已有 400 多家 IT 企业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集聚，总部经济超过 80%。

（四）政策不断创新，政策集成效应显著

“十三五”时期，国际国内环境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国内经济增长趋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服务外包产业成为服务业结构优化和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和地方高度重视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密集出台各项改革措施和创新举措，示范城市作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创新高地，在政策合力的作用下，政策集成效应显著。

各示范城市积极探索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开放路径、服务模式、财税政策、服务便利化政策措施。并结合本地实际从“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创新创业”“互联网+”“大数据”等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谋划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在机制上，发展基础好的中心城市通过区域合作联动、协同发展机制辐射带动周边。如江苏省服务外包产业的“一带一群”布局，以南京、苏州、无锡 3 个国家级服务外包示

范城市为核心，形成以 KPO 为主要发展方向的“苏南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带”和以知识流程、业务流程外包共同发展的“江苏沿江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集群”。再如经济技术协同发展战略深入推进过程中形成的两市一省产业分工协作机制。

在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的同时，各示范城市结合地方实际在财税、金融、便利化等方面完善配套措施。杭州先行先试主动探索创新政策体系。在创新试点试验区争取主管部门对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外包、互联网金融服务外包等重点领域实行特殊审批。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创新海关检验检疫监管模式，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所需的样机、试剂、样本等简化审批程序。构建政府数据开放、政府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法律体系，完善政府信息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扩大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积极研究制定杭州互联网+服务外包、电子商务服务等标准体系，展开信息服务质量、信息服务安全、数据开发与共享等方面的标准研究工作。江苏省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主导制定的《金融外包服务规范》是我国首个金融外包领域省级地方标准。对推进花桥和江苏省金融外包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福州市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适应服务外包产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自贸区福州片区积极进行两岸金融合作的金融改革创新，搭建对台金融服务专业化平台，14 家区内银行率先开启台资台企信用查询系统，片区内金融机构通过台湾地区信用报告查询系统，在大陆率先开展台企台胞在台湾地区信用记录查询业务。马尾区启动了全国首个跨境电商同业联合担保改革试点，减轻企业通关担保压力，提升资金周转效率。

（五）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

2016 年商务部对 31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发展状况开展了综合评价工作。综合评价共涉及 5 个一级指标、20 个二级指标和 57 个三级指标（各级指标设定情况如表 6 所示）。从产业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人力资源、要素成本和政策因素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评价结果表明，示范城市各具不同产业发展优势，产业竞争力提升显著。南京、苏州、上海、无锡、广州、杭州、北京等城市在产业规模、企业规模及技术先进性等方面表现突出，雄厚的产业基础为这些城市释放集聚效应，进一步吸引优质企业和优质业务集聚，以及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发展创造了条件。上海、济南、天津在吸纳和培养外包人才方面各具特色。比如，上海留学人员和外籍员工数量庞大；济南依托高校培养大量外包专业毕业生，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人才保障；天津的服务外包培训机构数量多，据统计，仅 2015 年，通过天津大学软件学院、中软卓越、服务外包培训中心、东软睿道等服

务外包培训机构培训人员就高达 3 万余人次。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东部城市陆续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重视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满足服务外包企业跨境交付的网络条件。从要素成本看，中西部城市的综合要素成本优势明显。较低的用工、用电、电信、住房成本，对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一定吸引力。以成都为例，企业运营成本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又较其他中西部城市对人才更具吸引力，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的外包产业中心城市。在政策措施方面，多数城市都已出台金融、创新、信息保护等相关支持鼓励政策。越是产业发达地区，政策扶持力度越大、越完善，且政策与时俱进，匹配本地资源特色，适应当地产业发展阶段。值得一提的是，以青岛为代表的新增示范城市竞争力提升迅速。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2016 年，青岛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年均增长 34.8%，服务外包企业由 390 家发展到 1000 余家，吸纳就业人数由 7.2 万人增加到 23 万余人。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使青岛连续四年成为中国服务外包最具潜力的城市。

表 6 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一) 产业发展情况	1. 服务外包企业	1.1 服务外包企业；1.2 有离岸业务的服务外包企业；1.3 新增服务外包企业；1.4 高技术服务业企业；1.5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1.6 年营业额 500 万美元及以上的企业数；1.7 从业人员 500 人以上的企业数
	2. 业务规模	2.1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2.2 承接在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2.3 高技术服务业产业收入
	3. 税收情况	3.1 服务外包企业实缴税额
	4. 企业资质	4.1 通过国际资质认证企业；4.2 企业通过的国际资质认证数量
	5. 服务外包园区	5.1 开展服务外包业务的专业园区；5.2 园区服务外包收入占城市服务外包收入的比重
(二) 基础设施状况	6.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水平	6.1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6.2 移动互联网用户
	7. 电力设施水平	7.1 用户年平均停电时间
	8. 交通运输水平	8.1 民航客运量；8.2 铁路客运量
	9. 公共服务水平	9.1 公共服务平台数量
(三) 人才培养与就业	10. 就业情况	10.1 服务外包企业从业人员；10.2 服务外包企业新增就业人员；10.3 新增大学生就业人员；10.4 新增经培训后就业人员；10.5 留学归国人员；10.6 外籍员工；10.7 高校服务外包相关专业毕业生
	11. 培训/实训情况	11.1 服务外包培训机构；11.2 服务外包培训机构培训/实训人员

续表 6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2. 人才储备情况	12.1 大学生实习基地；12.2 服务外包企业接纳实习大学生；12.3 高校毕业生见习基地；12.4 服务外包企业接纳见习高校毕业生；12.5 高等院校数量；12.6 高校毕业生数量
(四) 要素 成本	13. 用工成本	13.1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3.2 社会保险交纳金额
	14. 商务成本	14.1 电信费用；14.2 用电平均价格；14.3 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五) 政策 措施	15. 财政政策	15.1 中央财政资金实际拨付金额；15.2 地方财政资金实际拨付金额；15.3 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培训人数；15.4 政府部门购买专业服务金额
	16. 金融政策	16.1 出台扶持服务外包企业投融资政策；16.2 出台扶持服务外包企业融资担保补助政策
	17. 支持创新政策	17.1 出台鼓励和引导企业研发创新政策；17.2 出台鼓励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
	18. 税收优惠	18.1 企业享受税收优惠金额；18.2 增值税免税销售额；18.3 企业所得税优惠金额；18.4 按 15%低税率减免所得税金额；18.5 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超过 2.5%的企业数量；18.6 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超过 2.5%的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总额
	19. 知识产权保护	19.1 知识产权司法案件结案率；19.2 知识产权保护地方性法规
	20. 信息安全保护	20.1 出台互联网信息安全/商业数据保密相关的地方性政策法规

资料来源：商务部。

按照表 6 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综合得分的平均值调整为 100 分。其中，“产业发展情况”的平均值为 40 分，“基础设施状况”的平均值为 15 分，“人才培养培训与就业”的平均值为 20 分，“要素成本”的平均值为 10 分，“政策措施”的平均值为 15 分。综合得分高于 100 分，说明产业总体发展高于平均水平；反之，综合得分低于 100 分，说明产业总体发展低于平均水平。

按照综合评价得分情况进行排序，可以将 31 个示范城市竞争力状况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得分高于 100 分，按照得分高低分别是南京、上海、广州、苏州、无锡、北京、杭州、深圳、济南、青岛、重庆、武汉、成都和南昌 14 个城市；第二层次得分在 60～100 分之间，分别是天津、宁波、大连、郑州、合肥、长沙、厦门、西安、南通和哈尔滨 10 个城市；第三层次得分低于 60 分，分别是沈阳、镇江、南宁、福州、长春、大庆和乌鲁木齐 7 个城市。

从总体看，原 21 个示范城市由于有较长时间的政策和资源优势叠加，综合得分普遍

高于新增示范城市。在第一层次的 14 个城市中，仅有青岛为新增示范城市。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示范城市的综合实力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平差异不大。按照平均水平排序，18 个东部地区示范城市综合实力最强（115.9 分），8 个中部地区示范城市次之（79 分），5 个西部地区示范城市最低（75.9 分）。

表 7 各示范城市综合排名情况

层次	城市	得分
第一层次	南京、上海、广州、苏州、无锡、北京、杭州、深圳、济南、青岛、重庆、武汉、成都、南昌	>100 分
第二层次	天津、宁波、大连、郑州、合肥、长沙、厦门、西安、南通、哈尔滨	60~100 分
第三层次	沈阳、镇江、南宁、福州、长春、大庆、乌鲁木齐	<60 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商务部评估结果整理而得。

三、示范城市对于推动服务业开放发展的作用

（一）推动当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一是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增长对于推动当地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服务外包的专业化生产模式促进专业化分工，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分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向服务经济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专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发展。据测算，2015 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0.56 个百分点，产业规模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7.1%，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约为 13.6%。^① 2017 年，示范城市占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 92%，因此是我国服务业开放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助推力量。

二是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有力推动了当地产业结构转型。示范城市的产业基础各不相同，如大庆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昆山则以加工贸易为主。随着原有发展模式所依靠的发展动能释放殆尽，服务外包产业逐渐成为这些地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大庆以石油工业闻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成为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标杆。自 2009 年被确定为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发展至今，大庆的服务外包产业已经初具规模，2017 年外包执行金额 17.74 亿美元，其中离岸金额 15.17

^①佚名：《服务外包产业规模扩至千亿美元》，《经济参考报》2016 年 9 月 12 日。

亿美元，从业人员 8.43 万人。形成了以大庆服务外包产业园（国家服务外包产业示范基地）、大庆软件园（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电子商务产业园（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油化技术服务产业园（以大庆油田设计院为核心）等专业园区为载体的产业集群。

从产业发展特色看，大庆服务外包产业已形成油化技术服务（油田公司、国际工程公司、石油管理局）、金融外包服务（华拓数码、大庆京北方、51 信用卡）、软件及云服务（金桥信息、恒通电子、华创软件、中环电控等）、物联网及嵌入式系统（三维科技、英辰软件、华美科技、紫金桥、锦华联、百米马、明达维尔等）、创意设计服务（大宇宙、标准设计院、美图建筑等）、休闲娱乐设计研发服务（思特传媒、纳奇网络等）和电子商务（大庆卓创、仓买聚宝网、黑龙江网库等）等业务板块。其中油化技术服务和金融服务外包叫响全国、形成鲜明特色，华拓数码和京北方占据了国内金融服务外包领域 85% 以上的市场份额。目前，大庆离岸业务涉及石油工程领域的技术服务外包、软件出口、住宅建筑设计服务、采购外包服务等领域。服务地区主要分布在日本、伊拉克、伊朗、沙特、苏丹、南苏丹、蒙古、哈萨克、土库曼等国家。

三是示范城市服务外包发展促进了当地制造服务化、传统服务现代化的升级步伐。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陆续出台了“创新创业”“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大数据”等战略，配套政策密集落地。尤其是在“中国制造 2025”强国战略的推动下，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大幅增长，服务业和制造业创新融合发展，带动了服务业的增长与升级。

示范城市作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高地，集聚了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先发优势，借助国家战略叠加效应产生的红利，正在迎来全方位提升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动了当地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转型。如，长春是中国的汽车城，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过程中依托服务外包产业，促进汽车制造业向研发、服务两端延伸，着力提升生产制造环节的智能化和科技化水平。经过几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吉林大学、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技术中心、启明信息等高校和科研单位为技术支撑，以嵌入式软件开发为核心，以汽车电子控制及车载电子为主导产品，通过与欧洲、日本等服务外包企业的合作，打造出在全国具有带动作用的汽车电子产业集群，被科技部列为“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互联网+”战略实施以后，各示范城市服务外包市场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服务外包业务门类和领域急速扩张，尤其是在岸市场在“互联网+”的驱动下高速发展，未来前景广阔、整体“强大优”的企业均与“互联网+”高度关联。据统计，目前杭州市服务外包企业涉“互联网+”占比超过 70%。镇江利用“互联网+物流+工业”的理念，首创了中国无车无船主承运人的货物运输场内交易电商新模式，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在全国各地发展地区代理性质的会员管理单位 800 多家。2016 年，发展车船和货方会员数、在线交易货运量同比增长双超 20 倍，交易货值超 600 亿元。

（二）辐射带动区域服务经济发展

各示范城市之间区域合作联动、协同发展，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区域内产业规划联动模式。在区域内，各省市政府积极引导省内服务外包城市加强合作。如，江苏省提出要建设服务外包产业“一带一群”发展布局，辐射带动其他地区的服务外包产业。以南京、苏州、无锡 3 个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核心，发挥上述 3 个城市与常州、镇江的协调联动，形成以 KPO 为主要发展方向的“苏南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带”，以及与南通、泰州等城市的协调联动，形成以知识流程、业务流程外包共同发展的“江苏沿江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群”。

二是区域之间产业分工协作模式。随着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序推进，一些示范城市开始谋划区域间服务外包产业的整体发展布局。比如，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两市一省的外包产业布局各有侧重。京津作为离岸外包主要承接地，积极承接跨国公司的发包业务。同时，北京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逐步向河北省有序转移服务外包产业，形成了与河北省的垂直分工关系，由此带动河北省服务外包产业跨越式发展。2014 年 5 月，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成立。这是海淀园在全国建立的首家分园，也是河北省对接京津的首个综合性高科技园区。目前中国北京（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秦皇岛分园、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秦皇岛高新技术产业园等园区已经相继开园。园区重点围绕节能环保、电子信息（大数据）、服务外包、生物医药等产业，与海淀园展开深度对接合作。自开园以来，累计引进项目 100 多个。北京秦皇岛千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秦皇岛铭软科技有限公司、秦皇岛华安保信息有限公司等，以及 e 谷创想空间、海淀创业园秦皇岛分园项目已落地运营。

三是资源整合与共建共享模式。依托第三方公共平台、产业联盟，在示范城市间实现公共服务联动、创新孵化环境联动，形成发展合力。例如，合肥与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合作共建创新创业园，在科技企业孵化、资本运作、专业人才培养、技术溢出、营造创业氛围等多方面开展合作，为服务外包企业和机构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立体式的专业服务，加速外包产业的有效融合转移。

四是比较优势联动。示范城市在服务外包细分领域各有擅长，通过城市间合作，依托各自比较优势，带动区域内整体产业提质增效。例如，长江中游城市群，跨越湖北、

湖南、江西三省，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城市群，依托武汉、长沙、南昌 3 个示范城市在研发、文化创意、工程设计等外包领域的不同特色，集中各自优势资源深耕细分领域，并依托各自比较优势进行协作。

（三）优化服务业区域布局，促进服务业均衡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资本、技术、政策、人力资源等在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群集聚，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动性较低，导致区域间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2015 年 1 月，商务部牵头的 9 部委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根据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区布局，统筹考虑东、中、西部城市产业发展，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进行扩容，中西部城市增加至 13 个，在东西部间开始重新优化配置服务业发展资源，促进一线城市提升创新能力和产业附加值，推动劳动密集型业务向二三线城市转移。许多位于东部的外包企业为降低综合成本，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只保留区域总部、营销机构及高端研发与设计中心，而将离岸交付基地、后援支撑平台转移到西安、成都、武汉等示范城市。示范城市作为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资源高地，成为有序承接服务业区域间梯度转移的第一梯队。目前，文思海辉已经在成都、长沙、潍坊、大连、青岛、无锡、西安、武汉、东莞等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交付中心或研发基地，软通动力将成都、西安、武汉、南京作为大西南地区、黄河流域、华中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区域性软件开发与技术服务基地，博彦科技选择西安、成都、武汉、苏州等地作为国内区域性交付中心。

（四）促进大学生就业，提升服务业国际化人才素质

示范城市对吸纳就业、人才培养的引领效应显著。截止到 2016 年，31 个示范城市累计吸纳就业 596 万人，全国占比均超过 70%。示范城市是我国服务业中高端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丰富经验，建立了包括企业、园区、培训机构、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等载体在内的多层次、多渠道的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体系。据统计，目前全国示范城市已经汇集了 1000 多个服务外包专业培训机构及大批专业师资力量，建立了超过 10000 个大学生实习基地和高校毕业生见习基地，由此带动的相关培训和教育人数，对高水平就业的示范和外溢效应显著。截止到 2016 年底，示范城市外包行业中大学（含大专）以上学历从业者 429 万人，占从业人员总数 72%。据统计，2016 年，上海和天津服务外包企业吸纳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占比分别高达 87.5% 和 78.2%。天津大学软件学院、中软卓越、服务外包培训中心、东软睿道等一批服务外包培训机构全年培训新入职和在岗人员 1.2 万人，超过 1/4 的学员培训后在服务外包企业就业。服务外包从业

人员平均工资 13.8 万元，是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1.9 倍。

（五）推动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1. 有效拉动当地开放型经济规模增长。2010—2017 年，示范城市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由 135.4 亿美元增长至 730.1 亿美元，以 25% 的年均增速迅速扩张，8 年间扩大了 4.4 倍，离岸服务外包占服务出口的比重由 8.3% 提升至 32%，对服务出口的拉动效应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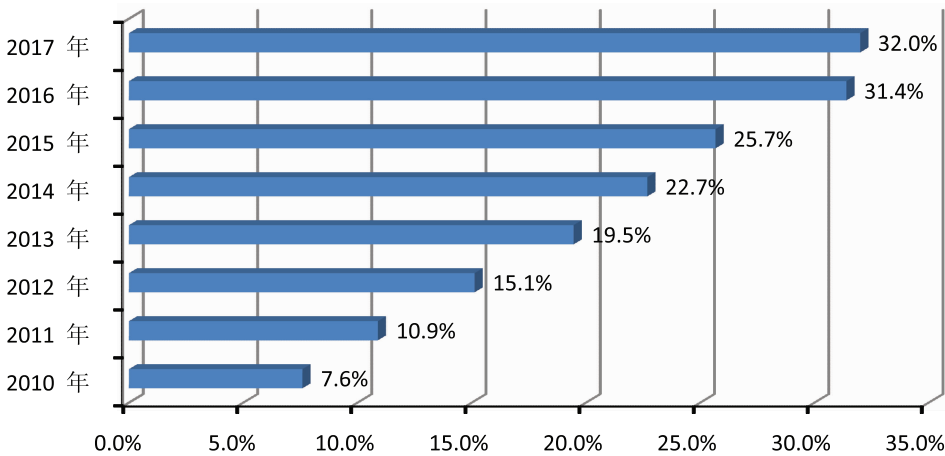


图 3 2010—2017 年示范城市离岸外包占我国服务出口的比重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商务部服贸司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2. 推动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示范城市通过服务外包产业推动了当地的国际合作、对外投资、国际并购、利用外资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服务领域的国际合作空间。一是通过开展国际论坛、国际交流等方式，不断扩大招商引资的“朋友圈”。二是不断创新服务外包合作模式。除了跨境交付模式之外，一些有条件的城市鼓励企业走出去，全球配置资源、优化市场布局、做大做强。一些服务外包领军企业加快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和海外交付中心，以便优化利用在岸、近岸、离岸等综合优势，实现多级交付、高质量服务的能力，与发包市场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如，博彦科技在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加拿大、新加坡等 6 个国家设有 30 余家分支机构、研发基地或交付中心；软通动力在全球 61 个城市设有 120 余个分支机构和 33 个交付中心；微创软件在全球设有 13 个交付中心，交付网络涵盖亚洲、北美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三是服务外包企业跨境并购能力逐步增强。2016 年中科创达以 6400 万欧元收购总部设在芬兰赫尔辛基的智能车载交互技术公司 Rightware，进入欧洲市场。此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被示范城市的产业资源吸引，北京、大连、天津、上海等示范城市已经成为跨国公司集聚地。

以大连为例，目前已有 90 余家全球 500 强企业在大连从事软件开发和服务外包业务，全球前 10 大 ITO 和 BPO 服务提供商中，有 6 家在大连开展外包业务。戴尔、毕博、爱立信、埃森哲、索尼、安永、花旗等 20 多家跨国公司将在大连作为地区服务总部。

3. 服务外包成为助推中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由于开放滞后制约了经济发展，因此，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点和难点在中西部地区。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两大战略的深入推进，中西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提升，成本优势、要素优势和区位优势逐渐显现，为承接服务外包创造了有利条件。近年来，中西部城市的服务外包产业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逆势上扬，服务外包产业规模逐步壮大，实力明显提升，集聚效应明显增强，服务外包产业体系逐步形成。

成都形成了以 ITO 为主，覆盖研发、工业设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等业务流程的服务外包产业体系。2016 年，离岸外包执行金额 14.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2%。领军企业规模效应显著，离岸执行金额超过 10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 20 家，累计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占全市离岸服务外包执行总额的 82.5%。ITO、BPO 和 KPO 占离岸外包执行金额的比重分别为 69.5%、6.6% 和 23.9%。以数据分析、工业设计、检验检测、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等为主的 KPO 业务比重逐渐增大，占比接近 1/3。

西安形成以研发服务外包为主，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为龙头，ITO 和 KPO 共同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格局。2016 年，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 1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2%。高技术、高附加值的 ITO 和 KPO 业务占比达 96.4%。形成了以西安高新区为龙头，航空基地、经济技术开发区、浐灞生态区、碑林动漫产业园等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共同发展的格局。

武汉逐步成为嵌入式软件和空间信息技术、信息安全、制造业信息化等应用软件领域的国家级服务外包产业基地。2016 年离岸合同签约额 7.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4%，服务外包企业 514 家，从业人员规模 17.7 万人。形成了以光谷软件园和武汉软件新城等专业园区为核心，以光谷金融港、光谷生物城、光谷创意产业基地、地球空间信息产业基地、未来科技城、大学科技园等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为依托，着力打造服务外包产业示范园区，集聚全市 80% 左右的服务外包产业集群。

重庆市逐步形成了以软件服务外包为主，包括工程设计、电子商务、动漫、金融等的服务外包产业领域。2016 年离岸外包执行额 2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商务部对 31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中，重庆排名第 11 位，居中西部首位。

合肥形成了以软件研发、呼叫中心、金融外包服务、动漫网游设计、数据分析处理

等 5 大领域为特色的服务外包产业集群。2016 年离岸外包执行金额 2.1 亿美元，共有服务外包企业 458 家，从业人员 16.8 万人。合肥现有 6 个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区和 15 个市级示范园区，聚集了全市 80% 以上的服务外包企业和 90% 以上的外包业务。

4. “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中西部地区服务外包发展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我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推动广大中西部地区由原先的“开放末梢”变成“开放前沿”，为中西部地区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互联互通工程建设的加速推进，中亚、西亚等地区将释放大量工业技术服务、信息化解决方案、专业服务需求，中西部城市将优先获得潜在市场和目标客户。目前，中西部服务外包基地和示范城市已经开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服务外包合作。例如，成都是我国与南亚服务外包产业合作的重要窗口城市，不少印度服务业巨头在成都建立了服务基地。西安在促进我国与中亚、中东欧乃至西欧跨国服务外包合作方面日益发挥积极作用。2014 年美国 Amidi 集团等跨国公司与西安高新区签约，将西安作为基地进行区域布局，以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加强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 王晓红：《中国服务外包：跨越发展与整体提升》，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2 年版。
2. 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编：《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2016》，2017 年。
3. 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编：《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2017》，2018 年。
4. 王晓红、张素龙、李庭辉主编：《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报告 2016—2017》，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责任编辑：谷 岳

论我国改革开放的时空辩证关系

韩功华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具有整体上特定的时空辩证关系，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时空发展规律。我国改革开放是历史必然性和空间特定性的辩证统一，是时间上渐进性和空间上选择性的辩证统一，是时空差异性和目标一致性的辩证统一。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从提出到实施以至于全面推进的内在时空发展规律。探究我国改革开放的时空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之后，回过头来更好地分析过去所经历的哪里是险滩、哪里是深潭、哪里水流急、哪里水流缓，为我们将来趟更大的河、涉更险的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 时间 空间 辩证统一

作者简介：韩功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规划院产业研究所所长。

引 言

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从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2018 年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岁月。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着神州大地，让古老沧桑的中国发生了巨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GDP）从 1978 年的 2142 亿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122503 亿美元，增长了 56 倍多。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抚今追昔，我们不禁感叹，“改革开放”为什么就有这么大的威力，简单的四个字，蕴含着

什么样的时空关系，给 20、21 世纪的中国注入如此大的活力。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外在的条件。中国改革开放整体上的时空性是由内因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生产力解放了，也才能解决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末，正是我国刚刚结束“十年浩劫”的时候，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中国当时的状况决定了我们必须进行改革开放以解决新的矛盾，应对新的挑战。不改革开放就很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就解决不了国家面临的贫困落后状态；同样，不改革开放也很难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就很难巩固；与此同时，世界上发达国家正在一日千里地发展，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不改革开放同样是没有出路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得那样，我们很可能被开除球籍。这些原因导致我国改革开放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发生了。

一、历史必然性和空间特定性的辩证统一

1978 年 10 月 10 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① 由此可知，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已经对开放的政策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特定环境下的历史产物。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十年浩劫造成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成为了一种历史必然。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特殊的时间性和地域性，首先强调的就是我国改革开放是历史必然性和空间特定性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有其特有的本质。所谓的本质，就是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现象就是事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表象。改革开放的本质可以从与其相对的词语中得以感悟。

——改革相对于保守。中国历来就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保守就是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改革恰恰就是要打破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局面。改革就是改变劣的，保留好的，革除落后和腐朽的，改革的本质是一场新旧事物之间的斗争，是一种守旧与反守旧的斗争，是一种历史必然性。

——开放相对于闭塞。中国历史上大部分都是闭关锁国的。从历史上看，凡是兴开放之风的，国家必然昌盛；反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国力必然衰微。开放就是要突

^①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二版，第 132 页。

破外在的束缚，走出去，放进来，本质也是一种斗争，是一种束缚与反束缚的斗争，也是一种历史发展必然性。改革开放是一种历史现象，正因为如此，导致改革开放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同时，改革开放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必须要在一定的时空环境才能得以进行。历史与逻辑在此得以完美结合。

改革开放政策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两个凡是”的基础上提出的。最早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是邓小平在1977年5月的谈话，在报纸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又接连发表了三个讲话，这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和两个凡是之否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大讨论是全党和全国范围一次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也开启了改革开放汹涌澎湃大潮的闸门，它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① 我们党首次在正式文件中将“改革”与“合作”的问题并列纳入视野，并使之成为全党的统一意志。党的十三大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指出“九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在拨乱反正基础上坚决推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② 报告还认为，“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③ 并正式将“坚持改革开放”确立为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

通过以上关于我国改革开放内在原因和外在条件的分析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确立的历程的回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改革开放发生在20世纪70年的中国是有特定的时代和历史原因的；改革开放的启动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改革开放”思想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等基本问题的必然结果。其意义在于突破了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的认识局限，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目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理论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动力和路径。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个人因素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得以顺利启动和实施过程中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总之，我国改革开放是历史必然性和空间特定性的辩证统一，这是由改革开放本质属性和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2日。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87年10月25日。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87年10月25日。

二、时间上渐进性和空间上选择性的辩证统一

（一）改革开放在时间上具有渐进性

我国改革开放在时间上的渐进性，可以从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始终的经济体制改革来分析。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1982 年 8 月党的十二大之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至 1991 年 12 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92 年 1 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到 2000 年 12 月进入 21 世纪之前，我国开始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 年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至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完善阶段。2012 年党的十八大至今，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阶段。^①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同时，适应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变化，提出并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脉络，具有非常明显的、伴随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渐进性特征，不仅总体上是分阶段、渐进式开展，而且每个特定阶段也是渐进式推进的。

经济领域如此，其他诸如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环保等各项事业的改革，也是遵循渐进的规律，逐步推进展开的。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分阶段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根据实际情况，概括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理论思路，无不是按照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渐进推进开展的。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试验性的推进过程。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渐进性原则，不可急功近利，一蹴而就。

（二）改革开放在空间上的选择性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改革试点开始，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在农村改

^①于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第十五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 年版。

革方面，安徽滁州等一些地区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改革试验。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随后推广到全国。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外出视察，首站选择了广东。在广东，邓小平的眼光盯住了深圳这个沿海小渔村，与香港只有一河之隔。当年，当地农民一天的收入不过1元钱，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为60多港元。怎么才能让群众尽快富裕？怎么才能让国家尽快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1979年7月，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后改名为内涵更丰富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美国《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继建立四个特区之后，又先后将海南全岛开辟为经济特区、上海浦东开辟为开发区，同时将沿海的14个大中城市和长江、珠江、闽南三角地区也作为开放地带。在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以后，新一轮的开放浪潮以迅猛之势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推进。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开放不仅“引进来”，还“走出去”，中国的发展更加融入了整个世界，初步形成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中国的局面。

近年来，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承载区取得快速、高质量发展。我国在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基础上，相继选择设立了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加上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数量将扩大到12个。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中欧班列”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新时代联通亚欧大陆的实体纽带。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消息，自2016年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实现快速发展，开行质量不断提升。2017年开行3673列，同比增长116%，超过过去6年的总和。截至2017年底，中欧班列国内开行城市达38个；到达欧洲13个国家36个城市，较2016年新增5个国家23个城市；铺画中欧班列运行线路达61条。“中欧班列”有力带动我国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促进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完善了国际物流运输体系，成为国际陆路运输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

通过以上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和空间特性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时间上的渐进性和空间上的选择性的辩证统一，这样的特性是有其内在的原因和机制在起作用的，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必然的统一。

三、时空差异性和目标一致性的辩证统一

我国改革开放在时空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但我们的目标却具有一致性。比如我国对东、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四大经济地理板块的划分，改革开放的不同区域和城市的选择，开放政策随时间逐渐放宽，以及利好政策的逐渐释放等，都体现了改革开放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差异性是由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决定的，而目标的一致性却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首先就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财富，但是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造成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而公平正义恰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① 其目的就是要逐渐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最主要表现在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上，党的十九大及时做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相信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城乡差别必将进一步缩小。

改革开放的时空差异性的存在，是为了将来更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目标的一致性改革时空差异性的最终归宿，差异不是目的，只是达到一致目标的手段。“改革开放”不仅是党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思想和方略，而且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目标的重要实践手段和道路。邓小平同志曾谈到：“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②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③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④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⑤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⑥ 开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07 年 10 月 25 日。

②《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6 页。

③《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34 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07 年 10 月 25 日。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改革开放”实践之路历经40年，波澜壮阔，成绩斐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经济发展方面：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发展方式有所转变，市场体系不断健全，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增强。政治发展方面：政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基层民主活力明显增强，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法制建设成效显著。文化发展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扎实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广泛开展，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社会事业发展方面：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教育医疗卫生服务不断健全，社会管理逐步完善，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同时，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顺利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等。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逐渐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总体协调，国防、外交、党建等事业同步推进的良好局面。可以说，改革开放在时空上的差异性，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以上具体目标而必须采取的一种方式 and 手段。所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时空差异性和目标一致性的辩证统一。

四、认识改革开放时空辩证关系的重要意义

认清我国改革开放的时空特性，对于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和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非常有必要对以往的发展历史进行仔细的梳理、总结和深入地反思，从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以供今后制定相关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参考，避免走弯路。改革开放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过了河之后，就需要去分析哪里是险滩、哪里是深潭、哪里水流急、哪里水流缓，方能为我们将来越过更大的河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这显然是非常有价值的。过往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面对未来，在我们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依然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的发

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就可以以较低的代价获得更大的发展。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历史必然性和空间特定性的辩证统一。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历史的选择，是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今天，我们党又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我国 40 年改革开放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坚定表明了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同时，改革开放是时间上的渐进性和空间上的选择性的辩证统一。改革开放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至于将来，我们都需要走渐进的发展道路，并且在实施一项新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可以首先选择特定的区域进行试验，以此减少乃至避免改革开放带来的风险。当然这不代表畏首畏尾，而是强调要以一种谨慎的、科学的和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每一项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开放带来的风险，实现发展利益最大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是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比经济体制改革的风险更大，所以更需要采取渐进的、选择性的原则去实施，千万不能期望一步到位、一劳永逸，那样是不符合改革开放的时空特性的。

另外，改革开放是时空差异性和目标一致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偏离改革的初衷，否则就失去了改革开放的意义，很可能会走上邪路，目标也很难最终实现。如果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人民也不会答应，最终会导致改革开放的失败。

当前，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循改革开放的时空特性规律，积极稳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2.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8 日。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07 年 10 月 25 日。
5.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6. 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4 版。
7.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8.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87 年 10 月 25 日。
9.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 年 12 月 22 日。

责任编辑：谷 岳

发展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对策建议

宋瑞礼

摘要：根据国际经验判断，我国经济正在逐步进入消费主导型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收入、技术、人口和政策等因素将支撑我国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消费制度改革相对缓慢、劳动报酬比例总体偏低、消费技术总体供给不足、消费导向投资欠账较多、优质消费购买能力外流等诸多因素制约。为此，本文提出了发展消费主导型经济的“五力”组合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主导型 消费结构 消费制度 消费导向 五力组合拳

作者简介：宋瑞礼，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万国际元和人口比重最高年龄段在46岁左右时，一国将进入消费快速升级期和消费支出高峰期。201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4万国际元左右，45~4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9%。这意味着我国消费将逐渐进入快速扩张阶段，有望成为新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一、我国进入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阶段

近几年，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增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经济周期底部由于投资增速过快下降使消费表现出的相对性增强，但结合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以及对投资和出口的分析可以判断，总体上我国已开始进入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阶段。

（一）消费增长贡献率转为趋势性增强

2014 年，我国消费对 GDP 增长贡献率为 48.8%，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2017 年最终消费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到 58.8%，较 2014 年上升 10 个百分点，连续 4 年继续保持第一驱动力的地位。从周期阶段来看，2017 年 GDP 增长 6.9%，已连续 3 年低于 7%，经济总体处于周期下行或者底部，因此当前消费作用增强可能属于周期性暂时增强。但需要指出的是，2000—2014 年，不论是在经济周期上行阶段或是下行阶段，不论政府采取的是积极、稳健或是紧缩的调控政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但 2015 年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7%，增幅首次超过固定资产投资，且两者差距呈现稳步扩大的趋势。2017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已超过固定资产投资 3 个百分点，这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出现了趋势性增强的迹象。

（二）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出现拐点

各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析显示，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会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表现出“U”型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保持了由最高点 1983 年的 53.5%波动式下降的趋势。2008 年，我国人均 GDP 增长至 7948 国际元，首次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随后 2010 年开始，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进入上升轨道。2017 年，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升至 39.4%，连续 6 年维持了上升态势。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绝对值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016 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仅为 38.6%，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5.7 个百分点；低于美国 30.2 个百分点、欧元区 16 个百分点、金砖国家（不包括中国）19.9 个百分点。上述分析表明，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进入趋势性上升阶段，加之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绝对值大幅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预示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速将进入快速扩张阶段。

（三）投资和出口高增长空间日益缩窄

我国出口和投资增长周期先后出现了拐点性变化。随着市场需求约束的增强、国外反倾销措施力度的加大以及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我国出口规模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行，2017 年已降至 18%。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出口占 GDP 比重仍然偏高，以 2016 年为例，我国出口占 GDP 比重为 18.5%，而同期的美国和日本仅为 11.9%、13.0%。考虑到当前我国一些重要产品产量已占据全球市场的较大比例，且劳动力、能源资源环境成本持续上升，预计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将持续下降。有研究成果表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的资本净回报率平均为 6.8%，而同期的经济增速则达到了 7.5%。从国际经验看，2014 年，我国资本产出比接近于 4，不仅大幅高于俄罗斯、泰国等与中国发展

阶段相似的国家，而且还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表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已不具备保持高速增长的条件。2017 年，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已出现下降，为 76.4%，较 2016 年下降 3.8 个百分点，初步印证了上述推论。从需求角度看，综合出口和投资走势可以判断，消费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驱动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的支撑因素分析

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是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动力。同时，近几年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国家出台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在传统消费领域之外又开辟了不少新的消费热点，为驱动我国进入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阶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一）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上台阶

我国居民收入格局逐步优化，表现出“增速加快、财富增多、分配改善”的局面。速度加快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 GDP 增速。2017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5974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3%，比上年加快 1 个百分点，跑赢 GDP 增速。这是自 2013 年国家统计局开展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跑赢 GDP 增速的第 4 个年份。财富增多指我国居民持有财富规模不断扩张。2017 年，我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为 188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3.9%，增速连续 6 年超过 GDP 名义增速。分配改善指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朝向均等化良好局面演变。2016 年，我国基尼系数为 0.465，较最高年份 2008 年降低了 0.026。同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逐步扩大，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形成。根据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最新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目前已经超过 30%，到 2025 年将达到 50%。上述三个方面共同作用，必将极大增强我国居民消费购买能力，推动消费结构向更高的阶段持续演化升级。

（二）技术快速进步开拓消费新空间

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正在开启消费结构升级新模式。2017 年，我国 4G 用户近 10 亿户，渗透率达 70%，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普及，低门槛、自助化、普及化，让便捷、高效进一步融入各行各业的毛细血管，衍生了互联网消费经济。2017 年，我国移动 App 数量达 216 万款，分发规模超过 7600 亿次。我国移动支付平台已有效建立起了一套生态系统，性能位居世界前列。2017 年，我国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近 150 万亿元，居全球首位；网约车日均订单数超 2500 万单，共享单车用户规模超 3 亿户。2017 年，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由 2016 年的 6.2% 提高到 7.9%；外卖带动了餐饮的快速增长，根据美团点评发布

的数据，2017 年我国在线外卖市场规模达到 2046 亿元，增长 23%，在线订餐用户规模达到 3 亿户，同比增长 18%。技术进步使得在流通环节消费商品和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在生产环节商品服务同步升级，极大地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

（三）人口结构变化打开消费新领域

2017 年，我国总人口新增因素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超过 0.5 个百分点。除了人口总量变量外，人口结构变化还通过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和年龄结构变量影响消费。以 2017 年为例，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 2.71，人均消费支出倍差 2.23，因此，城镇化率提升会推进消费总水平扩张。以 2017 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基准，粗略估算每年由城镇化率提高带来的新增消费约 2700 亿元。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4090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3%。受国家提升退休金水平和房价等资产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推动，近几年我国老年人消费支付能力不断提升。京东战略研究院研究报告显示，近几年我国老年消费市场规模迅速扩张，保健类、休闲娱乐类等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消费出现快速发展。根据全国老龄工委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14—2050 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从 4 万亿元增长到 106 万亿元左右，占 GDP 的比例将增长至 33%，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

（四）政策鼓励导向强化消费提质量

近几年，我国政府出台了大量促进消费的政策举措，数量之多、力度之大均创历史之最。2017 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 2020 年信息消费规模达到 6 万亿元，拉动相关领域产出达到 15 万亿元。除了信息消费，国务院陆续发布了刺激体育消费、旅游投资和消费、生活性服务业消费等大量政策文件。此外，2016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 20 多个部委制定了《关于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的行动方案》；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委又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提出完善政策体系，构建有利于促进绿色消费的长效机制，营造绿色消费环境。国家出台的这些支持消费的政策，既符合现阶段我国居民结构消费升级要求，又紧扣技术进步、资源环境、人口结构等重要变化，对于刺激新消费培育增长新动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发展消费主导型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受经济系统各组成变量变化不同步因素影响，经济增长阶段转换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期”，以达到新的状态均衡。我国由投资主导型进入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阶段也不例外，同样面临诸多挑战。

（一）消费制度改革相对缓慢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我国居民消费潜力每一次释放，都离不开改革的强力支撑。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我国人均 GDP 达到 800~1000 美元，居民消费进入由衣食向住行消费阶段；政府及时调整政策破除了制约汽车和房地产消费的制度性障碍，推动我国经济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后，尽管政府出台了不少宏观顶层设计的消费改革举措，但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惯性影响，我国医疗、养老、教育以及部分中高端消费品行业等领域改革仍不彻底，市场难以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导致出现高价格与短缺并存，致使消费潜力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能渠道不通畅。同时，技术进步带来了诸多互联网+、人工智能、移动支付、无人驾驶等新消费业态。由于没有现成的国外经验可供借鉴，导致对于新的消费业态政策供给缓慢，致使新的消费潜力难以有效充分释放。

（二）劳动报酬比例总体偏低

从工业化进程国际比较视角看，我国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处于较低水平。美国在工业化进程（1850—1920 年）中劳动报酬比重维持在 73.9%~78.7% 区间高位波动。日本、韩国和加拿大等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均呈现上升态势。以韩国为例，1955—1993 年，其劳动报酬比重从 30.1% 快速增长到 60.6%，增长幅度达到 100%。1978—2010 年，我国劳动报酬比重平均值仅为 42%，最高不过 45.7%。这表明我国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处于偏低状态。近几年，受人口数量红利结束等因素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增速开始快于 GDP 增速，但短期内很难改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比例偏低的局面，影响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进而对居民消费需求扩张产生负向制约。

（三）消费技术总体供给不足

尽管近几年我国移动支付、智能家电等部分消费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型技术虽有所突破但没有形成燎原之势，消费类科技创新供给不足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比如手机芯片需要依赖进口、创新药严重缺乏。其主要原因为，我国技术创新的重点一直是侧重于生产、科研和国家重大战略，如空间、海洋等领域重大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为例，与生产紧密相关的核高基、集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通信、数控机床、油气开发、大型核电站、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等技术占据较大比例，而与生活相关的转基因、新药创制、传染病防治等技术占据了较小比例。与生产型和科研型技术创新不同，消费型技术主要依靠市场驱动。但近年我国宏观经济持续下行，行业盈利水平处于不景气区间，企业自有资金积累速度较慢，加之市场融资成本较高以及受到一些不合理审批制度的负面影响，导致消费类技术创新速度滞

后于现实需要。

（四）消费导向投资欠账较多

我国较低的消费水平必然意味着消费品行业发展不足，进而导致消费品行业或领域投资不足。改革开放初期，面临薄弱的工业基础，国家需要依靠资本强积累配合采取出口导向型战略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所以消费品行业投资不足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投资成为政府促进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而多次重复长期使用容易导致过度投资，尤其是生产性和基建投资。这导致了停车位、优质养老院、优质学校和医院、中高端消费品供给不足，以及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能过剩的不利局面。消费总量需求的持续扩张叠加消费升级带来的结构化效应，会与历史性原因积累的消费品行业投资不足产生矛盾，进而削弱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五）优质消费购买能力外流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正由生存型、传统型、物质型向发展型、现代型、服务型转变。调查结果显示，2017 年全球奢侈品行业销售额增长 5%，打破 1.2 万亿欧元的记录，其中 1/3 来自我国消费者。目前，我国知名消费品牌较少，大部分消费型技术落后，部分高档消费品关税较高。与过去封闭环境不同，现在我国居民出境旅游的次数大幅增加。2017 年，我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 13051 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7.0%，这为我国居民中高端消费外流提供了渠道。据中国银联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游客在境外消费金额、消费笔数较 2015 年分别增长 16% 和 29%。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出境游客总消费额逾 1/5 源自我国游客，排第二的美国游客消费额仅相当于我国游客的 50%。中高端消费购买力外流，侵蚀了我国中高端消费类产业发展的潜力。

四、推动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针对发展消费主导型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本文提出了深化改革清除消费阻碍力等促消费“五力”组合拳的政策建议，争取把巨大的消费潜力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化的动力，为促进我国经济顺利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有效保障。

（一）深化改革清除消费阻碍力

在消费结构升级进程中，商品和劳务供需矛盾最突出的领域往往是市场化程度不高或者政策作用没有有效发挥的地方，比如健康养老、学前教育、创新药研发。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顺应我国进入消费主导型经济阶段的客观规律，尽快再推出一批措施更实、力度更大、目标更准的改革举措，为消费结构升级和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新旧动能

转换带动力扫除体制机制障碍。探索建立以消费为导向的政策新体系，着力推进消费政策工具创新。试行对消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考核，切实建立促进消费的硬约束机制。结合我国居民需求变化和产业发展客观要求，及时调整关税相关措施，有选择性地合理降低部分进口消费品关税，搭建国际消费平台以避免购买力的过度外流。

（二）提高收入增强消费前进力

近期我国依靠劳动市场供需关系变化推动的工资上涨，是以降低企业盈利和政府税收为代价。尽管这是对劳动报酬占比过低状态的调整，短期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期内仅依靠劳动供需关系调整推动的收入上涨不具备可持续性。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时期，一方面传统产业退出释放了大量冗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行业却面临高端人才供给严重不足的困境。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已成为制约提高居民收入的突出瓶颈。建议尽快研究出台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政策举措，尤其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强化社会再就业人员技能培训，充分发挥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着力做好产业转型和提高居民收入有机结合。同时，要加大收入分配再调整力度，通过税制改革等举措不断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三）重视科技深挖消费潜在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得科技创新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要强化科技创新对消费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以消费导向型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全面创新，鼓励和支持消费类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形成更多新消费技术、新消费产业、新消费业态、新消费模式，增加优质新型消费产品和服务等有效供给。探索试行国家重大消费类科技专项计划，搭建一批消费类产学研一体化技术创新平台，强化国家在消费类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针对消费类技术的薄弱环节，以市场化应用为激励导向，鼓励和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研发机构加大消费类科技研发投入比例。加强对现有生产科技的消费属性研究，推动军用技术民用化进程，以激发更大的消费科技创新力。打通科技、消费和生产全链条，如推动消费互联网升级为产业互联网，为培育增长新动能注入活力。

（四）降低成本提升消费支付力

较高的消费品和服务品成本也会削弱居民的消费水平。我国当前较高的消费成本主要体现在房地产、部分消费型垄断行业等领域。这些领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商品的技术进步效应极小。以商品房为例，其发展主要带动钢铁、建材以及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等行业，对高科技发展的带动力有限。而垄断行业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技术进步速度

一般会慢于其他行业。在居民收入一定的前提下，对房地产和消费型垄断行业支付较高的价格，必然会侵蚀对科技型消费品的购买力，进而不利于科技含量较高的消费品行业健康发展。因此，要探索构建抑制部分非科技型消费品价格高企的长效机制。房地产领域要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财税体制和土地供应制度改革，促进房价尤其是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房价合理回归。要抓住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的技术革新带来的有利契机，推动电力、电信、银行等垄断行业改革，切实降低居民消费支出成本。

（五）完善设施增加消费便利力

与生产类基础设施不同，消费基础设施市场外部效用更明显，短期盈利能力相对较低，政府和市场的投资动力均相对不足。建议研究出台消费基础设施补短板计划。综合运用土地、信贷、税收、价格等措施，提高消费基础设施短板领域的盈利能力，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其中，提高消费类基础设施供给。建议紧跟全球消费科技最新动态，尽快提出消费基础建设未来 10 年计划，重点针对无人驾驶、无人商店、智能物流、新一代信息网络等领域超前布局，为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铺平道路。品牌质量认证等软消费基础设施对于发展高端消费品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应尽快开展智能家电等高端产品认证、谋划高端健康养老等领域行业标准、强化品牌建设政策激励机制，为最大释放消费升级潜力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范剑平：《论投资主导型向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双拉动型转换——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分析》，《经济学动态》2003 年第 2 期。
2. [英] 安格斯·迪盾、约翰·米尔鲍尔著，龚志民等译：《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3. 郭其友、芦丽静：《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转变——消费主导型增长的国际经验与借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
4. 迟福林：《走向消费主导的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战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 年第 4 期。
5. 毛中根、孙武福、洪涛：《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比较分析》，《人口研究》2013 年第 3 期。
6. 付波航、方齐云、宋德勇：《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 年第 11 期。
7. 孙豪：《消费主导型大国：特征、测度及政策》，《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0 期。

责任编辑：李 蕊

全球三大生产网络比较研究

李 娣

摘要：对比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为核心的欧盟区和以中国、日本、韩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等三大区域性生产网络，可以发现，当前全球三大生产网络表现为：生产与贸易中心化的趋势明显；三大网络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存在明显差异；国际分工进一步专业化与网络化；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创新能力在北美、欧盟、东亚地区呈现不同特征；东亚地区货物贸易和对外投资日益活跃。英国脱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修改与美国税改法案等因素将对三大网络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互联网+制造业”、流通领域新变革、智能制造等将推进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出现新的调整。

关键词：北美自由贸易区 欧盟 东亚 全球生产网络

作者简介：李 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教授。

全球生产网络（GPNs）概念源于经济地理学家 Neil Coe，后来被杨伟聪等人发展起来。Neil Coe 认为，全球生产网络同全球商品链与全球价值链有较多相似性，但有两个不同的关键点：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根本性的研究是线性的，而全球生产网络则超越了线性研究，重视全球生产网络布局与结构研究；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重点聚焦于公司间交易的治理，而全球生产网络则试图涵盖所有相关主体和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有些生产网络是长期稳定的，有些是短暂的，有些地域广泛，有些则受制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但没有长时间保持完全不变的；有的生产网络大，有的小，在应对内部和外部环境过程中不断调整。从目前的全球商品、服务贸易以及全球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特点看，

全球存在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为核心的欧盟区和以中国、日本、韩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三大区域性生产网络。这三大生产网络是随着区域内贸易、国际贸易发展进程逐渐演变形成的。对比分析三大生产网络的发展特征以及发展趋势，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全球生产网络演变趋势，了解中国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一员的地位、功能与价值，进一步指导中国寻求参与全球分工新路径，合理调整和重新定位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

一、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发展演进与现状

（一）北美地区生产网络发展进程与现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盟（前身是欧共体）经济实力日益壮大，亚洲的日本经济也急剧膨胀。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都以务实的态度调整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于 1992 年 8 月 12 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并于同年 12 月 17 日由三国领导人分别在各自国家正式签署该协定。1994 年 1 月 1 日，该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布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由两个属于七国集团（G7）成员的发达国家和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组成，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差距很大。从其内部实力（见表 1）看，2017 年美国占有 2/3 的人口和 87.5% 的经济实力，加拿大则仅占 7.4% 的人口和 8% 的经济实力，墨西哥虽拥有近 26% 的人口，但经济实力不到 5.1%。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按工业化程度和发展水平分属三个不同层次：美国属于第一个层次，加拿大属于第二个层次，二者均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墨西哥则是第三个层次，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从经济实力、工业化程度和发展水平等方面比较，美国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是通过垂直分工体现三国之间的经济互补关系，促进各方经济发展。

表 1 2017 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总量、人均 GDP 等经济指标

北美自由贸易区	国土面积 (平方公里)	总人口 (亿)	经济总量 (亿美元)	人均 GDP (美元)
美国	963	3.23	19.36	59989.25
加拿大	998	0.36	1.64	45727.71
墨西哥	197	1.26	1.14	9047.68
合计	2158	4.85	22.1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北美自由贸易区运行的基本模式是，美国和加拿大利用其发达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商品和资本的流动进一步加强它们在墨西哥的优势地位，扩大墨西哥的市场；而墨西哥则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降低成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将商品出口到美国，同时从美国获得巨额投资和技术转让，以促进本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本国产品的更新换代，在垂直分工中获取较多的经济利益。三国之间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成为它们合作的纽带。

（二）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发展进程与现状

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中，东亚地区包括：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朝鲜、韩国、日本、蒙古，本文重点介绍中日韩三国主导的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二战后，中日韩三国经历了不同的制造业发展历程，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日韩经济来往越来越频繁，产业合作与转移持续深化，制造业合作基础不断强化。中国与日本、韩国要素禀赋的互补性及需求的相似性，中日韩企业国际化经营，三国之间呈梯度分布的良好分工体系，以及区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与积极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等多种原因，推动了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稳定发展。其中，2017 年，中日韩三国人口总量为 15.83 亿，经济总量为 18.66 万亿美元，是亚洲重要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三国人口总和约占世界人口 21%，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24% 左右，堪称世界经济版图和国际经贸合作的稳定增长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货物商品出口总值占世界的比重连年攀升（见图 1），初步估计到 2017 年底，达到世界出口总额的 26% 左右，进口额占世界比重约为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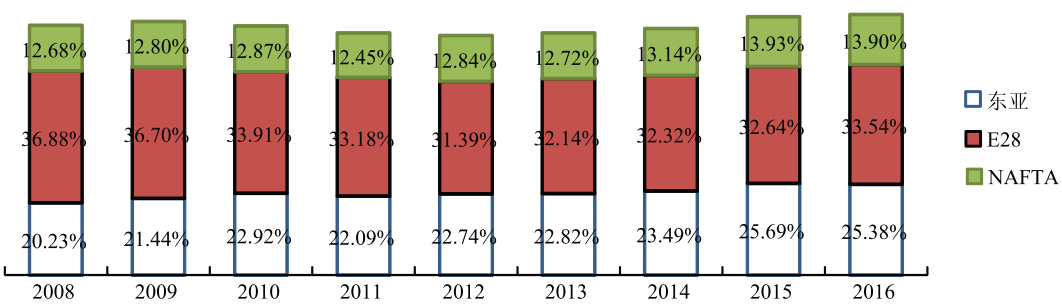


图 1 2008—2016 年三大生产网络货物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三）欧洲西北部地区生产网络发展进程与现状

欧共体创始国为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6 国，1993 年欧盟正式成立，2017 年欧盟已成为一个拥有 28 个成员国（2016 年后英国宣布脱欧，但仍处于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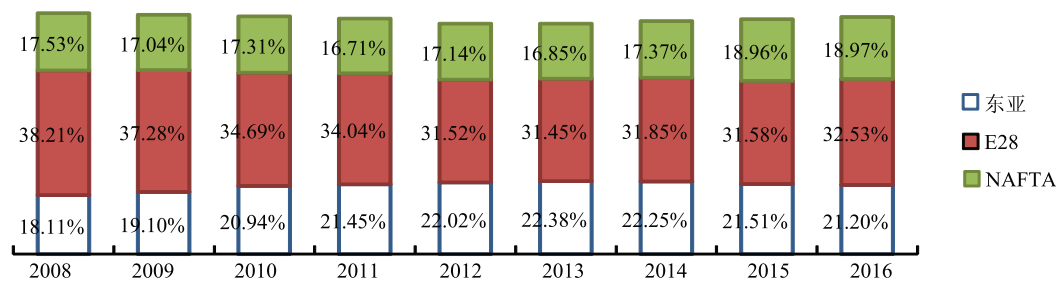


图 2 2008—2016 年三大生产网络货物进口额占世界比重 (%)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欧谈判中，欧盟统计依然采用 E28)，人口超过 5.10 亿人的大型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一直是世界贸易的重要经济体，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长期以来，欧盟货物进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约为 1/3（见图 1、2）。据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 年，欧盟货物出口额为 1.88 万亿欧元（2.12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7%；进口额为 1.85 万亿欧元（2.09 万亿美元），增长 8.2%。2017 年，欧盟最大的出口市场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市场是中国。欧盟成熟的生产网络使之成为全球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吸纳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其 FDI 流入量占世界比重基本维持在 20%~30%。

二、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主要发展特征比较分析

（一）三大生产网络生产与贸易中心化的趋势明显

据国际贸易中心（ITC）数据库数据显示，美国出口贸易集中度（赫芬代尔指数）为 0.08，出口目的国平均距离为 6729 公里。加拿大出口贸易集中度为 0.59，与出口目的国平均距离为 2960 公里。墨西哥出口贸易集中度为 0.66，与出口目的国平均距离为 2853 公里。可见，美国出口目的国平均距离远大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其他两个国家，加拿大、墨西哥的出口主要面向美国，但美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国包括中国、欧洲国家，出口目的国面广、距离长。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北美自贸区货物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为 12%~14%，进口额占世界比重为 17%~19%，制造业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的 13%左右（见图 1、2、3）。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按国际收支计算的货物出口（按产品），2017 年加拿大商品出口额为 5492.57 亿美元。据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往年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达 70%~80%，来自美国的进口额占其总进口额的 50%以上；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 80%以上，进口额占其总进口额的 40%~50%。加拿大、墨西哥的国际贸易都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这两个国家也是围绕美国来组织生产。因此，美国市场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这两国的经济与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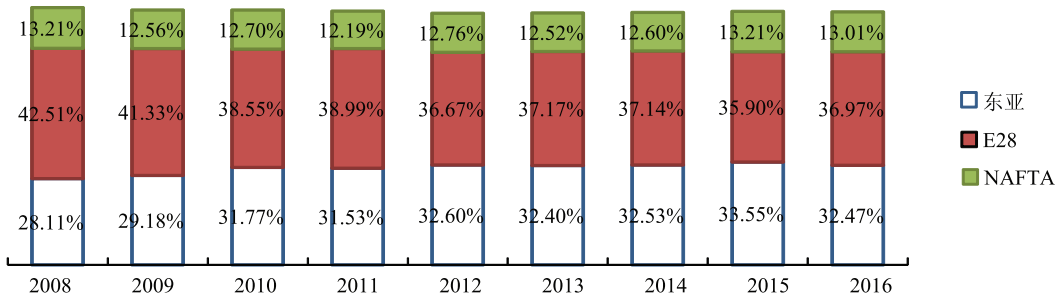


图 3 2008—2016 年三大生产网络制造业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表 2 2016 年中日韩三国进出口额占世界份额以及集中度

东亚地区 生产网络	出口额占世界 份额 (%)	出口国家 集中度	与出口目的 国平均距离 (公里)	进口额占 世界份额 (%)	产品供应 国家集中度	与产品供应 国平均距离 (公里)
中国	13.2	0.07	6407	9.9	0.05	6153
日本	4.1	0.09	6116	3.8	0.09	6107
韩国	3.1	0.1	5351	2.5	0.08	5504

数据来源：ITC 数据库。

以中日韩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中，据 ITC 数据库数据显示（见表 2），中日韩三国的产品供应国家集中度都低于 1%，与产品供应国的平均距离都在 5000 公里以上，中国和日本进口产品国家是非常分散的，尤其是中国产品出口和进口国家的集中度都较低。自 2012 年以来，东亚地区制造业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超过 32%（见图 3）。2017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7.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其中，出口额 15.33 万亿元，增长 10.8%。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初步统计，2017 年，韩国进出口额为 10520 亿美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5.8%，为 5739 亿美元。据韩国海关统计，中国、美国和越南是韩国出口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占韩国出口总额的 24.8%、12.0%和 8.3%；中国、日本和美国是韩国进口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日本出口总额增长 11.8%，至 78.3 万亿日元；进口总额增长 14.0%，至 75.3 万亿日元。中日韩贸易额占东亚地区的绝大部分份额，三国是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中心。

ITC 数据显示，2017 年，欧盟的进出口额分别约占全球总额的 1/3。其中，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是欧盟的前五位出口国家；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是欧盟的前五位进口国家。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17 年德国出口额 1.3 万亿欧元，进口额 1.0 万亿欧元，分别较上年增长 6.3%和 8.3%。法国统计局数据显示，

法国主要的进口国家有德国、中国、美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其他进口来源国大多为欧盟内部成员国，出口地区主要是欧盟区域，2017 年法国贸易赤字继续增长，达到 623 亿欧元。荷兰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荷兰来自欧盟区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 54.2%，主要的进口国家有德国、中国、比利时、美国 and 英国；荷兰出口欧盟区占其出口总额的 71.3%，主要出口国家有德国、比利时、英国、法国。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意大利对欧洲非欧盟国家出口同比增长 10.4%，进口同比增长 11.3%，顺差 85.64 亿欧元。欧盟生产网络中，欧盟区内部的进出口贸易比较频繁，德国是欧盟区其他国家的主要进出口目的国，美国和中国分别是欧盟区生产网络中的重要出口目的国和进口国。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是欧盟地区生产网络的中心。

（二）三大网络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存在明显差异

考察三大生产网络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特点可以发现，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生产网络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一直处于 31%~37%（见图 4），但东亚地区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在区域内的出口额占全球全部区域内出口额的 4% 左右。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盟区域内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占世界比重从 40% 左右滑落至 32% 左右（见图 4）。但与东亚生产网络不同的是，2012 年以来，欧盟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在区域内的出口一直保持在 20%~25%，该比重远高于东亚地区生产网络，说明东亚地区在参与全球制造业分工过程中，主要依赖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这类产品的出口主要面向制造业技术层次高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反映出，欧盟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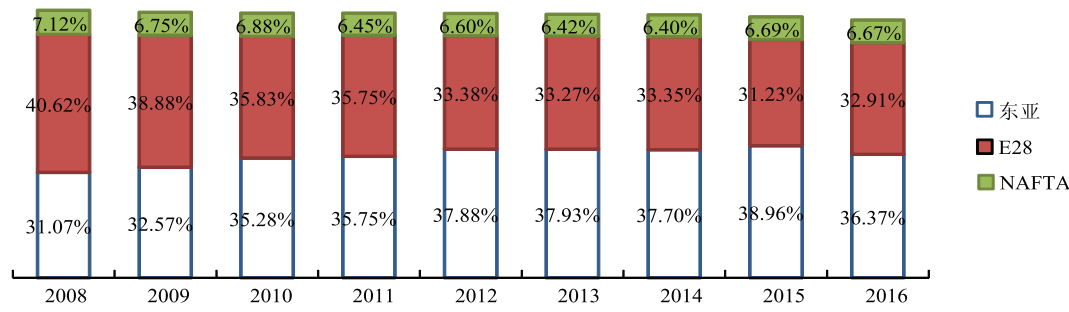


图 4 2008—2016 年三大生产网络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与东亚地区和欧盟区不一样，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北美自由贸易区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出口额占世界比重及占世界区域内出口额比重都是在 10% 以下（见图 4），区域内的出口占世界区域内出口比重更是低至 5% 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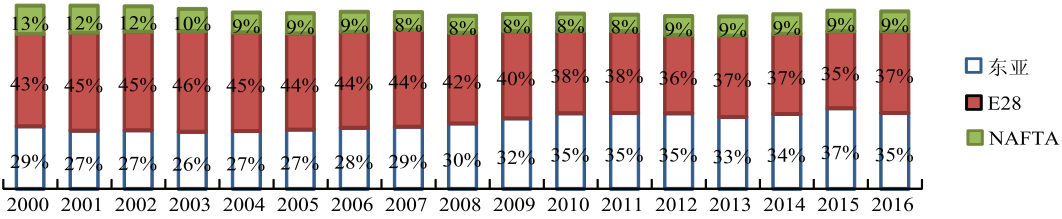


图5 2000—2016年三大生产网络低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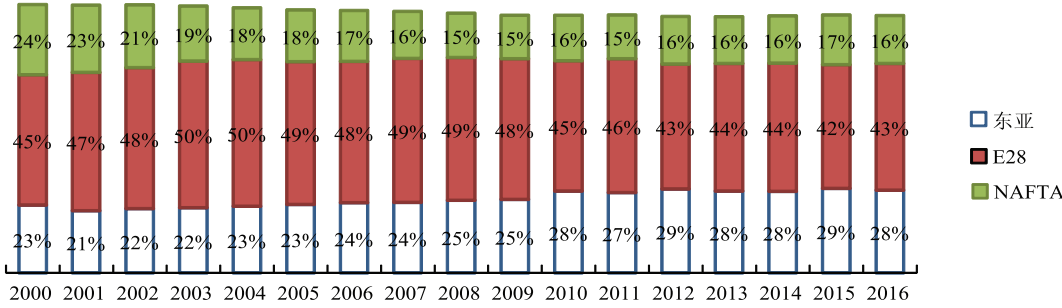


图6 2000—2016年三大生产网络中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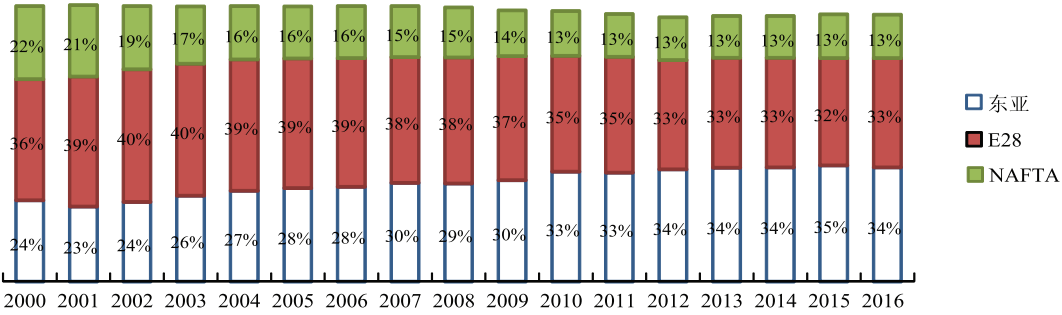


图7 2000—2016年三大生产网络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从全球价值链的技术层面上考察三大网络国际分工（见图5、6、7），2000年以来，欧盟无论是低技能和技术密集型，还是中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都是最高的。在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出口上，东亚地区在金融危机后加快追赶速度，曾一度超过欧盟区1.53个百分点；欧盟在中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上基本保持了稳定的份额，东亚地区与欧盟中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额占世界比重的差距呈现收窄趋势，但差距依然明显。自2000年以来，北美地区的中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保持在15%~20%，高于低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世界比重。2000—2011年，欧盟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额占世界比重处于第一位，东亚地区保持缓慢稳

定增长，2012 年开始超过欧盟，北美地区则表现为逐年递减趋势。在全球技术变革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变化趋势也投射出三大生产网络在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竞争不断加剧，区域之间的技术渗透不断加强，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东亚地区转移趋势明显。

自 2012 年以来，三大生产网络的主要国家为迎接这个变革的时代，面向未来纷纷制定了提升制造业的发展战略，比如 2012 年美国推出《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 年进一步推出《制造业创新国家网络》，德国制定了“工业 4.0”战略。此后，中国制定了“制造业 2025”战略、韩国推出了“制造业革新 3.0”战略、日本发布了“社会 5.0”战略等。各国制造业新的发展战略，旨在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占领制造业未来的战略制高点。

（三）三大生产网络国际分工进一步专业化和网络化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单个区域难以发挥作用，整个价值链条的有效运作需要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合理分工。其中，分解价值链后进行分工生产的过程，就是大量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过程；而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正是利用了产品沿着垂直专业化分工过程转换的比较优势，在转换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尽管国际经济一体化正遭遇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但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多元化趋势发展显得势不可挡。前面一部分把出口货物的全部商业价值都归于供应链的最后环节，即最终货物出口国和地区，中间投入品汇聚到某一区域内并出口最终制成品，掩盖了全球价值链网络化趋势。考察国际分工情况中，中间产品贸易在各大生产网络的变化，以联合国统计分类中的机械与运输设备（SITC7）以及其中的电气和电子产品零部件（SITC 759 + 764 + 772 + 776）为例。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和欧盟的机械与运输设备贸易多数时间内都存在明显贸易顺差，北美自贸区则保持较大规模贸易逆差（见图 8、9）。2008—2012 年，欧盟机械与运输设备出口额占世界比重处在三大网络第一位，2012 年东亚地区首次超越欧盟区 1.75 个百分点，此后一直保持略微领先，北美地区占世界比重基本徘徊在 14% 上下；但从进口额看，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地区机械与运输设备进口额占世界比重总体是下降的，与东亚地区呈现此消彼涨的状态，北美地区占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再细分看电气和电子产品零部件（以下简称零部件）贸易（见图 10、11），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零部件贸易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出口额占世界 50% 以上，进口额占世界 40% 以上，存在较大顺差；欧盟零部件进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下降约 5%，表现为逆差；北美自贸区零部件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下降约 2 个百分点，进口额占世界比重保持在 16% 左右，存在明显逆差。从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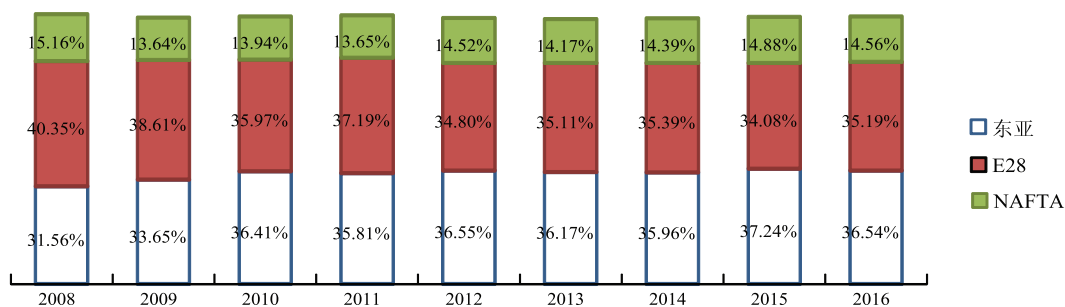


图8 2008—2016年三大生产网络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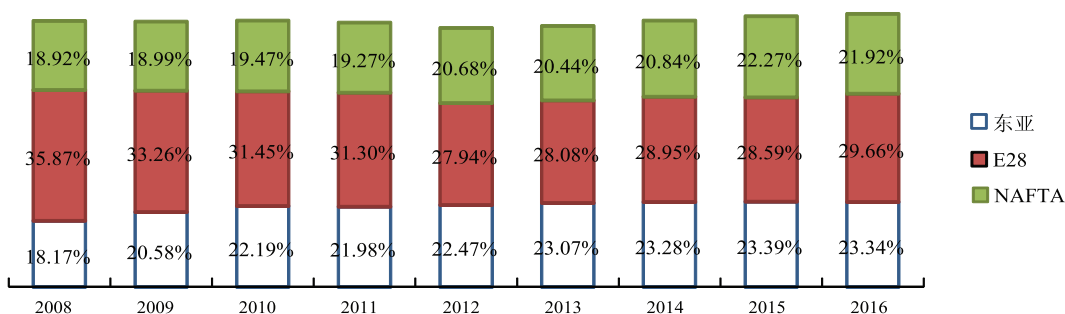


图9 2008—2016年三大生产网络机械和运输设备进口额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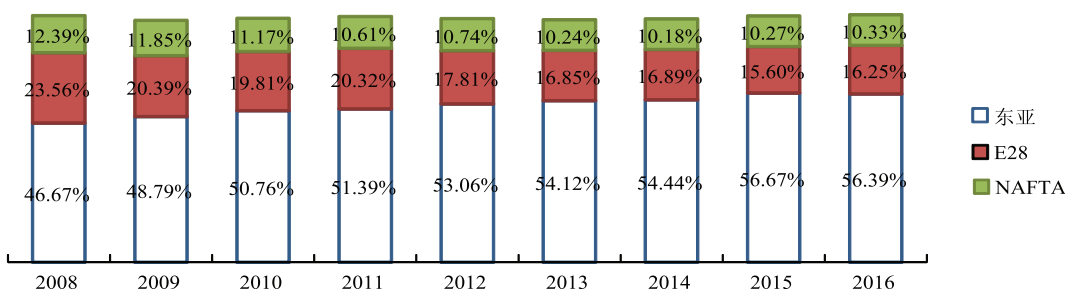


图10 2008—2016年三大生产网络零部件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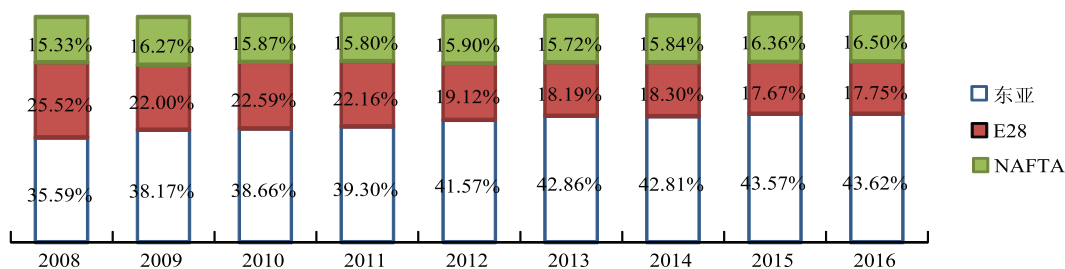


图11 2008—2016年三大生产网络零部件进口额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上数据可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东亚地区通过大规模的零部件对外贸易，即进口零部件进行来料加工、低附加值组装形成大规模零部件出口额，或者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通过直接投资、外包等一体化生产模式，完成其特定阶段的专业化生产，出口到欧盟和北美等地区完成下一阶段的生产或销售，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整合与利益最大化。此外，三大生产网络的零部件贸易总额逐年增长，反映了零部件产品的生产、贸易规模正不断扩大，三大生产网络总体上在继续扩张与进一步网络化。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方式更趋多元化，零部件的生产也更趋个性化。一个创意、设计能快速由设想变成产品，零部件生产与贸易的竞争出现了数量规模与个性化竞争同时存在的局面，未来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不仅在于“能生产多少”，也将在于“能不能生产”，这必将使得国际分工进一步多元化，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生产网络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四）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欧盟和北美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国际服务贸易规模的区域分布上，三大生产网络占比变化不大。欧盟服务贸易占世界比重一直保持最高的状态（见图 12），尽管有所下滑但始终保持在 40% 以上，是全球最主要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市场。其次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比重处于 15.5%~17.5%，总体上升了 2 个百分点；其中，金融服务贸易额占全球比重的 19.2%~24.9%（见图 13），上升了 5.7%。东亚地区服务贸易占世界比重上升 1.2%，但依然没有超过 14%。三大区域在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市场的占比为 73%~74%。在国际服务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布（见图 14、15、16、17）上，欧盟在与生产（商品）相关的服务、运输服务、建筑业、其他商业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保险和养老服务、金融服务、文化和娱乐服务等领域的进出口全球占比都是最高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使用等相关的技术服务优势突出，超过欧盟，在为政府提供的服务等领域与欧盟保持基本相同的占比；东亚地区则在建设服务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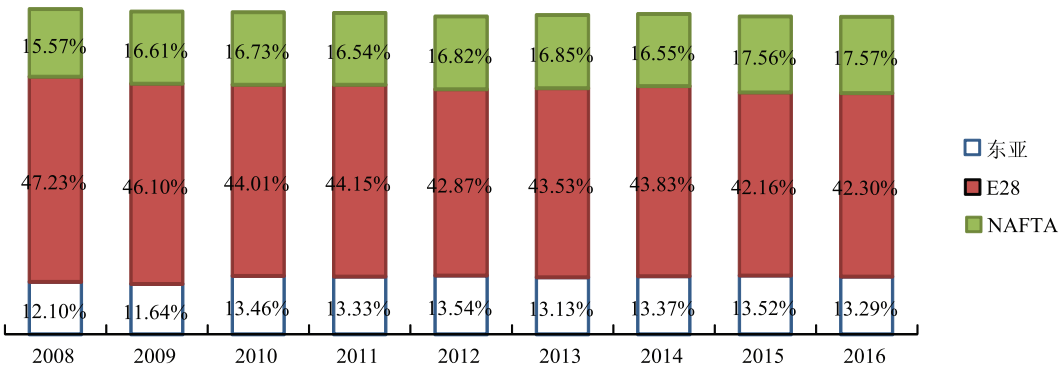


图 12 2008—2016 年三大生产网络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比重 (%)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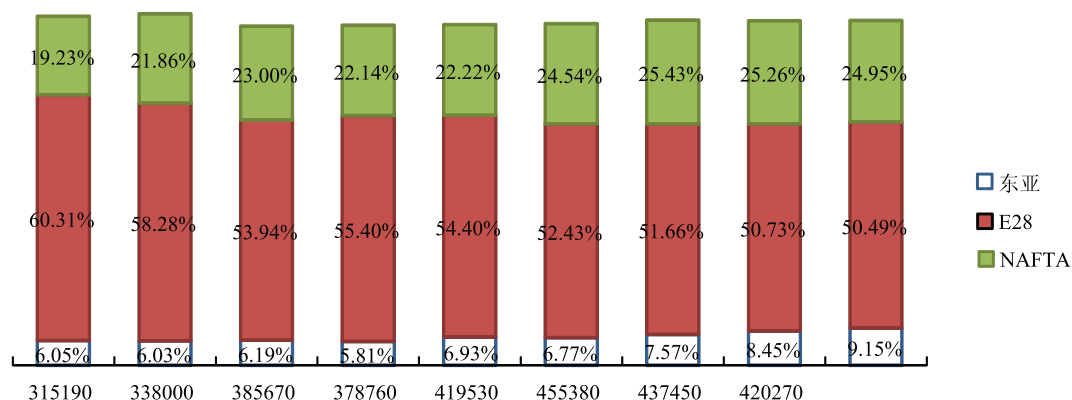


图 13 2008—2016 年三大生产网络金融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比重 (%)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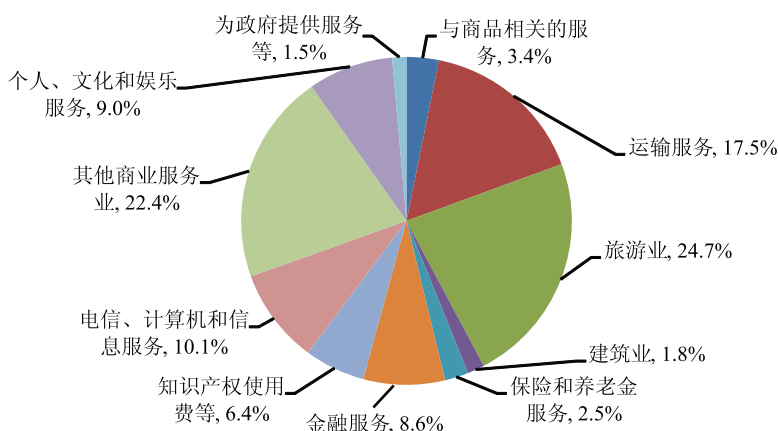


图 14 2016 年主要服务出口贸易的全球占比 (%)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五) 创新能力在三大网络呈现不同特征

由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编的 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瑞士、瑞典、荷兰、美国 and 英国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新力的国家，德国、韩国、加拿大、日本、法国、中国分别位列第 10、11、15、16、18、25 位。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7 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示，在过去几年中，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中日韩三国创新活跃。中国的专利申请在高水平基础上增长了 21.5%，商标备案活动增长 30.8%、工业设计增长 14.3%；日本的商标备案活动增加 30.8%；但韩国知识产权备案活动有所下降，专利申请数增加 2.3%，工业设计和商标备案活动分别下降 1.7% 和 4.6%。北美生产网络中，美国是创新强国，其专利申请、商标和工业设计分别增长 2.7%、5.5% 和 12.1%；加拿大也保持平稳增长。此外，欧盟工业设计备案增长 6.5%。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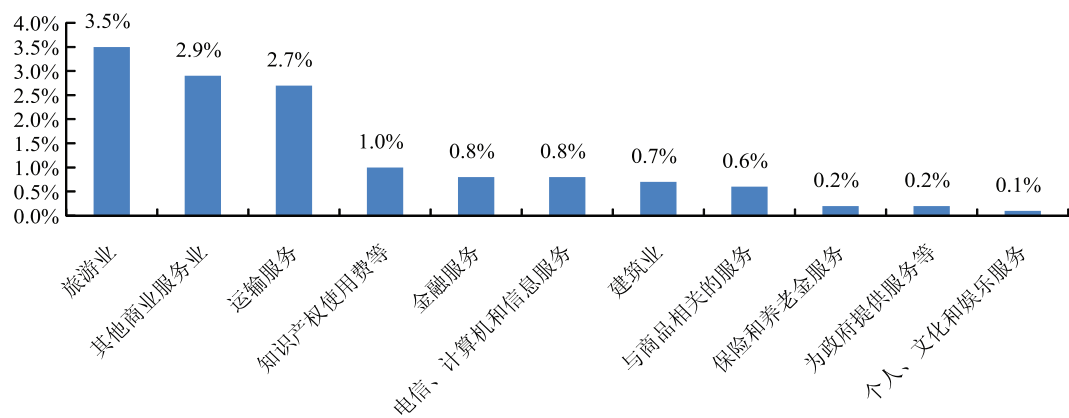


图 15 2016 年东亚地区主要服务出口贸易占世界比重 (%)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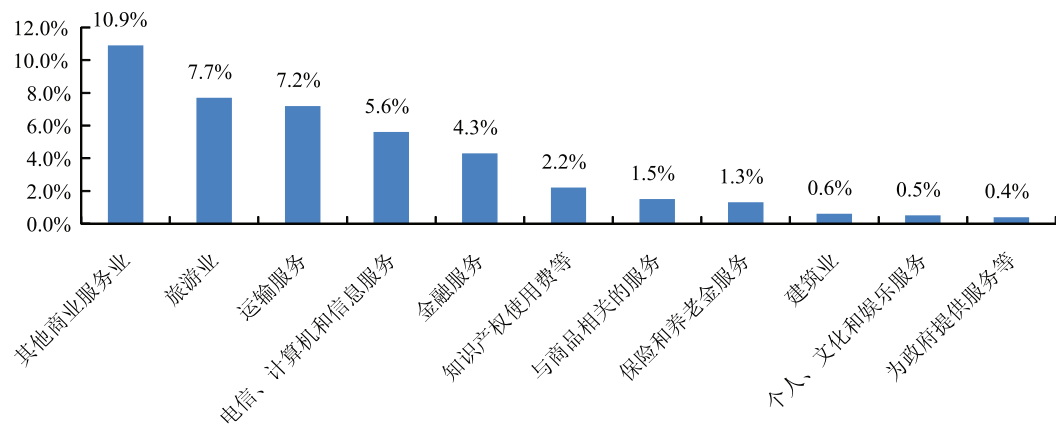


图 16 2016 年欧盟地区主要服务出口贸易占世界比重 (%)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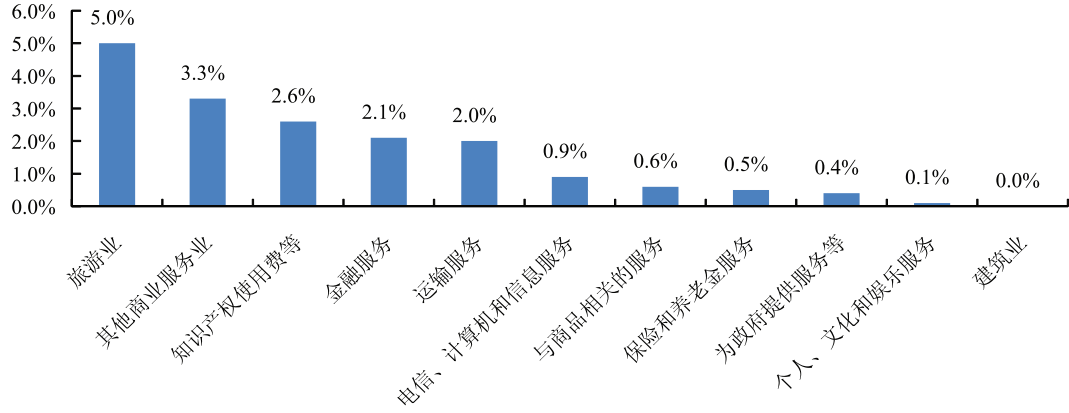


图 17 2016 年北美自由贸易区主要服务出口贸易占世界比重 (%)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来源分类的（居民和国外）知识产权备案活动排名，自 2002 年该报告发布以来，中国每年专利申请数都呈两位数增长，专利申请数、商标备案数和工业设计注册都排在全球第 1 位；日本分别位列第 3、3、7 位；韩国分别名列第 4、8、3 位，韩国单位 GDP 的专利申请量最高。北美生产网络中，美国专利申请数、商标备案数排在全球第 2 位，工业设计注册申请位列第 4；加拿大分别位列第 13、18、27 位；墨西哥分别位列第 34、17、34 位。欧盟生产网络中，德国的专利申请数、商标备案数和工业设计注册分别位列全球第 5、4、2 位；法国分别位于第 8、5、8 位；英国分别位于第 7、7、11 位；意大利分别位于第 11、11、6 位；荷兰分别位于第 9、19、16 位。从公司申请数量排名看，中国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分别占据了专利申请者的前两名，其次是美国高通公司、日本三菱电气公司和韩国 LG 电子，前 10 名申请者名单中，7 家公司来自亚洲、3 家公司来自美国。

从以上数据看，东亚地区是技术创新最活跃的区域，中国已成长为创新大国，日本和韩国的技术创新基础好；北美自贸区中，美国是全球技术创新强国；欧盟区传统的制造业大国依然是全球技术创新中心。

（六）货物贸易和对外投资在东亚地区日趋活跃

东亚地区货物贸易日趋活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见图 1），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货物出口额占全球比重上升 5.1%，进口额占全球比重上升了 3.1%，货物贸易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北美地区货物出口额和进口额占全球比重分别上升了 1.4%；欧盟区货物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下降了 3.3%，进口额占全球比重下降了 5.7%。据相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增长 14.2%；日本出口额增长 11.9%，进口额增长 13.9%；韩国出口额增长 15.8%，进口额增长 17.7%；美国货物进出口总值为 39562.48 亿美元，增长 6.9%；加拿大名义出口额 5493 亿美元，增长 5.3%，进口额 5732 亿美元，增长 4.7%；墨西哥货物贸易总额 8298.2 亿美元，增长 9%；欧盟货物进出口额为 3.73 万亿欧元（4.21 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增长 7.7%，进口额增长 8.2%。对比以上数据可见，2017 年仅东亚地区货物贸易总额呈现两位数增长，货物贸易越来越活跃。

从对外投资看（见图 18），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对外投资保持旺盛增长，从占世界比重的 15%增长到 30%；北美地区对外投资占世界比重增长了 2.5%；欧盟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比重下降了 11.5%。2017 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74 个国家和地区的 6236 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 1246.3 亿美元，同比下降 32%；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加 0.5%，达 18.4905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1 万亿元），连续 3 年增长，较 2012 年几乎翻一番；韩国对外投资 327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7.7%。尽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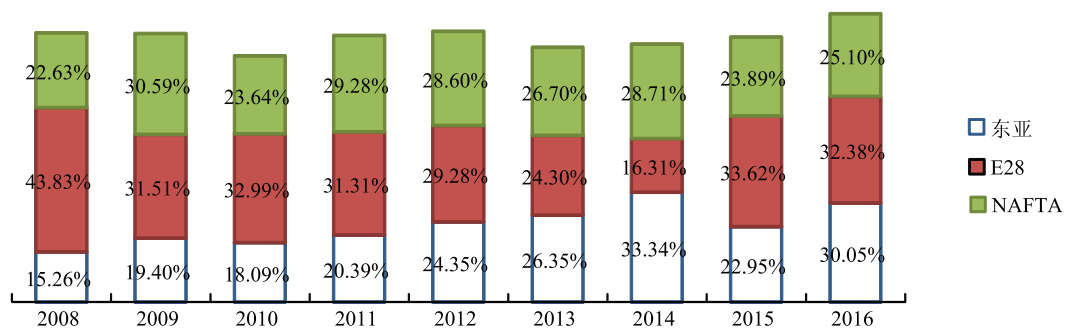


图 18 2008—2016 年三大生产网络对外投资额占世界比重 (%)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中国和韩国 2017 年对外投资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自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对外投资日趋活跃。

三、当前影响三大生产网络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 英国脱欧

英国脱欧在 2017 年底达成第一阶段谈判协议，第二阶段谈判面临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英国脱欧后，欧盟相对稳定的生产网络将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若坚持实行边境控制政策，英国和欧盟间资本、商品、服务和人员将不能自由流通，这将可能迫使欧盟以限制英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来回应，从而对已形成的区域产业链、生产网络造成人为破坏。一方面重新谈判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迫使欧盟企业不得不尽快寻求更多的域外合作，弥补英国脱欧后已有市场与技术合作上的损失。英国与欧盟唇齿相依，2017 年，英国依然是欧盟重要出口国，欧盟是英国第一出口目的地，英国脱欧对德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等欧盟地区的重要制造业生产国的生产形成一定影响。据预测，欧盟 GDP 增长幅度会因英国脱欧缩减 1.54%，英国 GDP 将下跌 4.48%，欧盟可能损失 120 万个工作岗位，远超过英国的 52.6 万个。2017 年，中国出口欧盟区货物贸易额较上年增长 15.5%，中国是欧盟区的重要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与欧盟区制造业存在明显的技术互补关系，英国脱欧可能使欧盟区和英国寻求更多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贸易机遇，维持与推进经济开放，以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促进经济增长。

(二)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修改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自 1994 年生效以来，协定降低或消除大部分商品关税，对促进北美自贸区三国经济一体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在美国看来，北美自贸协定不公平的表征就是美国的巨大贸易逆差。2016 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提出要重塑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他认为这是一项“灾难性的贸易协定”，需进行大规模修改。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对媒体表示，汽车和汽车零部件是改革 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关键领域。2017 年 8 月 16 日，北美自贸协定更新第一轮谈判启动，截止到 2018 年 1 月 29 日，已经进行了六轮谈判。从目前的谈判进展看，北美自贸协定正面临重大调整，仍存在被废除的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结局，将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都造成极大的影响，不得不走向重新调整的道路，三个国家的经贸往来、要素流动将面临更多障碍，已形成的生产网络将面临新的大调整。这必将对全球产业布局、国际分工体系调整变化和 world 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在贸易条约方面，特朗普的谈判团队主张用双边贸易协定来替代多边贸易协定。他们认为，多边谈判机制降低了美国作为一个科技和贸易大国的谈判地位。而由于文化和法律制度的不同，可以在美国严格执行的贸易条约在其他国家未必能够获得同样的执行标准，但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又不足以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因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17 年贸易政策议程报告》，主张“不会原封不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程序，明确美国将无视战后由其自己主导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转而走国内法优先的路线。当前，特朗普政府已将削弱 WTO 的影响力作为美国政策调整的一部分，这预示着国际贸易架构正迎来转折点，对以经济贸易全球化为背景的三大生产网络的发展将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

（三）美国税改法案

特朗普自参加美国总统候选开始就倡导美国税改，吸引美国制造业回归，以强势逆转当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2017 年 12 月 22 日，特朗普签署了 1.5 万亿美元税改法案，法案从 2018 年 1 月开始生效。美国税改法案中关于企业税改主要内容有：将公司税率从 35% 降低至 15%；建立属地税收制度；对美国公司在海外持有的数万亿美元现金一次性征税，鼓励资金回流美国。美国税改政策将对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以及世界经济带来极大的影响。企业所得税降低至 15%，使美国成为低税率国家，一般来说，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流向低税率国家，美国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个税将有利于吸引资本，包括美国自身的资本、其他发达国家的资本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这对三大生产网络的 FDI 流向产生明显影响。企业所得税降低至 15%，对美国公司在海外持有的数万亿美元现金一次性征税，对中国而言，未来部分在华的美资企业只能选择把资本汇回美国。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有海外投资计划的企业，会把美国作为投资目的地首选考虑。事实上，美国工业生产机器人技术发展不断成熟，页岩气技术使得能源价格降低，加上

特朗普上任以来振兴美国制造业，已经掀起了海外建厂的公司开始回归美国和企业迁美潮，这可能导致三大生产网络迎来趋势性拐点，需要进一步跟踪观察。

（四）中美贸易摩擦

2017 年以来，中美从贸易纠纷激化后，美方出台惩罚性关税计划，中方采取反制措施。经过两轮谈判，到 2018 年 5 月 19 日，中美就贸易摩擦的解决达成了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但 5 月 29 日美方又一次发表声明，宣称 6 月 15 日公布对 500 亿美元中国高科技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清单。美方对华的关税威胁始终存在，美国的贸易谈判与威胁交替与反复意味着中美贸易纠纷的长期性，谈判结果的不确定性，两国贸易关系短期内难以稳定下来。中美双方都是全球贸易大国，无论两国贸易谈判的结果怎么样，都将对全球产业链分工产生影响，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必将迎来新的变化。美国的单方面加税可能推进东亚生产网络内部合作、东亚生产网络与欧盟区生产网络的合作更为紧密，激发中国技术创新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步伐加速。

四、三大生产网络发展主要亮点与趋势

（一）“互联网+制造业”是三大生产网络发展新趋势

当前全球工业市场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产品与生产线更新周期缩短、差异不断变大、产品个性化越来越突出，并由此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效率、人才结构与国际分工体系结构调整等挑战。2017 年 9 月，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以物联网、大数据分析、3D 打印和先进机器人为首的新技术将对工业 4.0 的实现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并且这些新技术已经成为判断某国家或地区作为生产基地是否具有吸引力的新因素。以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为例，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17 年度公布的《国际专利申请报告》分析，从产业看，数字通信（8.5%）专利申请占了申请总数的最大份额，其次是计算机技术（8.2%）、电机（6.9%）和医疗技术（6.8%）。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显示，2000 年以来，全球 ICT 技术飞速发展，全球 ICT 出口总额由 9999.08 万美元上升到 19477.07 万美元，扩张了近 2 倍，年均增速为 4.5%。三大生产网络中，各区域 ICT 出口额占世界比重发生了较大变化（见图 19）。2000 年，东亚地区生产网络 ICT 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为 32.56%，略高于欧盟和北美自贸区，但此后呈现连年攀升，2015 年该比重已达到 58.22%；欧盟区占比由 2000 年的 21.32% 下降到 14.03%；北美自贸区占比由 21.24% 下降到 10.89%。三大生产网络 ICT 出口额占世界比重由 2000 年的 81.13% 上升了 2 个百分点，ICT 制造业在这三大生产网络集聚。据通信世界网（CWW）消息，2017 年 ICT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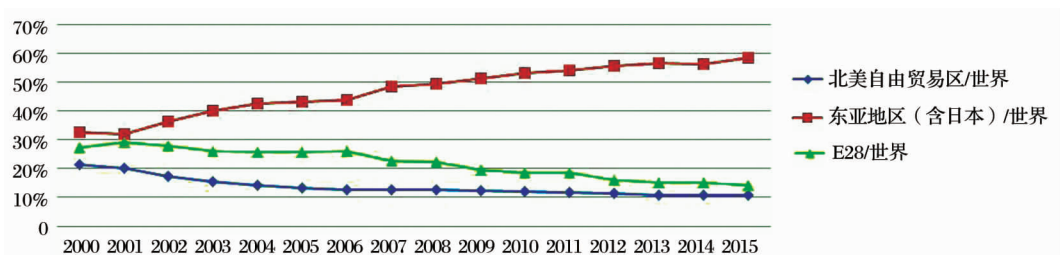


图 19 2000—2015 年三大生产网络 ICT 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业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5G、物联网、5G 承载、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技术成为产业界争相发力的技术热点。据 Medium.com 预测，自动驾驶汽车预计将在 2018 年上市，到 2020 年，人工智能市场将会超过 400 亿美元。2017 年，东亚、北美、欧盟等全球三大生产网络的主要国家均在为 5G 商用、人工智能发展积极准备。2017 年 7 月，中国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进一步把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10 月底，国务院通过了《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加快建设和发展工业互联网，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计划到 2020 年基本完成面向先进制造业的下一代互联网升级改造和配套管理能力建设。日本政府发布了人工智能科技发展战略报告。2017 年底美国国会提出“人工智能未来法案”两党法案。德国较早成立了国家级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在计算神经科学为重点的脑科学研究领域与美国、以色列、法国等国开展多边合作。三大生产网络的 5G、物联网、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新技术为 ICT 行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必将进一步强化 ICT 制造业的集聚。

（二）流通领域新变革推进三大生产网络新调整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发展，中国出现了“第四次零售革命”，将对现有的传统流通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流通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体现为六个方面：融合化、平台化、定制化、智能化、跨界化和大型化。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252.8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7%；社会物流总费用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2%；物流业总收入 8.8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1.5%。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物流市场。同时，中国公路、铁路货运量和港口吞吐量多年来位于世界第一。根据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预测，2018 年，随着中国物流业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预计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 14% 以下，物流运行效率进入快速提升期。同时，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物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工业品物流中的高端物流以及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的物流需求进一步快速增长。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通过供应链等方式推

进企业运营转型，可使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 15% 以上；而通过发展全球供应链等方式，还可使劳动生产率再提升 10% 以上。物流业的快速发展，为跨境电商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条件。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跨境电商整体交易规模（含零售及 B2B）达 7.6 万亿元，2018 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预计将增至 9.0 万亿元。

陈文玲研究认为，^① 频次比较高的贸易的市场功能要大大高于传统贸易方式，集聚了消费者、生产者和供应商，形成了新的市场主体——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以及由此派生的合作网络体系，使市场功能空前强大。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流通业、制造业、服务业、互联网跨界融合趋势更加明显。在生产成本、市场竞争等压力下，伴随着商业模式创新和跨境电子商务海外仓的建设，定制化生产、智能制造将成为越来越多的生产制造企业的发展方向。流通业领域的新变革必将与全球制造业升级互促互进，中国可能在跨境电商和流通领域实现率先突破，三大生产网络将因适应流通领域的新变革呈现新的产业布局与分工调整。

（三）智能制造成为制造业企业的硬实力

自动化成为传统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智能硬件正引领新的数字化浪潮，云 + 人工智能正驱动所有的行业变革，智能制造成为当前全球产业竞争的重要制高点。德国的“工业 4.0”、中国的“中国制造 2025”、韩国的“制造业革新 3.0”战略、日本的“社会 5.0”战略，其核心都指向智能制造。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预测，2015—2018 年，德国、北美、韩国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工业机器人数量预计将持续增长。对于低成本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国家来说，工业机器人将为其调整制造业战略、保持原有优势提供契机。能够节约人力成本，对生产力产生数量级提升的工业机器人必将改变全球制造业的格局。

参考文献：

1. 卢进勇、杨杰、郭凌威：《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变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6 年第 7 期。
2. 刘中伟：《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当代亚太》2014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李蕊

^①陈文玲：《下一代贸易方式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宏网，2017 年 9 月 21 日。

创新经济制高点的争夺： 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本质及中国应对策略

曾志敏 陆芃樵 张若梅

摘要：2018 年以来，美国以巨额贸易逆差为由持续操作贸易议题，率先发起对华贸易战。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是由全球产业链重构、美国对高科技产业的出口限制和美国金融市场的独特地位等多重因素造成。美国以“232 条款”和“301 条款”为依据发动贸易战明显违反全球贸易规则，其战略意图在于通过贸易战巩固其占据全球科技和创新经济制高点的优势地位，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面对美国操纵的贸易战、企业战和人才战等系统化的科技遏制策略，中国必须旗帜鲜明地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开放，全面加快建设内生型科技创新大国。

关键词：贸易战 科技遏制 创新经济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曾志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陆芃樵，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策分析师；

张若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策分析师。

引 言

中美贸易摩擦自 2018 年 3 月之后骤然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 3 月 8 日依据美国商务部进行的“232 调查”结果签署公告，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尽管中国不是美国钢铝进口的倚重国，但分析普遍认为这一举动指向的就是中国这个钢铁、铝第一生产大国。在美国商务部公开的针对钢铁产品的“232 调查”报告中，中国被提到 265 次，远远超过位列美国进口钢材最大来源国加拿大（被提到 28

次)；类似地，在针对铝产品的调查报告中，中国被提及 351 次，而同样作为美国进口铝产品最大来源国的加拿大仅被提及 130 次。此外，美国将除中国以外绝大多数进口钢铝来源国纳入了钢铝进口关税豁免国名单中，并通过各种渠道要求各国采取行动防止中国钢铝通过第三国间接进入美国。3 月 22 日，针对中国的贸易举措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据“301 调查”结果签署总统备忘录，计划对 500 亿~6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该备忘录还要求美国财政部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并在 60 日以内敲定细节，意图限制中国为获取最新技术而收购美国企业。随后，美国根据该备忘录的要求于 3 月 23 日就侵犯知识产权问题正式向 WTO 起诉中国。在中国展现出坚决回击的态度并开出对美国产品的征税清单之后，特朗普更是公开表示计划再额外对价值 10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美国这一系列的动作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剧烈震荡，在 3 月 22 日特朗普开出针对中国的巨额贸易罚单之后，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暴跌，欧洲股市、中国沪指、中国深指、香港恒生指数、日经指数等都应声遭受重挫。

尽管特朗普掀起的对华贸易战让国内外许多分析人士感到错愕，但如果结合美国当前对华战略的大反思、大调整的背景来观察，又可谓意料之中。近年来，美国精英阶层要求重新审视对华战略的呼声空前高涨，围绕着自尼克松总统以来持续实施的对华接触战略的成效，美国对对华战略的目标定位，未来中国政策的走向以及中国发展的前景等方面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从这场辩论中不难发觉，尽管关于新的对华战略的内容存在分歧，但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的观感朝负面方向发展是毋庸置疑的，要求遏制中国的声音趋于主流，这种变化也深刻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取向。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在一系列的官方权威报告中，美国都将中国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挑战。比如，2017 年 12 月发布的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判定其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并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再如，2018 年 1 月由五角大楼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同样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它们对美军构成的威胁更甚于恐怖主义。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中美之间在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竞争无疑都将进一步加剧，甚至有逐步滑向新冷战的风险。而此番贸易战即为升级中的中美战略竞争的最新反映。

可见，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显然不是如表面上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要通过经济对立形成对中国经济遏制的绝对优势，尤其要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技术创新领域的发展潜力，从而在长期经济对立中逐渐消耗中国国力。鉴于美国这样的战略目的，中国在有理有据有力地回击美国贸易挑衅，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同时，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在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一系列深刻复杂变化、传统地缘政治加速回归、大国间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政治化将渐成大国交往中的常态。中国过去主要依靠技术引进、跨

境并购、合资企业等外生性科技与技术创新发展道路已经越来越窄，甚至可以说已经走到尽头，当前别无选择地必须全面加快内生性创新经济体系的建设步伐。

一、美国贸易赤字成因及对华贸易战的战略目的

巨额贸易逆差是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自竞选美国总统以来始终的心病。在特朗普及其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等为代表的美国新一代经济民族主义者眼中，世界其他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通过有意识地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的市场和设置贸易壁垒逐步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导致投资、工作机会和技术大量外流，对美国国家经济的发展形成巨大威胁。^①而中美贸易逆差近年来持续占据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40%以上，2017年更是攀升至3752亿美元。这自然让特朗普政府如鲠在喉。在其看来，如此庞大的贸易逆差形成的关键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目的地“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包括强制要求进入中国的美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在中国政府援助下以获取技术为目的收购美国企业、通过网络攻击获取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等。

为此，中国政府自2016年以来持续积极地与美国政府沟通，向其解释中美间贸易赤字形成的复杂背景，并希望以对话谈判的方式，通过双方共同的努力来逐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这些努力一度取得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如中美百日行动计划等），但特朗普政府最终还是误判或有意地忽视了美国贸易赤字形成的多重因素，执意使用了可能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造成巨大负面冲击的不合法手段来挑起中美贸易战，其背后遏制中国创新经济发展的意图昭然若揭。

（一）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多元成因

白宫中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执着地认为中国有意通过不公平的“国家资本主义”手段来扭曲中美贸易，获取大量的贸易逆差。然而，剖析美国贸易逆差的构成和形成历史不难发现，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是由全球产业链的重构、美国对高科技产业的出口限制和美国金融市场的独特地位等一系列因素造成，将矛头单单指向中国，无疑别有用意。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成为全球诸多制造行业的最终集散地中美贸易逆差形成的最关键因素。相关研究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与东亚各国在工业制成品方面的贸易逆差总体上增长不大，区别就在于中国成为了“总装车间”——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将零部件输入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相对较低的

^①吴其胜：《特朗普贸易新政：理念、议程与制约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第124～138页。

中国，由中国加工完成后再输往美国。^① 如果去除掉“中间产品”的价值，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将显著缩减。

美国政府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也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相关研究指出，如果美国将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对法国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有望缩减 20.28%~33.74%，如果降至美国对巴西的水平，则可以缩减 5.95%~24.38%。即使是将现有的对华出口管制放松至 1998 年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程度，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都可缩减 7.90%~16.79%。^② 此外，美国金融市场的独特地位也对中美贸易逆差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由于美国的金融市场完备灵活，市场化程度极高且又没有资本壁垒约束，导致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理想避风港。分析指出，美国吸纳了全球近半数的净资本出口（大量的中国资本也概莫能外），这促使美元保持坚挺，从而实际上使得美国不可避免地出现贸易赤字。^③

当然，中国各行业开放的程度不同也对中美贸易失衡负有一定责任。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服务业，这对于制造业优势并不突出而服务业发达（尤其高价值的服务领域）的美国而言，难以完全发挥其优势。但服务行业开放的相对滞后是多方面复杂因素造成的，以金融为代表的服务业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管理不善，对于经济发展总体仍在爬坡上坎的中国而言，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中国对于这一领域的开放格外谨慎，确实情有可原。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始终未停止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的步伐，也始终就此保持着与美方的密切沟通，愿意和美国在高价值服务领域就改善中国的市场准入状况等问题进行谈判。在 2018 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中国将“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开放。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在 2018 年 4 月的博鳌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又宣布了多项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承诺放开市场准入（尤其是在金融业和汽车行业）。假以时日，美国相关企业在中国施展拳脚的空间将更为

①HUANG Y, STACK D. Trump's Unnecessary Trade War with China. 2018-04-20,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rumps-unnecessary-trade-war-china-20308>.

②LI B, YANG X. Political Barriers in U. S. Exports to China and U. S. —China Trade Deficits. 2018-04-20,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4/10/political-barriers-in-u.s.-exports-to-china-and-u.s.-china-trade-deficits-pub-68631>.

③PETTIS M. Actually, Americans Don't Spend Too Much. 2018-4-20, <https://www.bloomberg.com/view/articles/2017-05-08/actually-americans-don-t-spend-too-much-and-save-too-little>.

广阔，这对中美贸易逆差的缩减无疑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贸易战发起的手段非法性

美国在发起此次贸易战的过程中依据的是美国 1962 年《贸易扩张法》的 232 条款和 1974 年《贸易法》中的 301 条款。前者赋予了美国行政机关立案调查特定产品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权力，而且美国总统有权根据调查结果通过关税或配额等方式来限制该产品的进口。特朗普于 2018 年 3 月 8 日宣布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依据的便是，2017 年 4 月 27 日应他要求由美国商务部启动的 232 调查。而后者赋予了美国政府对违反贸易协定或是参与不正当竞争的国家进行调查和单方面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从本质上而言，美国无论是依据 232 条款还是 301 条款对外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都是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将国际贸易秩序推入丛林化深渊、具有极强的单边主义色彩的恶劣行径。

具体而言，美国依据 232 条款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理由牵强且破坏性极大。232 条款本身是基于国家安全这一比较含糊的理由。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法规中确实有国家安全的例外条款，即 1994 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第 21 条。它规定缔约方有权“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这一条款在 1947 年成立的最早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便存在，并一直保留下来。^① 美国方面主张依据 232 条款对外国产品加征关税并不违反贸易规则的看法所援引的法律依据也基本为这一条款。然而，与反倾销、反补贴等不同，“国家安全”在 WTO 的法规中除上述第 21 条外没有其他明确的规则，WTO 专家组及相关机构也从未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进行过讨论与释明。换言之，某种意义上存在着所有国家都援引这一条款来滥加关税的可能性。因此，一直以来世界各国对这一条款的使用都极为慎重，为的也是防止其滥用导致国际贸易秩序的崩溃。美国亦是如此，自 1962 年《贸易扩张法》颁布以来，虽然发起了 28 起 232 调查，但最终决定采取措施的先例却屈指可数，在近 40 年内只针对利比亚原油采取过禁运措施。这次美国使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无疑非常牵强，将国民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明显违反了该条款的宗旨，是对“国家安全”概念的肆意扩大解释，创下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依据 301 条款来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同样是倒行逆施。根据美国法律，有三个渠道可以触发该条款：一是总统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二是利害关系人或团体向美国贸易代表发出申请；三是贸易代表根据“特殊 301 条款”自行发起。启动 301 调查本身不等同于贸易报复措施的施行，在经过美国贸易代表启动调查、进行取证、认定

^①LINDSAY P. The Ambiguity of Gatt Article XXI: Subtle Success or Rampant Failure? *Duke Law Journal*, 2003, 52 (6): 1277—1313.

事实这一往往耗时在 6 个月以上的过程之后，若调查认定事实确凿，则美国政府可以选择与有关国家展开贸易谈判和协商，也可以直接采取贸易报复措施。此次总统备忘录依据的便是 2017 年 8 月由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起的 301 调查。

301 条款本身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曾间接地推动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深化。在 1995 年 WTO 建立之前，全球贸易体制的基础是于 1948 年起实施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者主要规范和推动国家间商品贸易，致力于清除缔约成员间的关税壁垒。然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尽管关税壁垒逐渐消减，非关税壁垒却不断涌现，而规范商品贸易之外的国际经济活动（包括服务贸易、政府采购、国际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和反竞争性行为等）的国际规则更是迟迟未得到建立。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 1974 年《贸易法》，其中的 301 条款被美国政府频频启动以救济遭受非关税壁垒和其他被美国视为扭曲自由公平贸易的政策打压的美国企业。在里根政府时期，301 条款作为迫使各国开放市场的工具被大量使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借助 301 条款这一大棒的威慑，推动各国通过多边谈判来建立针对非关税壁垒和商品贸易以外国际经济活动的规则，进一步深化了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完善，并最终促成了 1995 年 WTO 的成立。^①

但是，即使是在 301 条款被频繁启动的 20 世纪 80 年代，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也备受质疑。因为，在这一条款下美国政府实际上同时扮演了“警察”（发现外国政府的“非法”行为）、“检察官”（发起司法挑战）、“陪审团”（确认事实）和“法官”（进行最终裁决）的角色。^② 在当下美国作为贸易争端的一方单边地通过 301 条款来对他国施加严厉惩罚，其合法性更是荡然无存。如前所述，WTO 成立以后，针对非关税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广为接受的硬性规则，并为成员国提供了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裁决和救济渠道。这就是为何 1995 年之后美国政府极少启动 301 条款，即使启动也最终与发生争端的国家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问题。

一言以蔽之，中美同为 WTO 成员，美国完全可以循合法轨道来疏解自身不满。但跳脱 WTO 框架，再次端出 232 条款或 301 条款来加征关税则无异于逆历史潮流而动。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不仅法理难容，更会动摇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冲击。

^①BOWN, C P. Rogue 301: Trump to Dust Off Another Outdated US Trade Law? 2018-4-20, <https://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rogue-301-trump-dust-another-outdated-us-trade-law>.

^②PUCKETT L, REYNOLDS W. Rules, Sanctions and Enforcement under Section 301: At Odds with the WTO?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6, 90 (4): 675-689.

（三）美对华贸易战的战略目的

对于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多元成因以及利用 232 条款和 301 条款对外国进口产品强征关税的非法性，美国许多学界、商界和政界精英都有清晰认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国贸易失衡的状况在近年来已经有了显著改善。从中国的角度而言，2016 年美国占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比重已经只占 50%，这比起 2003、2004 年左右动辄超过 200% 的比例，堪称是巨大的进步。从美国的角度而言，2016 年以来，美国经济一路向好，美国的贸易逆差占整个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是处于下降趋势，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 GDP 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6% 以上，下降到如今的 4%。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何特朗普政府还要就对华贸易逆差大做文章，执意挑起与中国的贸易冲突呢？显然，“国家安全”“贸易逆差”或者“知识产权”并不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关键。在美国调整对华战略，中美间全面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此次贸易战极有可能是美国在经济领域试图扩大对华战略优势的一次冒险出击。具体而言，美国试图通过贸易战巩固其占据全球科技和创新经济制高点的优势地位，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创新领域发展的步伐，持续延续其科技和创新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进而在中美全面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二、美国对华创新经济遏制的三大策略

为达成遏制中国创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的，美国采取了多重策略，分别指向科技创新的动力（贸易）、主体（企业）和关键要素（人才）。

（一）贸易战：关税矛头指向“中国制造 2025”

依据“301”调查结果，特朗普政府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部分行业加征关税，这些行业具体涵盖了以下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自动执行功能的高档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海洋工程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装备、高铁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这十大领域与“中国制造 2025”计划中所列的领域完全一致，美国通过贸易战来遏制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策略显而易见。^①

实际上，美国方面也从未掩盖过通过贸易战来破坏“中国制造 2025”计划的战略意图。此次对华贸易战的两位主要推手，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都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关税瞄准的就是 2025 计划的重点推进行业。在此次“301”调查的报告中，“中国制造 2025”被提及 114 次之多，而且报告中还通过指出在高端技术制

^① 易继明、李春晖：《美对华启动 301 调查与我国的应对措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第 65～81 页。

制造业方面中美两国在全球所占的份额（美国为 29%，中国紧随其后占 27%），来佐证中国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对美国形成的巨大威胁。通过加征巨额关税，美国企图削弱中国制造业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在保护美国国内高端制造业的同时，阻滞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布局。

（二）企业战：限制收购美国高新科技企业及技术出口

特朗普签署的总统备忘录要求美国财政部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并在 60 日以内敲定细节。这一举措可能和国会正在讨论的外国在美投资审查委员会改革相结合，进一步扩大中国对美投资的审查范围和力度。这一方面是中美间贸易博弈背景下产生的衍生性结果，以限制中国收购美国高新科技企业作为美国贸易制裁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反映出处于全球科技竞争环境下，美国对科技中国崛起的恐慌。中国企业近年来对美国高科技领域展现出强烈的投资意愿：2013—2016 年，中国平均每年在美国高科技及创新产业的投资约为 90 亿美元。^① 目前美国已经采取收紧中国在美投资敏感区域的政策（如人工智能、半导体以及先进材料），改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限制新兴技术领域并购）以及设定中俄为“特别关切国家”（增加严格审查条款），致使 2017 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案件数量增长 40%。另外，美国还可能考虑启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遏制中国在美收购敏感技术，该法允许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依此对威胁国家安全的交易叫停。

对于中国高科技龙头企业在美国的发展，美国尤其忌惮。华为在美国的多次企业并购、专利收购和与通信运营商的交易都被美国政府强行叫停。2018 年 3 月，新加坡博通公司收购高通案进入审批程序后，美国政府更是以担忧高通被收购后，华为会取而代之成为 5G 无线标准的领导者的理由而否定了这笔收购。最新案例还包括美国商务部 4 月 16 日宣布的对中兴采取的出口管制措施，该措施禁止中兴通讯在未来 7 年内向任何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和技术。

另外，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主要针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尤其是航空产品、现代铁路、新能源汽车和高科技产品等。一方面，美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限制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以避免中国获得核心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出口限制直接关闭中美技术贸易市场，以减缓中国高新技术发展步伐。^②

^①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Chinese Investment in Critical U. S. Technology: Risks to U. S. Security Interests, 2018-04-20, <https://www.cfr.org/report/chinese-investment-critical-us-technology-risks-us-security-interests>.

^②张明、薛威、陈晓：《中美贸易战升级情景：美国来自贸易之外的后手》，格隆汇，2018 年 4 月 4 日，<https://www.gelonghui.com/p/173066>。

表 1 美国限制华为在美发展的不完全记录

2008 年	华为试图与贝恩资本联合并购 3Com，遭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
2009 年	华为与 AT&T 设备合约遭到美国国家安全局干预
2010 年	华为与 Sprint4GS 设备合约遭到美国商务部干预
2010 年	华为试图收购摩托罗拉公司的无线资产遭到美国政府拒绝
2010 年	华为试图并购宽带网络软件厂商 2Wire，因并购方担忧政府否决而失败
2010 年	华为试图收购 3Leaf 的专利技术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认定“威胁美国安全”
2012 年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判定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2018 年	华为与 AT&T 的销售合作计划因遭到美国 18 名国会议员联名反对，最终流产，Verizon 随后也中止与华为的交易计划
2018 年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计划阻止接受美国政府补贴的电信运营商使用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供应商。该计划直接针对华为和中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报道整理而得。

（三）人才战：破坏“千人计划”及争夺高端人才

目前，美国对中国政府吸纳海外高科技人才的“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等日益警惕，打击华裔学者和留学生通过在美国学习工作“窃取”核心技术的所谓“间谍”行为的监控网络和措施日益严厉，国际高端人才争夺战愈加激烈。^① 2008 年后，美国政府指控违反《经济间谍法》的被告人中华人数量从 17% 上升为 53%。而被指控者存在以下共性特征：第一，研究集中在生物医药技术、能源资源、经济金融、信息科学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第二，被指控者均是“千人计划”入选者，是中国计划积极引进的技术领域专家；第三，被指控者逮捕前遭受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长期监控，并以“经济间谍”罪起诉，结果多为赔偿和入狱，处理手段较为极端；第四，美国“反千人计划”手段呈现马基雅维利主义特征，凡是加入“千人计划”的华裔科学家自动进入 FBI 监控范围内，而小范围的“旅美科协”也成为关注对象。

美国政府一方面极力破坏中国引才战略，同时也以各种威逼利诱手段争夺中国尖端科技人才。而这些人才特征也极为明显：第一，人才曾在美国知名院校留学或工作，且学科领域为生物制药、人工智能以及能源资源等领域；第二，人才在中国学科领域中具有高显示度和指向性，能产生引才舆论效应；第三，人才在中国众多科技基金项目中获得大额资助。

^①魏立才、赵炬明：《“青年千人计划”政策考察与建议——基于对第一至五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信息的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 年第 5 期，第 81～87 页。

三、主要结论与中国应对策略

（一）主要结论

此次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爆发表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方位展开的对华科技创新遏制，中国过去长期依赖的外生性科技与技术创新发展之路已经走到头，必须要全面加速内生性创新经济体系建设的步伐。

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科技创新格局，中国正在美欧日等拥有科技优势的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发起全面追赶，并且已经在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国已经与欧洲和日本同处世界创新格局下的第二梯队，并且与第一梯队的美国的差距也在缩小。面对中国强势崛起的时代格局，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经济活动日益警惕，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艰巨，尤其是并购西方高科技企业或收购核心专利的空间将急剧缩小。

警惕中国海外并购的阵线也从美国逐渐延伸至日本、欧洲、澳大利亚等地，遏制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统一阵线”似乎正在成形。例如，2017 年 7 月德国联邦政府通过加强监管外国投资的新法规，将并购调查范围延伸到提供战略性产业服务或软体的企业。根据新规，若并购涉及所谓的“核心基础设施”，德国政府就将阻止并购。欧洲其他大国的类似法规也都在酝酿之中。不仅限于中资的海外并购，即使是在国内，越来越多的欧美科技型企业对于与中国企业合资经营也体现出愈来愈大的顾虑。

因此，当前应对美国对华贸易战，尤其要与美国竞争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中国不能将眼光局限在贸易报复措施，而是要将贸易战置于如何加快促进中国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大局之下进行通盘思考，尤其避免堕入军事竞赛，进而陷入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陷阱。美苏冷战期间，军民融合的良好机制极大促进了美国的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但苏联的国民经济却陷入了崩溃境地。若国家不信任民营经济，一旦中美新冷战爆发，就可能促使国有资本全面侵入国民经济的每个领域，进而可能严重抑制创新活力和经济效率，从而导致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二）应对策略

关于中国应对贸易战的主要策略，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资本无国界”且无意识形态。中国需要通过进一步推动深层次的经济制度改革和市场化开放（尤其是服务业）来吸引外国资本，消除贸易逆差产生的部分结构性障碍，创造对中国有利的国际舆论，以外部压力促进国内经济的深度转型升级。在强调加大对外开放中拓展发展空间的基础上，中国必须全面加快建设成为内生型科技创新大国。这是中国在

经济问题政治化、大国间全面竞争加剧的态势下延续崛起势头，并最终占领世界科技创新制高点的根本之道。对此，中国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其一，加快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推进步伐。美国科技创新（尤其是基础研究体系）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就是美国体系完备的国家实验室。尤其是美国能源部辖属的国家实验室，在服务美国国家战略规划、开展前沿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转移方面功勋卓著，高效地将学术界和工业界联通，在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战略性地位。中国从 2000 年起也仿效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制度，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实验室。但到目前为至，除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正式获批成立外，其余 14 个列入试点的国家实验室仍处于筹建状态。国家应以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为平台抓手，培养和引进一批国际同行认可的领军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学术骨干，组建高水平科研管理团队，从而提升区域乃至国家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话语权。

其二，将关键创新要素的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国家实验室等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创新平台的布局，必须考虑到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人才储备。纵观美国联邦实验室的发展历程，战略性的创新平台往往集中于人口、经济、文化要素高度聚集的大城市群。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智力基础和科技转化应用的广阔空间，而前者为后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方向。中国在布局战略性重大创新平台时，应着重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优先考虑国内已经日趋成熟的世界级城市群。目前已建或筹建的国家级实验室无一落户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局面亟需改变。

其三，打破限制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约束。创新的驱动渠道主要有三种：资源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革新。中国目前在制度革新方面仍有长足的进步空间。目前，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无缝链接的体制机制渠道仍亟需理清，政府需要探索各种方式让企业参与到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中，让企业的需求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创新任务的初始阶段就能够被纳入考量，从而激发三者间的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①同时，中国的创新激励机制也有待革新，探索赋予创新团队更自由的科技探索空间、更大的资源支配权、更灵活的薪酬和奖励制度以及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刻不容缓。

其四，主要吸纳民营经济推进实施军民融合。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着力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发展，切实推动军、民用技术

^①赵哲：《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高等教育管理》2016 年第 5 期，第 52～56 页。

的相互交流和转化，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从国际军民融合发展产业经验看，美国军民融合模式起于冷战后期，从“先军后民，以军带民”政策转为“军用和民用工业基础融合战略”。其中，典型军转民成功案例便是阿波罗计划，政府盈利的同时也催生了 3000 多类新技术，如火箭、雷达、合成材料以及计算机等。民营企业也成为了美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主体，订单量超过国防总部订单总量的 90%。但苏联则与美国相反，将军工企业发展放置国家发展的中心地位，忽视民用工业对产业经济的推动，在其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曾面临崩溃的险境。目前俄罗斯也在积极推进军转民策略，例如俄罗斯最有成效的军民两用技术就是 GLONASS 全球导航定位军民两用卫星系统。^①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都将国防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并根据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积极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② 从中国目前军民融合现实需求来看，军工信息化建设迫在眉睫，而其方向则是引导优势民营企业、优质的社会资源进入军工产业领域并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军民互利。

参考文献：

1. 魏立才、赵炬明：《“青年千人计划”政策考察与建议——基于对第一至五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信息的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 年第 5 期。
2. 赵哲：《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高等教育管理》2016 年第 5 期。
3. 张纪海、乔静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模式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
4. 薛惠锋：《军民两用技术——国际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17 年第 19 期。
5. 吴其胜：《特朗普贸易新政：理念、议程与制约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18 年第 1 期。
6. 易继明、李春晖：《美对华启动 301 调查与我国的应对措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7. PUCKETT L, REYNOLDS W. Rules, Sanctions and Enforcement under Section 301: At Odds with the WTO?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6, 90 (4).
8. LINDSAY P. The Ambiguity of Gatt Article XXI: Subtle Success or Rampant Failure? *Duke Law Journal*, 2003, 52 (6).

责任编辑：李 蕊

^①张纪海、乔静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模式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第 111～116 页。

^②薛惠锋：《军民两用技术——国际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17 年第 19 期，第 8～10 页。

我国自由港建设的机制及实践探索^{*}

王珍珍 陈 婷 赵富蓉

摘要：作为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以及更重要的法律和监管方面的全方位变革，自由港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本文分别从区位优势、制度创新、物流网络、教育体系以及国家政策等五个方面深入分析自由港建设的运作机制，以上海港、海南港以及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釜山等国际上著名的自由港为例，探讨这些港口在自由港建设过程中所具备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我国自由港建设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自由港 建设机制 国际经验

作者简介：王珍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陈 婷，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在读研究生；

赵富蓉，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在读研究生。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在海南建省 3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自由贸易试验区

^{*}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重大项目《强化福建自贸试验区在“一带一路”中的功能定位研究》以及福建省社科规划基地重大项目《福建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协同发展研究》的阶段性和成果。

叠加自由贸易港政策，海南再次迎来改革开放重大机遇。国内多个自贸试验区提出以自由港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新高地和新标杆。那么，自由港到底建什么、如何建、其内在的运作机制如何？一时成为海内外共同关注的话题，可以说这是中国用更高标准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表现。现有的自贸试验区以及保税区、保税港区等如何理性认识和充分把握发展契机，这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转变的必然要求。因此，结合国外自由港建设的实践，探索我国自由港建设的内在运作机制意义重大。

一、相关概念及文献综述

作为全球供应链中货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汇集中转的重要节点，自由港在各国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往来、外向型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在腓尼基时期（前 1101 年—241 年）（Robert C. Haywood, 2000）就已经出现了自由港的雏形即自由码头（邹俊善，1992）^①。第一代自由港兴起于 16—17 世纪的欧洲地中海沿岸，主要是伴随着殖民扩张逐步成为帝国主义全球商品贸易网络中的节点，即转口贸易。第二代自由港产生于二战后，在功能上新增了较高增值性的“工业制造”功能，即工贸结合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自由港逐步成为综合运筹国际贸易和物流信息的资源配置中心、多功能集成平台、专业化新型自由区、港城融合区等，其资源配置能力在不断地提升，此为第三代自由港，即综合型贸易港。而第四代自由港则是伴随着现代供应链管理的发展而兴起的，更多表现为与港口城市高度融合的自由港市。

作为一种特殊经济功能区，自由港与自由区、自由经济区、自由贸易园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都是属于一国自主性开放的范畴，即一国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自主决定对某一产业（领域）实行比先前更加开放的政策，或者自主决定在一定区域（园区）内实行贸易投资优惠政策或实行“境内关外”（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自由贸易政策（崔卫杰，2018）。但相比较于其他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来说，“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汪洋，2017）。^② 目前国内研究中很多把“自由港”和“自由贸易港”的概念等同，事实上从自由贸易港的定义来看，自由贸易港是指“设在国家与地区境内、海关管理关卡之外的，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的港口区。对进出港区的全部或大部分货物免征关税，

^① 邹俊善：《自由港的概念和自由港的发展趋势（上）》，《水运管理》1992 年第 1 期，第 44～47 页。

^② 汪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人民日报》2017 年 11 月 7 日。

并且准许在自由港贸易内，开展货物自由储存、展览、拆散、改装、重新包装、整理、加工和制造等业务活动”。将其进行比较后发现二者的描述还是存在细微的区别：“自由贸易港”的概念表述中更突出强调了其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功能，强调在港区内所实现的货物的价值增值；而“自由港”概念中除了强调货物自由之外，更加强调人员进出自由、货物流通自由等，不仅仅是港口贸易便利化，更加强调围绕投资、金融、法治和新兴要素便利流动而开展的一系列制度创新。

国外学者对自由港的探讨主要围绕市场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生产共享论等基本理论进行探索（赫希曼，1958）。《京都公约》中专门明确了自由区（FreeZone）的概念。理查德·S·拖曼在《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中较早界定了自由港与自由贸易区的概念，麦克尔威和雷耶斯合著的《港口开发》对其功能进行了界定。在实证研究方面主要探讨其所带来的经济效应。Cling等（2005）研究了马达加斯加的出口加工区建设对出口贸易和就业的带动作用。^① Seyoum和Ramirez（2012）发现美国对外贸易区的设立能增强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② Jenkins和Arce（2015）认为对当地市场的重视有利于提升出口加工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后向关联带动效应。^③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中国特殊经济功能区的研究。如自由贸易区（黄茂兴等，2018）、^④ 自由贸易港区（赵晓雷，2017）、^⑤ 保税港区（王文静，2009）、^⑥ 自由贸易试验园区（陈宗胜和吴志强，2016）^⑦ 等。目前大多数的观点认为自由港比自贸区的范围更广、自由度更大。二是关于自由港基本要素的分析。如自由港的类型（魏燕慎，1985），^⑧ 自由港的特征（成思危，2003），^⑨ 自由港的功能定位（黄志勇和李京文，

①Cling J P, Razafindrakoto M, Roubaud F.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in Madagascar: a success story under threat?*.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 (5): 785—803.

②Seyoum B, Ramirez J. *Foreign trade zo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proposal for trade agreement parity*. 2012, 39 (1): 13—30.

③Jenkins M, Arce R. *Do backward linkages in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increase dynamicall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osta Ric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5, 69 (2).

④佚名：《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黄茂兴：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http://fjnews.fjsen.com/2018-03/13/content_20815288_all.htm。

⑤赵晓雷：《建设自由贸易港区将进一步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全方位开放水平》，《经济学家》2017年第12期，第11～12页。

⑥王文静：《浅谈中国保税港区向自由港的转型》，《交通企业管理》2009年第10期，第38～39页。

⑦陈宗胜、吴志强：《论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意义、目标及难点》，《全球化》2017年第3期，第64～79页。

⑧魏燕慎：《世界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及其前景》，《瞭望》1985年第5期，第36～37页。

⑨成思危：《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中国保税区的改革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12)^① 和区位分析 (刘恩专, 1994)^② 等。三是关于自由港建设实践的研究。一方面是结合了国际上自由港如新加坡、汉堡、釜山、迪拜等典型案例来分析 (陈永山, 1988);^③ 另一方面是分析了目前国内港口如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厦门、海南等探索建设自由港的实践 (周汉民, 2012),^④ 并将自由港的建设与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做深入的比对。四是关于自由港建设条件的研究。如区位优势 (董洁霜和范炳金, 2003)、^⑤ 通关制度 (张海明, 1993)、^⑥ 税收优惠 (陈丽君和郑天祥, 2003)、^⑦ 金融外汇 (张凤清, 1993)、^⑧ 自由港法律法规 (江若尘和陆煊, 2014)^⑨ 等。五是关于自由港设立的效应研究。包括自由港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 (赵鹏军和吕斌, 2005)、^⑩ 人才集聚和对外经济关系 (陈善权, 2005)^⑪ 所带来的影响。

已有的研究中在探索自由港建设的条件时仅仅是从单一的港口出发, 这些条件对于其他的港口是否适用不得而知。因此, 本文从一般性的角度出发分析自由港建设的运作机制, 并比较分析典型自由港实践经验。

二、自由港的内在机制分析

作为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以及更重要的法律和监管方面的全方位变革 (魏建国, 2017),^⑫ 自由港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需要在市场准入、金融制度、税收方面做出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安排。

①黄志勇、李京文:《实施自由贸易港战略研究》,《宏观经济管理》2012年第5期,第31~33页。

②刘恩专:《论天津建立自由港的方案与政策》,《南开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第31~36页。

③陈永山:《世界各地的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周汉民:《建设自由贸易港城深化推进改革开放》,《经济界》2012年第3期,第8~9页。

⑤董洁霜、范炳全:《现代港口发展的区位势理论基础》,《世界地理研究》2003年第2期,第47~53页。

⑥张海明:《我国建立自由港的探讨——兼谈保税区向自由港演变的海关管理问题》,《国际贸易》1993年第10期,第49~51页。

⑦陈丽君、郑天祥:《港澳自由港与低税率经济制度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112~116页。

⑧张凤清:《厦门特区外贸体制改革的构想》,《特区经济》1993年第6期,第23~24页。

⑨江若尘、陆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及其评估——基于全球比较的视角》,《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10期,第71~81页。

⑩赵鹏军、吕斌:《港口经济及其地域空间作用:对鹿特丹港的案例研究》,《人文地理》2005年第5期,第114~117页。

⑪陈善权:《香港自由经济制度与其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暨南大学学位论文,2005年。

⑫魏建国:《自贸港不是自贸试验区的简单升级》, <http://finance.china.com/industrial/11173306/20180125/32009019.html>。

（一）特殊的区位优势是实施自由港的基础

自由港的“港”首先突出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的区位优势主要由自然资源、当地劳动力、工业集聚、地理位置、交通便利等因素共同决定。区位优势可以带来交通便利，其中码头数量、深水吨位、货运中转能力也是经贸往来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周文贵和杨东文（1994）^①认为，世界各地设立自由港的成功经验显示，一般具备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和经济地理位置、优良的港口条件、深广的可资依托和辐射的经济腹地。比如汉堡、鹿特丹、安特卫普、香农这类具有优越的航运和地理条件的西欧沿海主要港口城市和重要空港，成功将其打造为自由港，并将货物运输辐射欧盟全境。^② 自由港的区位优势一般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自由港必须位于国际主航道的大型港口，具有成为中转贸易集散地与航运母港的条件及潜力。这里的港口不仅仅指的是海港，还可能包括内河港口、空港以及陆地港等。马晓燕（2011）^③ 通过对比分析，认为自由港除海港外，还有众多内河港口和空港，可深入大陆腹地。其次，自由港一般位于国际主干航线上或者本身就是国际主干航线的起点，通过发达的航运交通网络与世界其他港口或者城市相连，成为国家或区域性的进出口贸易、中转贸易的航运枢纽港。耿松涛（2003）^④ 分析了迪拜港作为中东航运枢纽的优越地理位置。再次，自由港往往还拥有发达的国际航运市场，包括拥有国际运输船舶、提供运输劳务的供给方，拥有国际运输货源、需要运输劳务的需求方，拥有供需双方的代理人、经纪人等，它们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从事各种形式的航运交易行为。同时各个港口的腹地资源丰富，可形成高效物流运输和综合服务，从而将货物运输辐射整个区域。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自由港的“区位优势”。

（二）持续的制度创新是实施自由港的动力

制度创新开启了开放推进改革的进程，使得要素不断集聚，从而带来了更为有利的制度供给。探索建设自由港是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支点，而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需要制度的不断创新以推动更大的开放。国际上典型的自由港都被赋予了“境内关外”的特征，按照“京都公约”中的含义，所谓“境内关外”是实施一种“非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自由港内的商品存放、加工、展销等活动不受配额限制和外汇管制。通过制

^①周文贵、杨东文：《洋浦自由港——发展海南特区的重大举措》，《国际贸易问题》1994年第10期，第28～30页。

^②沈家文、刘中伟：《自由贸易园区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全球化》2014年第5期，第79～89页。

^③马晓燕：《内陆自由港发展模式研究——重庆例证》，《改革与战略》2011年第1期，第107～110页。

^④耿松涛：《迪拜港——中东地区的物流航运枢纽》，《港口经济》2003年第3期，第49～50页。

度创新来实现自由港的货物自由、金融自由和人员往来自由等。范宏云和孙光永(2008)^① 从香港港的自由贸易政策、金融政策方面分析了香港港的发展经验离不开制度创新。陈继红和朴南奎(2016)^② 从海关监管、优惠政策和奖励机制等方面分析了釜山港国际集装箱物流中心中转服务的主要经验。潘再见(2014)^③ 从资本流动自由、金融机构体系完善、金融市场运行高效、金融生态环境优良等方面挖掘中国香港金融服务自由港的经验。李善民(2017)^④ 认为建设中国特色自由港需要一系列制度创新,其介绍了顶层设计和监管方式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方向。

(三) 高效的港口供应链体系是实施自由港的关键

自由港同港口本身的货物集散中心作用紧密相连,其核心功能便是提高国际贸易中心能级,使得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那么高效的物流网络便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关键。首先,自由港要求相应的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功能。即便港口拥有深水泊位,但如果没有高效的物流通关效率和航线分布,例如其堆场不足、物流不畅、临近港口与港口之间缺乏具体的分工,那么也不能良好地运作起来。港口完善的“海陆空集疏运”系统,良好地理位置带来的丰富水运资源,铁路、公路、客运等交通枢纽为自由港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其次,自由港需要完善的物流供应链管理服务能力。随着贸易自由度上升、贸易量增加、金融物流等配套完善,对于整个物流供应链管理的要求也随之提升,因而实现储运销一体化,打造物流通道,形成高效便捷的物流走廊是关键。如汉堡港对进出的船只和货物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提供自由和便捷的管理措施,贯穿于从货物卸船、运输、再装运的整个过程。最后,自由港需要高效的监管水平。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出入境边防检查和海事局等主要口岸管理机构的监管方式、监管水平也决定着物流通关的效率。不断提升的物流信息化水平,依托于先进的大数据、智能监控等信息技术,从而使该信息化的建设系统有助于对自由港的贸易、金融活动实施有效的监控,实现信息共享和服务。

①范宏云、孙光永:《香港建设自由贸易港的经验》,《特区实践与理论》2008年第3期,第56~59页。

②陈继红、朴南奎:《上海自贸区国际集装箱物流中转服务策略——基于韩国釜山港经验》,《中国流通经济》2016年第7期,第25~32页。

③潘再见:《香港金融服务自由港建设的经验借鉴》,《中国港口》2014年第5期。

④李善民:《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需一系列制度创新》, <http://www.huaxia.com/gdtb/gdyw/szyw/2017/12/5576061.html>。

（四）完善的教育体系是实施自由港的保障

自由港地区不仅需要能满足航运业要求的各种基础设施、完善的服务体系、优越的集运条件等一系列硬件设施，还要求有特殊的优惠政策、健全的贸易法律体系、良好的文化生活基础以及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等软件体系。在这些软环境的建设过程中，人才是最为根本的，人才要发展，教育为先，完善的教育体系是实施自由港的保障。自由港应是全球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地（魏建国，2018），^① 自由港的实施建设离不开科技创新，更离不开人才的推动，自由港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专业人才的管理，尤其是各类适应外向型经济的专门人才，而人才的培养与再培训，离不开完善的教育体系。在积极引进相关人才的时候，需要对人才进行再教育支持，使得其可以更加顺畅的为自由港的建设而服务。“在重引进，轻培训”的现状下，对于人才的培育与开发、激励和管理仍有待加强，因而完善的教育体系是实施自由港的保障。

（五）优惠的政策环境是实施自由港的前提

相比较于一般的港口而言，自由港可以在关税、金融、出入境手续等方面享受到更多的优惠待遇。政策的推出推动自由港的建立，该政策的环境将积极引导各地响应建立自由港的号召，启动了相关前期研究工作，因而政策环境的催化作用不容忽视。原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梁敬国认为，建设自由港制度创新很重要，但是政府心态的改变比功能的改变更重要。对于新加坡自由港而言，正是一系列相关政策共同构建了新加坡的自由港政策，包括自由通航、自由贸易、部分货物免税等政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可以说这一提法拉开了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帷幕，多个省份加快步伐研究自由港建设的方案。在2018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上，再次强调了要“全面复制推广自贸区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国家层面的相关提法为未来中国整个自由港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战略地位为自由港的实施决定了政策环境的必要性。我国对于自由港的战略定位不仅仅是与自贸区衔接的简单升级版，而是瞄准开放水平最高的新高地，因而会推动我国在市场准入、金融制度、税收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安排。^②

（六）建设自由港的运作机制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自由港的建设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的条件，

^①魏建国：《自贸港不是自贸试验区的简单升级》，http://www.sohu.com/a/215867097_828358。

^②佚名：《商务部原副部长权威解读：中央对自由贸易港的战略意图是什么？》，http://www.sohu.com/a/215512332_120507。

包括优越的区位优势、持续的制度创新、高效的港口供应链服务水平、完善的教育体系以及国家政策指引。其中，优越的区位优势是实施自由港的前提，持续的制度创新能力是实施自由港的动力，完善的教育体系是实施自由港的保障，高效的港口供应链服务水平是实施自由港的关键，而国家政策指引也是实施自由港的环境基础。其关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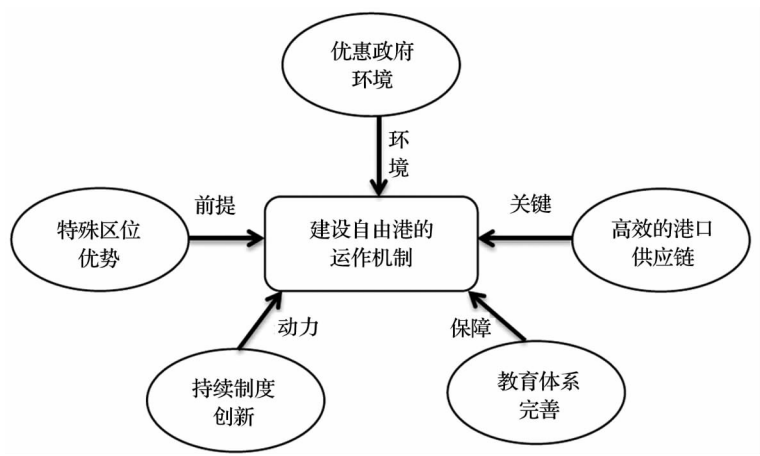


图 1 建设自由港的运作机制

三、我国建设自由港的基础条件及现实比较

我国港口吞吐量已经位居世界领先地位，世界吞吐量前 10 位港口有 7 个是中国港口（陈文玲，2012），^① 应该说，未来这些港口具备建设自由港的极大的可能性。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当前我国建设自由港的条件，笔者选取了当前明确提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海南岛，以及国际 10 大集装箱港口中的上海港，原因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了要设立自由贸易港区。同时，参照国际上典型的集装箱港口，如新加坡、香港、釜山和迪拜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分析自由港在区位优势、政策优惠、航线分布、贸易便利、金融服务、法律体系、人才教育以及管理模式上的现有基础和典型做法，如表 1 所示。

从港口的区位优势来看，世界已有的自由港区位优势明显，决定了其腹地资源也相当的丰富，有能力为自由港建设提供充足的货物、人才、资金，形成集聚效应。目前，新加坡港、香港港、釜山港和迪拜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均已超过 1500 万标准箱，对外形成了较好的辐射带动作用。我国现有港口海岸线较长，沿海地区有诸多优良港口，是联接欧洲、东南亚的重要枢纽，岸线资源丰富，建港条件良好，从而在货物吞吐量、集装箱

^①陈文玲：《中国港口和现代物流发展前景》，《全球化》2012 年第 5 期，第 46～49 页。

吞吐量以及码头泊位的吨级具有明显优势。而探索设立为自由贸易港的海南，处于我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地理中心，海口港和洋浦港可作为区域性航运枢纽和物流中心，因而我国建设自由港的前提优势已经具备。

为了更好地促进货物贸易自由化，现有的港口均通过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贸易，如新加坡几乎对所有的港口免征关税；香港税种少，税率低；迪拜对自由贸易区的货物均可免税入库；釜山也实施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上海港建立离岸保险税制，而海南岛在离岛免税方面也做了诸多的探索。为了更好地促进金融服务，新加坡、香港、迪拜对金融的汇兑给与了高度的自由，建立了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高效的运作体系。未来的金融自由和金融风险的防控是我国自由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在法律体系建设方面，香港、新加坡、釜山和迪拜港均有了自由区、自由港发展的相应的法律作为支撑，使得自由港的改革得以深化；但我国的自由港、自贸区建设尚缺乏真正的立法权，地方没有自主立法的权限，这是在未来自由港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管理模式方面，新加坡港采取政府、国企、私企对港口共同管理模式，迪拜港对港口、自由贸易区、海关采取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香港是交由私人企业经营管理的模式，釜山港是地方政府和公共协同治理的模式。而我国的管理模式主要还是由政府来运营，这可能会影响到整体运营的效率。

自由港的航线分布往往比较密集，与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从而形成良好的航线运输枢纽中心，实现连接世界，覆盖全球的可能。运输航线分布的密集在带来经贸往来的便捷之外也促进了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来提高物流通关效率的提升，如新加坡港早在1990年就投资建立了全国电子数据交换（EDI）贸易服务网，使计算机很早就应用于码头作业的协调；而釜山港也建立了统一的外贸进出口业务物流信息系统。我国现有港口的航线分布正在逐步完善，其连通世界各地的交通网络日渐建成，上海港的班轮航线已通达全球120个港口，通过实施更高标准的口岸监管制度和模式，物流通关效率不断提高。

除此之外，自由港的建设离不开大量人才，更离不开优质的教育体系提供优质人才，因而国家政策支持和教育体系的完善为自由港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可能。多个地区也提出了构建“人才自由港”的设想，旨在以人才集聚来带动产业的发展。例如香港积极培养自由港建设人才队伍，实施优秀人才计划，建构独具特色的教育体系；迪拜为外来人才的流入提供了更多便利化的措施等等。上海也发布了《上海市航运领域紧缺人才目录》，海南省实施了《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可见人才的培养教育对自由港的发展至关重要。具体的分析如表1所示：

表 1 典型港口（地区）建设自由港的基础条件分析

港口 (地区)	区位优势	政策优惠	金融服务	法律体系	管理模式	航线分布	贸易便利	人才教育
上海	地处长三角水网地带，位于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心。拥有中国最大的集装箱港——洋山深水港，是世界著名港口，上海港拥有各类码头泊位 1202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171 个	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离岸保险税制	在 FT 账户分账核算体系框架内对区内与境外的资金流动和货币兑换放宽监管，提高自由便利程度	无	政府管理模式	班轮航线通达全球 120 个港口，形成 12 条国际成熟航线，涉及全球各大班轮公司；国际航线可通往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新加坡等国家以及香港地区的 10 多个主要城市	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自由”的口岸监管制度和模式	发布了《上海市航运领域紧缺人才目录》
海南	最接近东南亚各国的省份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与大陆的区位隔离，全岛 3 万多平方公里都被纳入自贸区范围	已经实施了离岛免税的政策	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无	政府管理模式	海上丝绸之路中转航空枢纽、打造“内地—海南—东盟”中转枢纽、“俄罗斯/日韩—海南—东南亚”中转枢纽、“海上丝绸之路”中转枢纽	“商贸网+物流网+金融网+数字网”“四网聚焦”的商物流一体化应用场景	实施《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
新加坡	沿海地处东南亚的核心位置，是亚太地区最大的转口港，还是天然的深水良港。该港扼太平洋及印度洋的航运要道，是亚、欧、非、澳四大洲海、空航线的“十字路口”	对除烟酒、石油、机动车外的所有进出口商品免征关税。企业经营环境优越，便利化程度高	全面取消外汇管制，融资汇兑自由，金融市场开放程度高、服务全面	打造了以《自由贸易区法》为核心的体系完整、经济法规	实行港口的民营化管理模式，政府、国企、民企对港口共同管理	与世界上 1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联系，每周有 430 艘班轮发往世界各地。新加坡还是欧、亚及大洋洲的航空中心	建立 EDI 贸易服务网 TRADENET，通关的诸多环节实现了无纸化、自动化和网络化	积极培养自由港建设人才队伍
香港	位于珠江口外东侧，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是中国天然良港，为远东的航运中心，也是全球供应链的主要枢纽港	税种少，税率低	取消对外汇和黄金管制，金融机构体系完善，高效的金融市场运作机制	银行、资产管理、航运、商业、贸易等领域均有法律条文加以规范	私人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有海上航线 20 多条，通往世界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1000 个港口，是东亚、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以及欧洲间贸易航运的枢纽。航空网远达美国、加拿大、中国内地、日本和东南亚各国	专门设立物流发展督导委员会和香港物流发展局	实施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建构独具特色的教育体系

续表 1

港口 (地区)	区位优势	政策优惠	金融服务	法律体系	管理模式	航线分布	贸易便利	人才教育
釜山	位于中日俄中心地带，处于连接欧美的中心位置。位于韩国东南沿海，是韩国最大的港口	实行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投资、贸易等领域的税收减免措施	无	先立法后社区，出台了《关税自由贸易区专门法》	地方政府和公共协同治理的管理模式	航线通往中东、欧洲、美国等国家诸多港口，位于联接中国、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心地带	长期采用降低港口费率、减免港口费用、中转奖励制度等经济手段来强化中转港口功能	招聘地方化的物流经营人才
迪拜	位于阿联酋东北沿海，濒临波斯湾的南侧，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欧亚经济活动中心，是中东地区最大的自由港，尤以转口贸易发达而著称	自由贸易区内各种商品均可免税存入仓库，入关后再出口的商品给与全部退税，外资企业可以 100% 控股	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业务，资本和利润可以自由汇出	区内实施独立的法律体系	对港口、自由贸易区、海关采取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管理机构是迪拜港务局	在中亚、南亚、西亚、东非、北非以至欧洲之间实现了快捷方便的运输，迪拜机场连接世界的航线网络 150 余条，覆盖全球的 220 多个城市，其中货运航线 50 余条，通往美洲、西欧、东南亚和中东非洲的全货运航线 10 余条	构建海陆空一体化立体物流网络。引进包括数据处理、货物监控、信息传输、码头管理等各项功能在内的航运系统和技术	为外来人才的流入提供了其他波斯湾地区难以实现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有关文献整理而得。

四、我国探索自由港建设的相关建议

（一）集成创新，打造流量经济平台

我国自由港的建设实施离不开制度上的持续创新，其创新方向需保证人员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等，可以说，“境内关外”是我国自由港改革的关键。首先，提高对自由港制度创新重要性的认识。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高校、科研院所要高度自觉深化对自由港的学习，加大对自由港的理论和内涵的探讨，从而深化对自由港的理论研究。厘清自由港与自贸试验区、保税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积极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先进的自由港如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鹿特丹等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并考虑新时代下我国现实状况，选择适应我国自由港发展的实施方案与提升改革的管理模式。其次，充分赋予自由港更大改革自主权。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关税以及改变监管模式等，继续深入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监管服务新模式，更大程度上推动贸易自由；构建新的口岸管理一体

化运行机制，推动口岸部门职能转变，如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从而不断通过制度创新减少企业经营和注册的成本，推动企业经营自由；突破贸易监管政策，培育高端经济功能，通过制度创新对接国际规则的高标准投资和离岸金融自由化制度安排，从而通过开放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金融的枢纽中心；制度创新为人员往来创造更大的便利性，包括实施非居民自由出入和人才就业鼓励性政策等，从而推动人员进出自由。再次，进一步拓展自由港功能。在已有的自贸试验区的基础上拓展功能，探索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的发展，创新集合国际航运、维修、仓储、离岸投资和离岸金融为一体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发展，以构建完整产业链的思维来促进自由港的建设，大力培育优势产业和新型业态（沈家文，2015），^① 提升附加值，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多元化发展。

（二）全面优化，提升系统运作效能

在自由港的建设过程中物流供应链管理起了极大的作用，主要在于现代供应链管理思维突出强调了如何实现系统整体运作效能的提升和全面的优化。因此，在自由港的建设过程中，要着重抓好物流供应链这一环节。首先，优化港口物流企业结构。提高现有港口物流企业的社会化、专业化水平，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促进传统港口物流企业转型升级，推动港口企业向现代综合物流企业转型，提高物流企业竞争力，打造全程物流链。其次，推动港口资源整合。进一步明确我国各港口的功能定位，促进港口的合理分工和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过度竞争。通过合资、合作、联盟等形式加强相邻港口资源的整合，高起点规划港口群，促进区域港口一体化。再次，完善综合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依托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进一步优化仓储、配送、分拨一体化的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整合铁路、公路、水路、航运、海关、检验检疫等信息资源，实现港口资源共享，提高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节省各个作业环节的时间，降低各个功能环节之间的衔接成本，提高港口行政管理效率，构建智慧型自由港。

（三）统筹协调，做好各项改革工作

自由港的建设是一项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设计到多个部门、临近地区甚至是跨区域之间如何更好地进行协同合作，以实现“1+1>2”的效应。首先，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地方政府在建设自由港的过程中要与国家部委建立紧密联动会商机制，提前做好自由港的申报规划设计工作；加强海关、检验检疫、港务集团、辖区内大企业等的协同联

^①沈家文：《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全球化》2015 年第 10 期，第 29～40 页。

动，推动海关与检验检疫的“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进一步提高监管效能，推行海关与检验检疫的“信息互通、联合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其次，强化海港与空港、陆地港之间的协同联动。构建完善的海陆空多式联运体系，形成海港、空港、陆地港协调发展的局面，依托现有的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建立与陆地港有效合作的机制，强化海港与陆地港的有效衔接，拓展腹地功能，提升港口的辐射带动能力。再次，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动发展。以服务当前国家重点战略为导向，做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港口联动，进一步加大国内港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港口搭建友好港等合作模式，实现互利共赢。

（四）合力打造，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不仅对企业本身，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孙丽燕，2016），^① 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仍然是未来自由港建设的根本任务。首先，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自由港意味着更大强度的开放，随着国家“十三五”规划强调的开放重点，以及新一轮的开放迈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开放。服务业的开放不仅仅涉及外资准入的问题，投资准入和市场准入也随之出现，因而服务业开放的本质仍是围绕制度创新这一核心的制度性开放。推动更加自由的投资环境的建设，营造更加透明、公开、公正的投资环境（李娣，2017）。^② 其次，要以法治引领保障国际水准的营商环境。要对标高标准，推动其在建设过程中商事登记、贸易、投资、金融开放创新等系统性的集成开放，逐步完善法治营商环境。尤其是随着海南全岛区、港的建设的战略布局，以及建设上海自由港的不断探索，其在建设过程中对标国际高水准。然而和世界其他主要自由港相比，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院长刘永辉的指数报告显示，上海的营商环境尤其是在投资便利化、法制环境、贸易便利化、政府效率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③ 再次，在自由港建设上坚持立法先行。从国际先进的自由港的建设经验来看，它们都享有相关法律的特权和相对独立的监管体系，因此，可以遵照国际上通行的“先立法后设区”的惯例，为自由港的改革创新提供更多合法性的依据。

责任编辑：沈家文

^①孙丽燕：《企业营商环境的研究现状及政策建议》，《全球化》2016年第8期，第106～119页。

^②李娣：《提高营商环境竞争力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全球化》2017年第12期，第56～57页。

^③佚名：《上海自由港如何对标国际最高标准·专家支招》，<http://sh.eastday.com/m/20180429/u1a13867795.html>。

关税削减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

——基于地区与行业视角的分析

郑 鑫 薛同锐

摘要：关税削减降低了国外进口产品的价格，对地区劳动力市场就业造成冲击。由于国内各省行业结构与就业分布均不相同，经历的贸易开放程度也不同，因此关税削减对其就业变动的影响各不相同。通过梳理贸易自由化指标的测算方法，本文计算了中国地区关税削减程度，从地区层面分别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关税削减对地区劳动力市场就业变动的影响。总体上看，关税削减抑制了地区就业增长，但存在地区差异。关税削减程度越深，对地区就业变动的负面影响越大；而关税削减程度较低的地区，其就业增加越大或减少越小。

关键词：关税削减 就业分布 地区关税变动

作者简介：郑 鑫，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薛同锐，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 言

经过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到了瓶颈期，传统的依靠人口红利、环境红利、政策红利推动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逐渐不再适用，东南亚地区等具备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部分或较为系统地对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贸易与地区收入不平等：基于国内市场扭曲下资源空间再配置的研究》（批准号：17BJL109）、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南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学科骨干人才资助项目《劳动力市场动态演进对我国对外开放效益的影响研究》（项目号：96176702）研究成果。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形成了替代。随着整体技术水平的进步,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呈现技术密集化和资本密集化。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技术保护和市场准入上对中国设置了很强的限制。如何在开放条件下优化贸易结构?核心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经济结构变动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就业结构的变动是同步的,就业结构变动能够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本文就关税削减对中国地区就业变动的影响展开研究,为地区贸易深化与经济发展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一、文献回顾

国外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进出口贸易与就业总量之间的关系,然而结论却迥然不同。Freeman & Katz (1991)、Revenge (1997)、Grossman (1986) 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条件下进口产品大量流入国内市场所形成的竞争冲击,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不大,但是会影响就业的变动,导致经济体内部劳动力跨部门再配置。规模经济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促进产业集聚和就业集聚,引起劳动力地区转移与集聚,形成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就业调整。Krueger (1970) 指出,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推动了本国的产业发展,增加了本国的就业数量。Jenkins (2003) 以越南为例进行的研究论证了出口与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性。Davis & Haltiwanger (2001) 使用就业创造与就业毁灭机制就贸易开放对法国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表明,汇率波动能够影响部门间劳动力流动转移,进而对就业产生影响。然而, Batiz & Romer (1991) 发现,贸易自由化只能对一国技术水平、研发能力产生影响,并不能改变该国原有的生产模式与比较优势,除非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经过长期的技能积累,才能部分地改变原有生产方式与生产结构。Wacziargy & Wallack (2004) 使用 25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贸易自由化与就业调整之间并不存在关联性。

“入世”以来,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开始步入快车道,大量文献从产业层面出发,研究贸易开放对就业的影响。相关研究主要基于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计算出口就业弹性或使用科布-道格拉斯(C-D)函数估算劳动需求函数,实证分析贸易开放对国内就业拉动的影响程度。文献指出,贸易开放促进了国内就业,尤其是出口贸易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推动作用尤甚(袁富华, 2007; 胡昭玲、刘旭, 2007; 盛斌、马涛, 2008; 喻美辞, 2008; 盛斌、牛蕊, 2009; 毛日昇, 2009; 罗良文, 2004; 杨玉华, 2007)。魏浩(2011)经过计算,发现出口对纺织品行业的就业贡献达到 12%。

在现有分歧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该国(经济体)的劳动市场特征,如劳动力跨地区(部门)流动速度,能够直接决定就业变动

的调整时间。一般来说，那些存在严格的政策限制或就业思维、文化传统固化的国家（地区），其劳动力流动要比完全竞争地区的劳动力流动缓慢的多。Topolova（2007）将贸易自由化对印度城乡地区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差异归结于劳动力流动性的缺乏。Currie & Harrison（1997）使用企业层面数据就摩洛哥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展开研究，发现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就业结构由于严格的政策法规限制而不能迅速调整，当贸易自由化冲击到来时，企业受法律限制往往选择采用减少利润或提高生产率而不是裁员来应对贸易自由化的不利冲击，导致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缓慢。同样的，Feliciano（1994）、Reven-ga（1997）对墨西哥的研究也得到了较一致的结论。Kambourov（2009）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影响，他将劳动力市场特征纳入这一分析之中。研究结论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一个经济体就业调整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流动的灵活程度，地区劳动力流动性越强，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其就业的调整就越迅速；反之，劳动力流动性越差的地区，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变动的的影响越小。

二、地区关税削减程度的测量

大量研究表明，实际关税税率比进口限制、出口促进、贸易与投资便利性等指标更能体现一国的贸易保护程度，然而使用实际关税税率是很困难的。根据 Goldberg and Pavcnik（2007）的发现，随着有效关税税率可得性的提高，名义关税税率与有效关税税率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性，这一发现意味着基于名义关税税率的研究结果将与以有效关税税率为指标的研究结果一样具备稳健性。尽管有效关税税率指标更加符合实际，但数据的限制使其难以得到准确考量，使用名义关税税率可以较好地替代有效关税税率指标来进行研究。本文在计算过程中同样使用名义关税税率的变动来衡量地区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差异。参考 Rafael & Kovak（2014）的做法，我们认为关税变动会对国内市场商品价格产生影响，商品价格的变化引发劳动力行业间转移，导致地区（省、市、自治区）劳动力就业分布发生改变。

基于 Jones（1975）的模型，笔者将假定条件进行了修改。第一，将研究层面由国家拓展到地区层面，研究以关税变动来衡量的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内部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第二，劳动力市场不再假定为充分就业，而是允许失业存在；第三，放松劳动力分布固定不变的假定，允许地区劳动力分布发生变动；第四，放松原有假定条件，允许劳动与资本两要素可以相互替代。在对假定条件做了上述改动后，设一个国家存在多个地区 r ， $r=1, 2, 3\cdots N$ ，拥有多个产业 i ， $i=1, 2, 3\cdots N$ 。使用两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 L 、 T ，其中 L 为可用劳动总量。假定 L 在行业间可自由流动，但在地区间不能自由流

动，而特定要素 T 无论在行业间还是在地区间均不能自由流动， T_i 代表 r 地区 i 行业的特定要素投入，特定要素一般认为是短期内不能自由流动的要素投入，如矿产资源储备、土地、资本、地区产业集群等（Rodriguez - Clare, 2005）。所有地区技术水平相同，即地区内部不同行业生产函数不同，而不同地区相同行业生产函数相同。另外，假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完全竞争，所有地区面对相同的价格水平 P_i 。 a_{Li} 与 a_{Ti} 分别为生产一单位商品 i 需要投入的劳动和特定要素数量，设 Y_i 为行业产出，则要素市场出清状态为：

$$a_{Ti}Y_i = T_i \quad \forall i \tag{1}$$

$$\sum_i a_{Li}Y_i = L \tag{2}$$

完全竞争假设下，商品价格 P_i 等于要素报酬，假定工资为 w ， R_i 为特定要素价格，则：

$$a_{Li}\omega + a_{Ti}R_i = P_i \quad \forall i \tag{3}$$

假定 $\hat{\omega}$ 代表工资变动比率， $\hat{R}_i$ 为特定要素价格变动比率，商品价格变动为 $\hat{P}_i$ ， θ_i 为行业 i 特定要素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则：

$$(1 - \theta_i)\hat{\omega} + \theta_i\hat{R}_i = \hat{P}_i \quad \forall i \tag{4}$$

考虑单位成本最小化情形，根据包络定理，有：

$$(1 - \theta_i)\hat{a}_{Li} + \theta_i\hat{a}_{Ti} = 0 \quad \forall i \tag{5}$$

对式（1）进行全微分，得到：

$$\hat{Y}_i = -\hat{a}_{Ti} \quad \forall i \tag{6}$$

同样地，对式（2）进行微分，令 λ_i 为行业 i 所使用的劳动力占地区总劳动力的比重， $\lambda_i = L_i/L$ ， σ_i 为 T_i 和 L_i 之间的要素替代弹性，可以得到：

$$\sum_i \lambda_i (\hat{a}_{Li} - \hat{a}_{Ti}) = \hat{L} \tag{7}$$

$$\hat{a}_{Ti} - \hat{a}_{Li} = \sigma_i (\hat{\omega} - \hat{R}_i) \quad \forall i \tag{8}$$

将式（8）带入式（7），得到：

$$\sum_i \lambda_i \sigma_i (\hat{\omega} - \hat{R}_i) = \hat{L} \tag{9}$$

式（4）与式（9）可以用矩阵形式表述，改写后为：

$$\begin{bmatrix} \Theta & \theta_L \\ \lambda' & -\sum_i \lambda_i \sigma_i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hat{R} \\ \hat{\omega}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hat{P} \\ \hat{L} \end{bmatrix} \tag{10}$$

在克莱默法则下，对分区矩阵进行求解得到：

$$\hat{w} = \frac{\hat{L} - \lambda' \Theta^{-1} \hat{P}}{-\sum_i \lambda_i \sigma_i - \lambda' \Theta^{-1} \theta_L} \tag{11}$$

需要说明的是，对角矩阵 Θ 的逆矩阵为对角矩阵 $1/\theta_i$ ，可以推导出商品价格变动与地区劳动力工资变动之间的关系：

$$\hat{w} = \frac{-\hat{L}}{\sum_i \lambda_i \frac{\nu_{i'}}{\theta_{i'}}} + \sum_i \beta_i \hat{P}_i \tag{12}$$

$$\text{其中, } \beta_i = \frac{\frac{\nu_i}{\theta_i} \lambda_i}{\sum_{i'} \lambda_{i'} \frac{\nu_{i'}}{\theta_{i'}}} \tag{13}$$

这一条件意味着当 $\hat{L} = 0$ 时，特定要素价格的变动可以通过式（14）来进行表示：

$$\hat{R}_i = \frac{\hat{P}_i - (1 - \theta_i) \hat{w}}{\theta_i} \tag{14}$$

将式（13）代入（14），得到地区收入变动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

$$\hat{w}_r = \sum_i \beta_{ri} \hat{P}_i \quad \forall r, \quad \beta_{ri} = \frac{\frac{\nu_{ri}}{\theta_{ri}} \lambda_{ri}}{\sum_{i'} \lambda_{ri'} \frac{\nu_{ri'}}{\theta_{ri'}}} \tag{15}$$

可以看出，商品价格变化的加权平均决定着贸易自由化对于地区工资的影响程度。为了进一步考察关税波动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联性，采用进口关税税率与基期关税税率的差值来表示贸易对价格变化的作用程度，既 $d\ln(1 + \tau_i)$ ，其中， τ_i 为关税税率。根据上述条件可知，以 1995 年为基期的 i 行业进口关税税率变动为 $d\ln(1 + \tau_i) = \ln(1 + \tau_i^t) - \ln(1 + \tau_i^{1995})$ ，计算出地区层级的关税变化（ RTC ）为：

$$RTC_r^t = \sum_i \beta_{ri} d\ln(1 + \tau_i^t) (i \neq N), \quad \beta_{ri} = \frac{\frac{1}{\theta_i} \lambda_{ri}}{\sum_j \frac{1}{\theta_j} \lambda_{rj}} (j = i' \neq N) \tag{16}$$

基于上式，采用盛斌（2002）中国工业行业与协调编码货号对应表中与 HS 货品税则号^①相对应的行业名称，引用中国进出口统计年鉴中的商品进口关税数据和 HS 税则号进行算数平均，并以此测算结果作为行业进口关税的衡量标准。由于已有数据难以支持劳动需求弹性生产要素替代弹性的精确计算，因此假定地区劳动需求弹性为固定值，并假设所有行业的生产函数是 C-D 函数，由于行业要素比重的差异，假设 $\lambda_{ri} = r$ 地区 i 行业

①所使用的版本为 HS2002 版本。

就业人数占 r 地区就业总量的份额, $\sigma_{ri} = 1$ 且 $\theta_{ri} = \theta_i$, 行业 i 的特定要素成本 $\theta_i = 1 -$ 行业 i 增加值中工资总额所占的比重。为了保证数据准确性和全面性, 笔者以分地区分行业的劳动工资总额作为行业劳动力成本的依据, 同时用行业就业人数代表就业分布, 相关数据的来源分别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工业经济年鉴》。

三、关税削减对地区就业的影响机制

借鉴 Head & Ries (1999) 的方法, 笔者基于 Dixit - Stiglitz 的 D - S 垄断竞争模型并对其进行拓展, 跳出了原模型的国别思维框架, 将其进行变形, 纳入地区变量, 分两步探索关税削减对地区就业产生的影响。第一步分析关税削减对地区产出造成的影响, 第二步分析地区产出变动对劳动力需求造成的影响。

假定 A 国存在多个地区, 分别用 r 表示, $r = 1, 2, 3 \cdots m$, 生产多个消费品 i , $i = 1, 2, 3 \cdots m$ 。企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完全竞争, 所有地区面对相同的价格水平 P_i 。存在 B 国, 其地区划分为 $d = a, b, c \cdots r$ 地区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CES 函数:

$$U_r = \left(\sum_{i=1}^m q_{ir}^{\frac{\sigma-1}{\sigma}} \right)^{\frac{\sigma}{\sigma-1}} \tag{17}$$

式 (17) 中, U 为消费者效用, q_i 代表该地区消费者消费的第 i 种商品的数量, σ 为常数项且 $\sigma > 1$, σ 的存在意味着不同种类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值固定。

代表性消费者面临的消费约束为:

$$\sum_{i=1}^m p_i q_{ir} = E \tag{18}$$

p_i 为 r 地区代表性消费者面临的第 i 种商品的价格, q_{ir} 为能够消费的第 i 种商品的数量, E 为总预算。进一步地, 将 (17) 与 (18) 结合, 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得到消费者最优消费量为:

$$q_{ir} = \frac{E}{\sum_j p_j^{\frac{1}{1-\sigma}}} p_i^{-\sigma} \tag{19}$$

从式 (19) 可知, A 国 r 地区消费者对商品 i 的最优消费量与收入 E 成正比, 与商品价格 p_i 成反比。此时, 假定 r 地区已有的出口型企业, 除了对 B 国出口之外, 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也提供给国内市场。为方便分析, 假定所有企业生产技术无差异, 生产函数相同。此时, 可以将 A 国各地区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总数用出口数量加内销数量进行表示:

$$q_A = \sum_1^m q_{ir} = q_{AA} + q_{AB} \tag{20}$$

此时, q_A 为 A 国企业全部商品产量, q_{AA} 、 q_{AB} 分别表示在国内各地区市场和国际市场销售的数量。结合式 (18), 得到:

$$\sum_1^m q_{ir} = \frac{\sum E_r}{\sum n_{Ar} P_{AA}^{1-\sigma} + \sum n_{Br} P_{BA}^{1-\sigma}} P_{AA}^{-\sigma}, \quad \sum_a^\xi q_{rd} = \frac{\sum E_d}{\sum n_{Ar} P_{AB}^{1-\sigma} + \sum n_{Br} P_{BB}^{1-\sigma}} P_{AB}^{-\sigma} \tag{21}$$

式 (21) 中, n_A 和 P_{AA} 分别代表 A 国企业所生产的不同商品种类及其市场价格, n_B 和 P_{BA} 分别为 B 国企业生产的商品出口到 A 国之后, 在 A 国 r 地区市场销售的种类和价格。 $\sum E_r$ 为 A 国各地区消费者用于消费的预算总和。同样的, P_{AB} 和 P_{BB} 分别代表 A 国商品和 B 国商品在 B 国市场的销售价格。 $\sum E_d$ 为 B 国各地区消费者用于消费的预算总和。

紧接着, 对 A 国 r 地区的企业 e 进行相关设定, 假定企业边际成本不变 (c), 则企业利润函数为:

$$\pi_{re} = pq - cq \tag{22}$$

将式 (17) 与式 (22) 相结合, 得到企业商品价格为:

$$p = c\sigma/(\sigma - 1) \tag{23}$$

可以看到, r 地区的企业定价标准为在边际成本上进行加成, 加成比率为 $\sigma/(\sigma - 1)$ 。这时, 关税的冲击以从价税形式 t 表示, 国内各个地区 r 面临的关税冲击程度不同, 国内关税削减导致地区贸易自由化程度用 t_{rA} 表示, 国外关税削减对地区 r 的冲击用 t_{rB} 表示, 此时 A 国 r 地区所生产商品的国内价格 (A 国) 与国外价格 (B 国)、B 国 d 地区所生产商品的国内价格 (B 国) 及国外价格 (A 国) 之间的关系分别表示如下:

$$\frac{\sigma}{\sigma - 1} c_{Ar} = P_{AA} = \frac{P_{AB}}{1 + t_{rB}}; \quad \frac{\sigma}{\sigma - 1} c_{Bd} = P_{BB} = \frac{P_{BA}}{1 + t_{rA}} \tag{24}$$

利用式 (22)、式 (23) 及式 (24) 的第一个方程, 假定企业数量不变, 得到 A 国地区 r 企业产出 q_r 与 A 国进口关税之间的关系:

$$\begin{aligned} \frac{\partial \sum_1^m q_{ir}}{\partial (1 + t_{rA})} &= \left[\frac{\partial \sum_1^m q_{ir}}{\partial P_{BA}} \right] \left[\frac{\partial P_{BA}}{\partial (1 + t_{rA})} \right] \\ &= \left[\frac{\sum E_r}{(\sum n_{Ar} P_{AA}^{1-\sigma} + \sum n_{Br} P_{BA}^{1-\sigma})^2} P_{AA}^{-\sigma} (\sigma - 1) \sum n_{Br} P_{BA}^{-\sigma} \right] [P_{BB}] > 0 \end{aligned} \tag{25}$$

企业数量不变的情况下, 垄断竞争模型的结果可以用式 (25) 表示: A 国进口关税提高提升了该国 r 地区市场的保护力度, 导致本国产出增加; 反之, A 国进口关税削减将

降低 r 地区市场的保护力度，减少地区产出。利用同样的方法就 A 国 r 地区产量对 B 国进口关税变动进行推导得到：

$$\frac{\partial q_A}{\partial (1+t_{rB})} = \left[\frac{\sum_{rd}^n q_{rd}}{\frac{a}{\partial P_{AB}}} \right] \left[\frac{\partial P_{AB}}{\partial (1+t_{rB})} \right] < 0 \quad (26)$$

上式表明，B 国进口关税的削减将增加其对 A 国 r 地区企业产品的进口，导致 A 国企业产出增加。

在分析了关税与地区产出之间的关系之后，进一步分析地区产出变动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影响。假定 A 国 r 地区企业生产函数为： $q_{Ar} = F(L_{Ar})$ ，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则可以表示为生产函数的反函数形式： $L_{Ar} = f(q_{Ar}, z)$ ，其中 z 代表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其他因素。将其进行全微分处理得到：

$$dL_{Ar} = \frac{\partial f}{\partial (1+t_{rA})} d(1+t_{rA}) + \frac{\partial f}{\partial (1+t_{rB})} d(1+t_{rB}) + \frac{\partial f}{\partial z} dz$$

$$\text{其中, } \frac{\partial f}{\partial (1+t_{rA})} = \frac{\partial f}{\partial F(L_{Ar})} \frac{\partial F(L_{Ar})}{\partial (1+t_{rA})} > 0;$$

$$\frac{\partial f}{\partial (1+t_{rB})} = \frac{\partial f}{\partial F(L_{Ar})} \frac{\partial F(L_{Ar})}{\partial (1+t_{rB})} < 0 \quad (27)$$

$\partial f / \partial F(L_{Ar}) > 0$ 意味着地区产量增加能够带来就业增加，又 $\partial F(L_{Ar}) / \partial (1+t_{rA}) > 0$ ，因此 $\partial f / \partial (1+t_{rA}) > 0$ 。说明 A 国进口关税变动的方向与地区 r 产出变动的方向及 r 地区就业变动的方向一致。进口关税的削减将抑制地区 r 的就业。

与之相反， $\partial f / \partial (1+t_{rB}) < 0$ 说明 B 国的关税削减提高 A 国 r 地区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

将式 (27) 分子部分两边同时除以 L_{Ar} ，有：

$$\begin{aligned} \frac{dL_{Ar}}{L_{Ar}} &= \frac{\partial f}{\partial (1+t_{rA}) L_{Ar}} d(1+t_{rA}) + \frac{\partial f}{\partial (1+t_{rB}) L_{Ar}} d(1+t_{rB}) + \frac{\partial f}{\partial z} \frac{dz}{L_{Ar}} \\ &= \frac{\partial f}{\partial (1+t_{rA})} \frac{1+t_{rA}}{f} \frac{d(1+t_{rA})}{1+t_{rA}} + \frac{\partial f}{\partial (1+t_{rB})} \frac{1+t_{rB}}{f} \frac{d(1+t_{rB})}{1+t_{rB}} + \frac{\partial f}{\partial z} \frac{z}{f} \frac{dz}{z} \\ &= \theta_{AAr} \frac{d(1+t_{rA})}{1+t_{rA}} + \theta_{ABr} \frac{d(1+t_{rB})}{1+t_{rB}} + \theta_z \frac{dz}{z} \end{aligned} \quad (28)$$

上式中， θ_{AAr} 、 θ_{ABr} 分别表示 A 国 r 地区对本国进口关税变动的劳动需求弹性及 A 国 r 地区对 B 国进口关税变动的劳动需求弹性，由于 $\partial f / \partial (1+t_{rA}) > 0$ 及 $\partial f / \partial (1+t_{rB}) < 0$ ，因此 $\theta_{AAr} > 0$ 而 $\theta_{ABr} < 0$ 。将式 (27) 对数化处理得到：

$$d \ln L_{Ar} = \theta_{AAr} d \ln (1+t_{rA}) + \theta_{ABr} d \ln (1+t_{rB}) + \theta_z d \ln z \quad (29)$$

当 t_{rA} 与 t_{rB} 无限趋近于 0 的时候, (29) 可以写为:

$$d\ln L_{Ar} = \theta_{AAr} dt_{rA} + \theta_{ABr} dt_{rB} + \theta_z d\ln z \tag{30}$$

式 (30) 说明, A 国关税削减导致进口竞争加剧将对 A 国 r 地区劳动力市场就业变动产生负面影响, 而 B 国关税削减增加了对 A 国 r 地区企业所生产产品的需求, 促进了 r 地区就业。由此, 本文得到以下推论: 国内关税削减将对国内地区就业产生抑制, 国外关税削减将增加国内地区就业。下面, 本文将利用国内各地区农业与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来对此进行验证。

四、关税削减对地区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方程设定与数据说明

由于各个地区存在的地区特征差异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需要在计量模型中体现这一差异, 例如地区劳动力流动性、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等。关于地区劳动力流动性的衡量, 余官胜 (2010) 曾进行了详细说明。借鉴他的方法, 纳入以工资刚性来衡量的地区劳动力流动性变量, 考察关税削减对地区就业变动的影响, 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d\ln(E_{it}) = \alpha + \beta X_{it} + \beta_1 RTC_{it} + \beta_2 lab_{it} * RTC_{it} + u_i + v_t + \epsilon_{it} \tag{31}$$

式 (31) 中, $d\ln(E_{it}) = \ln(E_{it}) - \ln(E_{i1995})$, 为 i 地区 t 年与基年相比的就业变动情况, RTC_{it} 表示 i 地区 t 年关税削减程度; $lab_{it} * RTC_{it}$ 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与关税削减的乘积; X_{it} 为其他解释变量。除了关税削减对地区就业产生影响之外, 还存在各种其他因素能够对就业造成影响, 一般意义上, 上期就业变动、地区投资率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等都会对地区劳动力市场就业产生影响, 因此将式 (31) 改写为式 (32):

$$\begin{aligned} d\ln(E_{it}) = & \alpha + \beta_1 d\ln(E_{it-1}) + \beta_2 RTC_{it} + \beta_3 lab_{it} + \beta_4 \ln(inv_{it}) \\ & + \beta_5 \ln(urb_{it}) + \beta_6 \ln(pro_{it}) + \beta_7 lab_{it} * RTC_{it} + u_i + v_t + \epsilon_{it} \end{aligned} \tag{32}$$

式 (32) 中, $\Delta\ln(E_{it-1})$ 为 i 地区 t-1 年与基年相比就业的变动情况; RTC_{it} 表示 i 地区 t 年关税削减程度; lab_{it} 为 i 地区 t 年劳动力市场刚性指标, 用来衡量劳动力流动自由度; inv_{it} 代表 i 地区 t 年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 urb_{it} 代表 i 地区 t 年城镇化水平, pro_{it} 代表 i 地区 t 年经济发展程度, 用地区人均 GDP 来衡量; $lab_{it} * RTC_{it}$ 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与关税削减的乘积; u_i 为地区控制变量, v_t 代表时间变量, ϵ_{it} 为其他解释变量和误差项。计量模型所使用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依据上面的方法和所采用的指标，笔者计算整理了中国 31 个地区（含西藏）的省级面板数据，在进行面板模型估计之前，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分别对关税削减程度（ RTC_{it} ）、劳动力流动性（ lab_{it} ）、就业变动（ lnE_{it} ）、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pro_{it} ）、地区城镇化水平（ urb_{it} ）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说明，通过利用 LLC 方法、Breitung 方法、IPS 方法、Fisher ADF 和 Fisher PP 共 5 种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证明实证模型中所采用的变量均不能拒绝存在面板单位根的原假设，但相应的一阶差分后的数据序列为平稳过程。

（三）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回归方程（32）的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因此，该计量方程式是个动态面板数据回归方程。因为 $E[(lnE_{it})\epsilon_{it-1}] \neq 0$ ，所以不适合直接对计量方程进行回归。笔者试图尝试使用广义差分矩方法对其进行估计，首先对式（32）两边进行一阶差分得到：

$$\begin{aligned} \Delta dln(E_{it}) = & \Delta dln(E_{it-1}) + \beta_1 \Delta RTC_{it} + \beta_2 \Delta lab_{it} + \beta_3 \Delta ln(inv_{it}) + \beta_4 \Delta ln(urb_{it}) \\ & + \beta_5 \Delta ln(pro_{it}) + \beta_6 \Delta (lab_{it} * RTC_{it}) + (\epsilon_{it} - \epsilon_{it-1}) \end{aligned} \quad (33)$$

对其进行差分的目的，在于创造相信的矩条件，广义差分矩方法根据以下条件来确定工具变量的集合：

$$\begin{aligned} E[(lnE_{it-s})(\epsilon_{it} - \epsilon_{it-1})] &= 0, s \gg 2; t = 3, \dots, T; \\ E[X_{it-s}(\epsilon_{it} - \epsilon_{it-1})] &= 0, s \gg 2; t = 3, \dots, T; \\ E[\epsilon_{it-s}(\epsilon_{it} - \epsilon_{it-1})] &= 0, s \gg 2; t = 3, \dots, T \end{aligned} \quad (34)$$

式（34）中的 X_{it-s} 代表解释变量的集合，由于解释变量中的投资水平等变量受个体理性选择的影响，因此一定程度上可能对其他变量具有依赖性，从而导致内生性。为了消除内生性所带来的回归误差，考虑采用各变量的滞后一期项作为工具变量对方程进行回归。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将样本分为全国样本和地区样本，分别对其进行估计，表 1 显示了面板回归估计结果。

回归结果发现，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地区样本， $dln(E_{it-1})$ 的系数值始终为正，且解释度很强，这说明了就业变动的持续性，工作岗位短期内不会剧烈变动。就全国样本而言，分析期内，贸易开放（ RTC_{it} ）对地区就业变动（ $dln(E_{it})$ ）的影响显著为正，地区关税削减程度越大，对地区就业变动的负面影响越大。说明关税削减对中国地区就业起抑制作用。这也与关税削减程度较高的地区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关，而关税

表 1 贸易自由化对地区就业变动的影响

$dln(E_{it})$	1	2	3	4	5	6	7	8
$dln(E_{it-1})$	0.683*** (7.55)	0.554*** (6.71)	0.664*** (8.12)	0.548*** (7.44)	0.611*** (9.46)	0.529*** (8.55)	0.555*** (8.74)	0.512*** (7.43)
RTC_{it}	0.192** (3.79)	0.211*** (4.61)	0.312*** (4.55)	0.336*** (3.83)	0.218*** (3.56)	0.232** (2.12)	0.064** (2.09)	0.065* (1.68)
lab_{it}	-0.255* (-1.86)	0.044 (0.87)	-0.064*** (-3.56)	-0.034*** (-2.74)	-0.082*** (-4.88)	-0.093* (-1.73)	-0.128*** (-5.42)	-0.166*** (-4.79)
$ln(inv_{it})$	0.058* (1.66)	0.112 (0.38)	0.082* (1.79)	0.144 (0.88)	0.075* (1.77)	0.094 (0.61)	0.049 (0.74)	0.112 (0.81)
$ln(urb_{it})$	0.116*** (5.95)	0.213*** (4.81)	0.247** (2.53)	0.279* (1.69)	0.204*** (3.46)	0.223** (2.55)	0.121*** (6.04)	0.142*** (6.63)
$ln(pro_{it})$	-0.036 (-0.99)	-0.013 (-0.44)	0.131 (-0.62)	0.049 (-0.35)	0.011 (0.44)	-0.005 (-0.89)	-0.104 (-0.61)	-0.143 (-0.44)
$lab_{it} * R7$		0.117*** (10.93)		0.086*** (7.98)		0.161* (1.77)		0.148 (0.59)
N	496	496	160	160	128	128	208	208
调整的 R^2	0.3421	0.2817	0.3892	0.2667	0.3298	0.2967	0.3914	0.3142
H 检验值	0.0235	0.0172	0.0082	0.0123	0.0021	0.0018	0.0096	0.0157
Wald	288.41 (p=0.000)	574.36 (p=0.000)	298.33 (p=0.000)	557.23 (p=0.000)	308.61 (p=0.000)	599.38 p= (0.000)	216.34 (p=0.000)	488.56 (p=0.000)
Hansen-J	28.56 (p=1.000)	25.44 (p=1.000)	27.68 (p=1.000)	24.55 (p=1.000)	26.38 (p=1.000)	22.46 (p=1.000)	27.91 (p=1.000)	26.55 (p=1.000)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是 t 统计量。本文经过 Husman 检验确定模型应当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由于 H 值小于 0.05，则拒绝原假设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下降程度最高的就是这些原本受到保护的传统意义上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因此这些部门受到的冲击最大，大量聚集的农民工和内地打工者将遭到关税削减带来的负面冲击。此外，（ lab_{it} ）对就业的影响显著为负，劳动力流动性越缺乏，对地区就业变动的抑制作用越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力流动性较强的地区本身经济活力较强，工人的就业机会和转换工作的可能远远大于其他地区，结论与已有的国内外文献结论相一致。 $ln(inv_{it})$ 对劳动市场就业变动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各地区的投资比重相差不大，对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也不明显。地区城镇化水平（ urb_{it} ）对就业变动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就业受关税削减的冲击越大。城镇化水平越高，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此外新农村建设等城镇化措施催生更多的乡镇企业与家庭企

业，吸收了部分工人就业。而关税削减程度越大的地区往往城镇化水平越高，对地区就业的负面冲击也更明显。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pro_{it} ）对就业的影响，总体上存在负向效应，分区域结果显示，关税削减程度越大的地区，地区经济水平对劳动市场就业变动的抑制作用越小，这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但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且结果也不显著。劳动流动刚性与关税削减的乘积项（ $lab_{it} * RTC_{it}$ ）系数为正，说明地区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越高，关税削减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越大；劳动力市场刚性越低，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越小。对于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可能与国企改革及职工下岗的历史背景有关。由于国内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当一个地区劳动力市场刚性越弱，则越容易促使工人由受冲击部门向其他部门转移。

通过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将中等关税削减地区样本剔除，只考察关税削减对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和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地区就业变动的影响情况，并将考察期一分为二，因为 2005 年之后关税缺乏变异性，以 2005 年作为时间分割点。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为上文结论提供了较强的支撑。结论发现，从实行关税削减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段时期，国内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尽管面临国外的产品冲击，但由于低廉的劳动力使用成本，关税削减程度较大的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依然具有比较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东部沿海省份由于其加工贸易产业的集聚性，吸引了大量的中西部劳动者前往就业，关税削减对各区域就业变动的影响差异不大。随着劳动力用工成本的上升和原本落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原来的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倒闭或停产，造成大面积的失业。而关税削减程度较低的地区，在关税削减开始时段，劳动力大量流向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地区就业增长被抑制，在 2005 年之后，这些地区所受的冲击要小于关税削减程度更高的地区。因此，关于关税削减对地区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影响，既需要考察其总体效应，也需要根据国情，对不同时期的劳动市场就业变动分开讨论。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探讨了关税削减对地区就业变动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首先，关税削减抑制了地区就业增长，但存在地区和行业差异。关税削减程度越深，对地区就业变动的负面影响越大，劳动越密集的行业受到冲击越大。其次，关税削减条件下，劳动力流动性对地区就业的变动存在重要影响，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性越强，对就业变动的负面影响就越小，而劳动力流动性越弱，对地区就业变动的抑制越大。最后，将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分为两个时段，1996—2005 年为加工贸易发展期，2005—2011 年为产业结构调整

期（因 2005 年后中国关税趋于稳定，2011 年后差异不大，同时考虑两个阶段的对比更有参照性，故未取用 2011 年后数据）。在第一个时段中，贸易自由化对关税削减较高地区的就业抑制与关税削减较低的地区相比差别不大；在第二个时段中，当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之后，关税削减对就业的抑制开始显现。

鉴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在当前着力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应该密切关注其对地区劳动就业结构的冲击，对于贸易程度较高、劳动密集程度较高以及劳动流动性较弱的地区和行业给予高度的重视。

（一）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完善劳动力流动机制

关税削减对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受到地区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制约。当一个地区劳动力市场刚性越大、劳动力流动性越差时，贸易自由化对地区就业增长的影响越消极。因此需要采用法律和经济措施，尽可能完善劳动力流动机制，消除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目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国有企业、政府等单位在用人制度方面都比较程序化和规范化。而民营企业等单位在用人裁人方面都比较随意，虽然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律法规，要求规范用人单位的用人行为。但是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界限”仍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国企和政府的工作人员由于“铁饭碗”的存在而不易失业，而劳动者又很难从民营单位转移到政府或国企等单位，导致劳动力市场就业缺乏弹性。贸易自由化的冲击，首先受波动的往往是民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的失业人员无处可去，只能选择自主择业或失业，从而造成统计数据中失业率增加。劳动力流动灵活性的缺失导致地区就业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调整缓慢，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利。

（二）完善劳动者失业保障，积极推动大众创业

关税削减程度越高的地区，对技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负面效应越大。这需要政府予以关注并采取措施，可以考虑给相关失业人员提供临时失业救助，保障其基本生存和再次就业前的过渡期生活。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可以成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建立规范的互联网创业基金和其他创投基金，让中小企业更多地享受政府创业基金的支持，并努力提供全方位服务，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应为创业提供法制保障、规范监管、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减少政策性阻碍，用互联网思维去修订已不适用于创业创新的法律法规，促进创业创新。其他手段包括降低创业企业准入成本、保障就业人员流动和强化企业专利保护，制定规范的产权定价机制和转移退出机制，最大限度地支持中小企业、个人创业。最后，需要建立小微企业融资增信体系，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三）加大创新研发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目前，中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地区所拥有的劳动力技能丰裕程度不同及人力资本地区分布不均。尽管关税削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技能就业结构的改善，但并不意味着对技能工人需求的减少。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技术进步与进口竞争最终必然增加对技能熟练工人的需求。因此，要想通过贸易自由化实现地区差距缩小、促进贸易福利增长，必须考虑提高劳动力中的技能劳动比重，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政府层面可以采取的具体方式有：加大农村地区教育投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地区教育差距；加强员工职业技能培训，实行劳动力的供给侧改革，积极保障企业对技能工人的需求；宣传创新理念，强化创新思维，加强创新研发资金投入力度，考核创新效果；以引领潮流的大数据、互联网思维，推动创新成果企业化、市场化，从国家层面、地区层面、企业层面、劳动者个体层面全方位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参考文献：

1. 罗良文：《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就业效应分析》，《东岳论丛》2004年第6期。
2. 袁富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就业状况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第4期。
3. 胡昭玲、刘旭：《中国工业品贸易的就业效应——基于32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07年第8期。
4. 毛日昇：《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就业》，《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5. 盛斌、牛蕊：《国际贸易、贸易自由化与劳动力就业：对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研究》，《当代财经》2009年第12期。
6. Freeman, R. B and Katz, L. E. On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migration and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No. 3761, 1991.
7. Keith Head, John Ries. Rationalization effects of tariff reduc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 47, 1999.
8. Head, Keith, and John Ries. Offshore Production and Skill Upgrading by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 58, 2002.
9. Kovak, Brian K. Regional Effects of Trade Reform: What is the Correct Measure of Liber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103, 2013.
10. Dix - Carneiro, Rafael and Brian K. Kovak. Trade Reform and Regional Dynamics: Evidence From 25 Years of Brazilian Matched Employer - Employee Data, 2014.

责任编辑：李蕊

奥运经济效应及我国发展冰雪经济的国际经验比较与借鉴

田 栋

摘要：举办奥运会能够大幅改善举办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品牌价值，拉动旅游、体育产业短期大幅增长，也有利于释放举办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但同时也会带来短期投资增长的挤占效应、场馆设施利用率不足及债务扩张等风险。相对而言，通过国际经验比较可以发现，举办冬奥会能够带动发展冰雪产业，形成冰雪经济产业链，降低奥运经济消极效应。我国发展冰雪经济应结合全球冰雪运动参与者活动流向转移趋势，着重培育建设高品质冰雪资源区和冰雪消费市场，带动冰雪装备制造业发展，形成一流冰雪装备制造品牌。

关键词：奥运经济 冰雪经济 国际经验

作者简介：田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博士。

北京市和张家口市将在 2022 年联合举办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往的经验表明，奥运经济的积极效应将为举办城市及周边区域带来巨大发展契机，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市民人文素养、生态环境保护都将得到大幅提升。把握冬季奥运发展特点及特殊规律，以冬奥会举办为契机发展冰雪经济是十分重要的。借鉴国际经验，主动契合全球冰雪运动发展趋势和国内消费升级需求，积极打造冰雪经济产业链，这对于实现“3 亿人上冰雪”目标及通过冰雪经济发展打造冰雪运动强国意义重大。

一、奥运经济的积极效应

通常认为，奥运会举办以及对奥运经济的经营所带来的效益是正向的。^①但是，关于奥运经济是否带来经济增长的争论始终存在，反对奥运经济将带来经济增长的观点认为，历届奥运会赛事在经济上成功的寥寥无几，即使像东京奥运会也存在直接收益亏损的状况。一些奥运会举办国家往往因为举办奥运会赛事而承担大量债务，最终引起经济停滞甚至倒退。正因为奥运经济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近年来国际体育界以及举办国政府都在认真思考如何发挥奥运经济的正效应并规避负效应，包括加强国际奥委会与举办国的财政合作，分担财政风险，以及削减奥运赛事规模，减少奥运项目和重复利用赛事场馆设施等建议和观点日益增多。客观而言，举办奥运会是否盈利，以及能否利用举办的契机打造“奥运经济”，最大效用发挥体育赛会在基建改善、产业调整、人力资本成长、文化软资产提升等方面的效用，主要取决于举办国政府及赛事场馆所在地政府的规划和经营能力。

（一）交通及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大幅改善

得益于奥运会作为全球顶级体育盛会对场馆建设及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高标准要求，赛事举办国政府往往需要进行大笔财政投入来完成赛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或是将现有场馆改造升级再利用，或是直接兴建新场馆，配套建设城市地铁、轻轨及高速公路、给排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工程。可以说，奥运会财政支出中大部分支出用于基础设施改扩建工程已成为奥运会举办惯例。赛事举办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于这种依靠赛事活动升级基础设施的做法也尤为赞同。

例如巴塞罗那奥运会支出中，赛事场馆建设及运动训练设施支出仅占总预算的9.1%，大部分预算用于改建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比较著名的是当时巴塞罗那政府提出的“城市向海洋开发”口号，投资兴建5公里长的海滨沙滩，改扩建港口及公路设施，翻新近3000座建筑，建设450个城市公园，城市排水系统也进行了升级。巴塞罗那以举办奥运而完成市容市貌翻新，并通过赛事向世界展示了文明奔放热情的城市形象，获得巨大的间接经济效益。

^①奥运经济具有特定内涵，广义的奥运经济是指一国通过举办奥运会所获得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直接效益是指通过赛事运动举办所获的如电视转播权销售、赞助商费用以及门票收入、奥运概念关联商品贩卖收入。间接效益是指一国通过举办奥运会所带来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涌入及贸易、旅游增长收入，还包括通过举办奥运会所带来的城市价值品牌的提升以及体育运动推广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红利。一般意义上的奥运经济是指包括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的广义奥运经济概念。

表 1 举办奥运赛事投入

举办城市	举办赛事投入	举办城市	举办赛事投入
北京奥运会	450 亿美元	索契冬奥会	500 亿美元
里约奥运会	200 亿美元	平昌冬奥会	130 亿美元
阿尔贝维尔冬奥会	36 亿美元	利勒哈摩尔冬奥会	17 亿美元
长野冬奥会	11.4 亿美元	盐湖城冬奥会	19.3 亿美元
都灵冬奥会	27 亿美元	温哥华冬奥会	64 亿美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历届冬奥会投资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及网络公开数据整理而得。

再比如举世闻名的北京奥运会，预算支出 2800 亿元人民币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赛事场馆建设投资的 20 倍。从 2001 年申办成功到 2008 年举办夏季奥运会，北京市投入巨资改建城市基础设施，其中尤其在城市交通体系建设中着力甚多。在至 2008 年前的奥运准备期内，北京市兴建开通地铁 5 号线、10 号线一期、奥运支线、机场线、朝阳路快速公交等公共交通线路，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在奥运周期内上升了至少 10 个百分点。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机场南线及机场第二高速路相继建成通车，北京市籍奥运契机完善城市基础交通体系，成效显著。

（二）经济效益如赛会商业收入大幅增长，经济加速发展

奥运赛事活动举办因其巨大投入而能够拉动举办地经济进入一个较高增速发展期。这种经济发展既体现在赛事活动门票及转播收入等直接效益，比如据统计从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电视转播收入从 2.87 亿美元增长至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 26 亿美元，增长近 10 倍；冬季奥运会电视转播收入从 1984 年萨拉热窝冬奥会的 1 亿美元增长至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的 12.8 亿美元，增长近 13 倍。奥运经济效益也体现为投资拉动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比较典型的如 1964 年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年奥运赛事收入尚不及投入，遭遇直接亏损，但当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确由奥运会举办前一年的 10.1% 猛增至 26.1%，被称之为“东京奥林匹克景气”。这段景气时期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从 1964 年到 1970 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 57 个月，经济总体增长 122.8%，工资上涨幅度达到 114.8%，建筑业、服务业、运输及通讯业都得到大幅发展，日本国民经济总产值也在这段时期连续超过英法和西德，位居世界第二。

从奥运经济统计情况来看，奥运经济的主要收益来自间接经济效益，而间接经济效益主要得益于奥运会的经济辐射功能。奥运经济辐射交通运输、信息通讯、旅游餐饮、建筑、体育产业等多个产业领域，从奥运申办到举办奥运乃至到后奥运经济阶段，奥运经济的周期跨度一般在 8 至 13 年左右，若能够结合举办国产业结构现状，运用正确的产

业发展策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并非难题。从表 2 中可得知，奥运经济的间接效益往往数十倍于直接效益，许多奥运举办城市在奥运周期内实现了产业升级和就业人数大幅增长。比如巴塞罗那奥运会创造了 12 万个经常性就业机会。北京奥运会在 2005 年至 2008 年间，北京市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达到 11.8%，4 年新增就业岗位 150 万个。同时拉动了协办城市经济增长，2001 年至 2008 年，青岛奥帆赛对青岛经济发展拉动作用约占 GDP 的 4.5%，每年拉动 GDP 增长 0.8 个百分点。

表 2 第 23—27 届奥运经济情况					单位：亿美元
届次	23	24	25	26	27
直接经济	2.27	4.7	0.4	0.1	4.5
间接经济	32.9	97	260	51	165

数据来源：陶于：《奥运经济问题研究》，《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8 卷第 3 期。

（三）旅游及体育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举办奥运会对旅游及体育产业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奥运赛事申办及时间达 10 年以上的筹办和举办周期往往能够带动举办国国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体育服务业专业市场往往在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举办后迅速成长，健身娱乐、竞赛表演、技术培训、体育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都有较高的增速。同时，全球媒体对奥运赛事的关注也能够带来国外游客赴奥运赛事目的地的旅游热情。据统计，1988 年汉城奥运会后，至 1999 年的 11 年间，韩国体育产业的增长幅度从每年不足 30 亿美元增长至 90 亿美元，体育产业占 GDP 比重上升至 2.5%，年增速达到 12%。1996 年，澳大利亚体育产业占 GDP 比重为 0.6%，到 1999 年悉尼奥运会举办的前一年，澳大利亚体育产业占 GDP 比重上升至 3%。

表 3 历届奥运会增加的入境人数及旅游收入（不完全统计）

历届奥运会	入境旅客人数增加	旅游收入增加
1984 洛杉矶奥运会	23 万	
1988 汉城奥运会	22 万	14 亿美元
1992 巴塞罗那奥运会	30 万	30 亿美元
1996 亚特兰大奥运会	29 万	35 亿美元
2000 悉尼奥运会	50 万	42.7 亿美元
2008 北京奥运会	38.2 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公开数据整理而得。

举办奥运会也能够增加大量旅游外汇收入及拉动旅游业发展。从上表统计可知，奥运会往往能够带来明显的旅游人次增加预期，通过赛事旅游引导增加消费也是常见的产业发展策略。一般而言，入境旅客除了到赛事举办城市之外还会去所在国其他城市游玩，因此，举办奥运会对旅游业的刺激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举办城市，同时也会带动周边城市乃至国家的旅游消费增加。巴塞罗那、亚特兰大和悉尼奥运会均通过举办奥运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旅游外汇收入，同时也改善了旅游客源结构，非传统客源人次显著增多。据统计，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到巴塞罗那度假旅游的人次环比增长 2 倍；2000 年悉尼奥运会期间，悉尼主要海外客源市场环比增加 29.3%。希腊旅游收入在 2005 年达到 110 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6.1%。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10 年至 2015 年全球旅游市场以年均 15% 的速度增长，规模扩大至 2052 亿美元，其中特别以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举办年增长最快。总体而言，举办奥运会确实能够带来旅游收入及旅游业的高速增长，这也是奥运会最显著且疑义最少的经济效应之一。

（四）城市品牌价值提升，推动城市转型发展

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显而易见，奥运会将吸引大批商业赞助商、媒体记者、外国游客集聚举办城市，通过赛事活动观赏及媒体报道，举办城市形象得以展示，城市品牌价值不断提升。典型如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通过城市形象展示，基础设施改建工程，城市景点改造和打造海滨新区，巴塞罗那向全球展现了结束弗朗哥统治后开放文明的现代西班牙文明，使巴塞罗那从欧洲二线城市一跃成为全球著名的旅游城市，此后多年为西班牙带来大量的海外游客。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举办后，盐湖城成为世界知名的滑雪胜地，2007 年盐湖城接待游客人次超出 2002 年冬奥会举办年 200 万，相继举办多种冬季运动项目大赛，带动周边城镇形成一批特色旅游小镇。此外还有北京奥运会对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积极效应。北京市举办奥运会除了带来基础设施的大幅改善，也带来市民环保理念、科技创新理念的提升，北京市民公共出行比例大幅提高，山地绿化、林地面积增加，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关停搬迁。城市建筑设计风格新颖多样、都市规划更加合理有序、人文素质显著提升。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帮助树立中国开放文明、注重和谐的世界形象，北京乃至中国的国际声誉显著提升。

（五）为经济增长带来长期正面影响

一些实证研究结论认为，举办奥运会，尤其是夏季奥运会能够带动开放和贸易增长。美国经济研究局学者罗斯和斯皮格尔研究认为，举办奥运会对举办国贸易增长有直接长

期正向影响，举办夏季奥运会能带来大约 30% 的出口增长，即使是申办失败的国家，出口也在申办过后出现较长时期的正增长。这种贸易增长效应仅限于夏季奥运会，在冬季奥运会举办国并不明显。该研究认为，申办和举办奥运会都会带来所在国更多的开放自由的政策措施和与世界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这将会显著带动举办国出口增长和贸易量增加。与此同时，举办奥运会会带来就业岗位大幅增加，例如美国经济研究协会的测算结果表明，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为南加利福尼亚创造了 7 万余个工作岗位，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创造近 8 万个就业机会。

二、奥运经济的主要风险及消极效应

（一）体育场馆及基础设施利用不足

在奥林匹克项目中存在着“大项”和“小项”之分，这种分类主要取决于此项运动的群众基础是否足够大，民众参与此项运动的热情能否持续保持。例如篮球、足球、排球、游泳等运动项目在全球各地区都有广泛的受众参与，在举办奥运会之后赛事场馆也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但诸如水上皮划艇、击剑、自行车等运动项目往往并不具备较大的参与基础，也因此在举办奥运会后面临着场馆利用度较低的问题，甚至一些比赛场馆直接荒废，造成巨大浪费。此外，场馆维护费用居高不下，例如悉尼奥运会主场馆每年需要 3000 万美元维护费，举办平昌冬奥会的江原道政府预计将在冬奥会已结束后每年拿出 850 万美元维护场馆。在利用率较低的情况下还要专门进行场馆维护，财政负担显而易见。在基础设施方面，一些奥运举办城市为顺利开展奥运赛事和刺激旅游发展，在筹备阶段会建设连接主要城市和赛事举办城市之间的交通设施如高速公路和铁路，投资非常大，但一些赛事举办城市本身市场规模较小，在奥运会之后也未能如期达成持续较大规模的旅游人潮和预期的与主要城市之间的产业联系，这就造成交通基础设施利用度较低，收支难以平衡。同样的问题在酒店业也存在，举办奥运会往往要兴建奥运村及配套的游客住宿空间，在奥运筹备阶段，酒店客房建设数量会在短期内大幅增加，在赛事举办期间，客房入住率能够得到保障且能够带来较大的经济收益，但在赛事结束后，酒店客房空置的问题往往难以得到解决，酒店破产的新闻也不时出现。

（二）短期公共投资加大，对产业结构造成短期冲击，挤压私人投资和消费

奥运会投资中多数来自公共部门，场馆基建、铁路交通及酒店住宿等产业一般投资规模较大，政府投资以及由政府担保发行债券是资金主要来源，私人投资很少涉入奥运赛事投资，历史上只有 1984 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出色利用社会资本解决建设资金难题并获得经济收益。自洛杉矶奥运会后，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奥运赛事投资就成为历届奥运会举

办方主要诉求之一，但实际上由于赛事投资规模大、收益不确定性高、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公共投资和政府投资仍是主要方式。这就造成在较短时期内因举办奥运会而造成公共投资快速增长，且投资集中在建筑、酒店、交通等相关产业部门，使其他产业部门投资受到挤压。同时，发债向社会及私人募集资金，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即期和跨期的挤占效应，消费减少增加经济下滑风险。

（三）投资过大及财政负担加重，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举办奥运会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投入，尤其是通过赛事升级基础设施已经是奥运会举办的特征之一。而基建工程的投入往往容易引起超预算支出及债务膨胀，典型如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在奥运会举行当年的 2004 年，前两个季度希腊政府发行了 300 亿欧元债券以支持奥运会正常举办，当年希腊财政赤字达到 GDP 的 6.1%，是欧元区限定的 3% 的两倍，债务总额占 GDP 比重为 110.6%。过量的财政支出虽然带来希腊旅游收入增加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增长，但举办奥运会引起的债务负担叠加希腊长期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及福利政策，最终成为诱发希腊债务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其他著名案例还有 1976 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这届奥运会投入从预算的 1.2 亿美元一路飙升至 15.96 亿美元，扣除赛事收入后大约留下 10 亿美元债务，蒙特利尔纳税人直到 2006 年才清偿债务，这届奥运会也因债务膨胀被称作“蒙特利尔陷阱”。

三、冬季奥运会的效应分析

与夏季奥运会赛事不同，冬季奥运会因其对赛事举办场地的资源要求，往往在冰雪资源和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城市举办，这些冰雪城市的人口、产业、消费等各种指标均与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大城市有显著差别，许多冬奥会举办城市在举办之前并不知名，且与所在国经济中心城市距离较远。这些因素造成申办冬奥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难度更大，科学规划与运用冬奥会赛事举办带来的积极效应，就成为举办城市的重中之重。一般而言，举办冬奥会都会带动冰雪体育产业的高速发展，冰雪装备制造、冰上运动项目开发、冬季山地户外运动开发等都是发展冰雪体育的重要产业方向，在具备一定的冰雪体育产业基础后，带动旅游消费和培训康复等冰雪体育服务业发展，同时发展形成以冰雪体育运动装备制造为基础的制造业产业链，最终能形成较大规模的冰雪体育经济总量，从而为长期发展冰雪体育产业建立基础。

归纳总结历届冬奥会举办经验，发现冬奥会经济效应应有以下几点与夏季奥运有较大差别。

一是冬奥会举办将带动形成冰雪城镇，并依托冬奥会举办带动所在国冰雪产业快速

发展。现代冰雪运动发展起源于欧洲，主要的冰雪运动国家如挪威、瑞典、瑞士、奥地利均是欧洲国家。回顾冬奥会举办历史，多届冬奥会举办地位于小城镇，冰雪资源丰富但人口较少。冬奥会承办城镇往往在举办冬奥会后成为世界冬季运动名城，且所在国冰雪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表 4 著名冬奥会举办城市及人口规模

举办年份	举办地	人口规模
1924 年	夏蒙尼（法国）	
1928 年、1948 年	圣莫里茨（瑞士）	少于 5000 人
1956 年	科蒂纳丹佩佐（意大利）	约 6000 人
1960 年	斯阔谷（美国）	
1972 年	札幌（日本）	
1980 年、1932 年	普莱西德湖（美国）	约 2700 人
1988 年	卡尔加里（加拿大）	
1992 年	阿尔贝维尔（法国）	
1994 年	利勒哈默尔（挪威）	约 2 万人
2018 年	平昌（韩国）	不足 5 万人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而得。

受限于冬季运动项目对场地和天气条件的要求，冬奥会举办城市往往选址在冰雪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这些城镇也借由举办冬季奥运会而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冰雪名城。比如法国的夏蒙尼、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瑞士的圣莫里茨、日本的札幌和长野等。举办冬奥会与冰雪名城的形成，集中汇聚优质顶级冰雪资源，从而带动形成大规模冰雪产业。据统计，目前全球主要冰雪运动和旅游资源集中在欧洲、北美和亚洲。欧洲接待了全球 57%的滑雪者，其中，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接待了 11%的滑雪者，阿尔卑斯山脉区域（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接待全球 46%滑雪者。亚洲以日本、韩国为主，接待全球 15%的滑雪者，北美接待全球 23%的滑雪者，多数雪场以大型滑雪度假区形式分布在美加交界地带和阿拉斯加、落基山脉。其中，全球 44 座冬季平均滑雪人次超过 100 万以上的滑雪场，有 80%位于阿尔卑斯地区。从现有冰雪产业发展状况来看，冰雪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与举办奥运会地区从地域概念理解是一致的，说明冬季奥运会对拉动冰雪产业发展具有直接效用。

二是冬奥会举办将带来冰雪运动普及和推广，促进举办国形成冰雪运动文化，为冰雪运动及冰雪产业发展建立正向支撑。现代冰雪运动发源于欧洲，在全球兴起不过百年

时间。新兴冰雪运动国家民众在运动项目设置、规则理解等诸多方面，与成熟市场国家民众相比均存在差距。冬奥会的举办能够显著缩小这种差距，带来举办国民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形成冰雪文化，最终推动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发展。以日本冰雪运动发展为例，日本是全球少数举办过两次冬奥会的国家之一，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冰雪运动中心，也是全球知名的、广受海外冰雪运动爱好者认可的冰雪运动目的地。日本的冰雪运动竞技水平位居亚洲前列，尤其是在花样滑冰领域实力雄厚。2018 年平昌冬奥会日本拿下 4 金 5 银位居第 11 位，在亚洲地区成绩仅次于东道主韩国，日本选手羽生结弦蝉联花滑男单冠军吸引全球巨大关注。日本虽不是冬奥强国，但却是冰雪强国。某种意义上，日本冰雪运动已成为日本国家形象的代表性符号，成为输出日本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日本冰雪运动的发展与奥运会举办有着直接关系，日本的冰雪资源相对比较丰富，但冰雪运动的流行始于 1972 年札幌举办亚洲第一次冬奥会。举办冬奥会不仅帮助札幌实现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城市人口也上升至 180 万人左右，成为北海道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发展成为日本冰雪运动中心。在 1972 年札幌冬奥会举办后，日本国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被点燃，同时札幌通过冬奥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冬奥胜地，到 20 世纪 80 年代，五年期日本国民滑雪人次突破 8000 万，札幌连续举办了 1986 年和 1990 年亚冬会，进一步巩固了其日本冰雪运动中心的地位。1998 年日本长野再次举办冬奥会，使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冰雪运动大国。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十年”，日本国民参与冰雪运动热情衰减，到 2016 年，五年期国民滑雪人次下降至 4000 万以下，但日本逐步成为吸引海外冰雪运动爱好者的冰雪运动目的地之一。澳大利亚、韩国以及中国游客是主要的访问群体。

表 5 日本举办的大型冬季运动赛事

1972 年	札幌冬奥会	1998 年	长野冬奥会
1986 年	札幌亚冬会	1990 年	札幌亚冬会
2003 年	青森亚冬会	2017 年	札幌亚冬会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而得。

日本的札幌市举办了一届冬奥会和三届亚冬会，目前正在筹备申办 2026 年冬奥会。札幌冰雪旅游已经成为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札幌冰雪节从 1950 年开始举办至今，每年吸引 200 多万访客，成为世界四大冰雪节之一。2015 年，札幌接待外籍游客 191 万人，其中，中国游客 55.7 万。

四、参照国际经验，通过奥运经济发展冰雪经济的若干建议

（一）紧密跟踪全球冰雪运动参与者活动流向转移趋势，完善冰雪基础设施建设，培育高品质境内冰雪运动资源区

据著名的滑雪运动研究者劳伦特·凡奈特的研究发现，冰雪运动具有非常强的在地化特征，绝大多数冰雪运动参与者习惯于在本地区参与冰雪运动，全球冰雪运动参与者中只有 12% 到达非所属国参与冰雪运动，而且这些跨境冰雪活动参与者只会选择全球最著名的冰雪运动目的地。这意味着大多数跨境冰雪活动参与者的目的地集中在欧洲，尤其是阿尔卑斯地区。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将有可能改变。目前传统的冰雪运动地区如阿尔卑斯地区已基本停止新建滑雪场，而东欧、中亚及亚太地区的滑雪场建设仍在加速。东欧、中亚及亚太地区贡献了全球 34% 的冰雪运动参与者，但只有 24% 的参与者在本地区参与冰雪运动，预计这种状况将发生改变，会有越来越多的冰雪运动参与者到东欧和亚太区域参与冰雪运动。到 2020 年，随着冰雪运动参与流向从西欧转向东欧和亚太，全球冰雪运动参与人次有望达到 4.2 亿人次。

从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的基础条件、现实机遇和全球冰雪运动市场变化的趋势来看，随着 2022 年冬奥会在我国举办以及国内消费市场升级、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所带来的冰雪运动参与者数量大幅上升，我国将会成为亚太区域乃至全球重要的冰雪运动资源区之一。根据政府规划，到 2025 年我国将有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直接参加冰雪运动的人数超过 5000 万人。有关机构预测到 2022 年冰雪运动场馆超过 1000 座，到 2020 年冰雪运动产业规模达到 6000 亿元，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初级滑雪市场。若能够持续完善冰雪运动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建设若干滑雪场地，围绕冬奥会效应升级传统冰雪运动资源区如东三省、新疆、河北等地冰雪运动场地和配套基础设施，我国也将有望成为全球重要的冰雪运动资源区和亚太地区重要的跨境冰雪运动目的地。从场地条件、配套设施建设水平、运动参与者规模、产业化空间等多方面因素来看，我国将有望取代日、韩成为亚太地区冰雪运动中心。

（二）创造条件增强居民滑雪参与率和滑雪者滑雪次数，建立冰雪文化，逐步培育较为完善成熟的冰雪消费市场

我国冰雪运动初级参与者较多，参照国际经验，需尽快培养冰雪文化，增强复滑率。强化冰雪运动参与首次体验效果，培养冰雪运动是体育运动而非娱乐活动的理念，为冰雪产业发展建立良好的参与体验基础，从而为产业发展形成长久支撑。数据显示，冰雪运动发展成熟地区，国内居民参与率大部分在 10% 以上，瑞士和奥地利国内居民参与率突

破了 35%，韩国 6%，俄罗斯 2.5%，中国 1.25%。在国内滑雪者人均滑雪次数方面，奥地利、瑞士、法国均超过 4 次，日本为 2.5 次，美国超过 2 次，我国滑雪者人均滑雪次数经测算大约为 1.45 次。虽然中国滑雪爱好者绝对数量高，但参与率和国内居民人均滑雪次数均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尽管如此，也要看到，冰雪运动由于在我国发展较晚，市场成熟度不足造成参与率等核心指标较低，但在最为重要的国内滑雪者人均滑雪次数统计项，我国达到 1.45，基本与土耳其和俄罗斯同等水平，低于美国 and 韩国。

表 6 亚太地区主要冰雪运动国家指标对比

	国内滑雪参与者人数（千万人）	国内居民滑雪参与率（%）	国内滑雪者人均参与次数
中国	12.13	1.25	1.45
日本	11.45	9	2.6
韩国	2.93	6	1.8
澳大利亚	1.0	4	2.1
新西兰	0.3	7	3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而得。

这说明我国冰雪旅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随着滑雪爱好者增多和冰雪运动成为城市中产阶级休闲运动的主要方式，冰雪文化逐渐得到培育，我国国内居民滑雪参与率、国内居民滑雪人均次数和国内滑雪者人均次数三项核心指标都会得到大幅度提升，使冰雪运动和旅游产业成为支撑体育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三）注重冰雪运动与冰雪旅游经济的强相关性，做好娱乐、商旅、餐饮、酒店等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发展建设山地冰雪旅游度假雪场，形成稳定可循环正向消费流

对于当地政府和雪场投资者而言，发展冰雪运动除了带来滑雪运动爱好者，也会带来相应的餐饮、商旅、酒店住宿等配套设施消费额的提升。因此，增加爱好者在雪场的停留时间，增加爱好者滑雪次数不仅带来稳定的客票收入，也会带来大量延伸的旅游消费收入。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同滑雪场规模对经济的贡献度有较大差别。据伍斌和魏庆华编著的《2017 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介绍，按照国内滑雪产业现状来看，大约 3/4 的滑雪参与者仅参与了以旅游体验为主要特点的滑雪运动。这类以观光旅游为主的滑雪场设施比较简单，只建设初级道，一般布局在景区或者城郊。平均停留时间仅两小时。因此，国际上发展冰雪运动和旅游产业主要依靠停留时间较长的度假型雪场，对山体条件有较高要求，配备多层次雪道，建设有酒店等配套住宿设施，一般形成过夜消费且停留时间平均超过一天。目前我国此类山地度假旅游型雪场代表有万达长白山、亚布力、崇

礼云顶，从建设标准、山体条件、运营管理、酒店配套等方面来看，已具备国际领先水平，但从总量来看，全国此类垂直落差超过 300 米的雪场数量仍旧较少，与中国冰雪经济发展趋势相比，还难以满足需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冰雪运动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冰雪运动高速发展期都会出现雪场数量和滑雪人数的高速增加，但到一定时期之后，滑雪人数增长趋于平缓，但雪场数量会出现下降。这主要是因为雪场竞争增强和滑雪参与者对冰雪运动的理解更加成熟，会更多选择体验场地条件和配套设施更加成熟的山地冰雪旅游度假村。这意味着我国在冰雪运动发展期应注重雪场建设的配比，更多发展场地条件好、配套能力强的山地冰雪旅游度假村。

（四）引导扶植国产冰雪装备制造企业，尽快形成品质对标国际的一流冰雪装备制造品牌

冰雪装备包括雪场装备和个人装备，雪场装备包括索道、压雪机、造雪机、雪地摩托等，个人装备包括滑雪鞋、滑雪服、滑雪板、滑雪镜、滑雪杖等等。目前在雪场装备方面，国外品牌占比较高，尤其是关键的压雪机和造雪机，美国 SMI、法国 AST 公司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都很高。国有装备中近年来成长性较高的是个人装备，主要是滑雪服、滑雪镜、滑雪手套等护具产品生产较多。从整个冰雪装备行业的现状来看，国产品牌在技术、成本、品牌以及后期维护方面与国际顶级生产商存在着差距，短期来看，个人冰雪装备制造水平具备快速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当前我国滑雪者中初滑者众多，个人装备以租赁为主，而成熟市场个人装备有很高自备率。随着我国滑雪者冰雪文化逐渐成熟，装备自给率将会大幅提升，相关测算个人装备产业规模大概在 170 亿元左右，未来几年进入此行业的企业会逐渐增多，个人冰雪装备制造水平也将在竞争中得到提升。雪场装备制造方面，目前国内一些机械类企业在看到冰雪产业市场机遇后有进入此领域的计划，有一些企业已经生产出诸如索道等高端产品。据有关数据，2017 年全国滑雪场全部造雪机数量合计约 6600 台，其中国产造雪机占比约为 15%。我国近年来在雪场设备制造方面涌现若干拥有稳定技术和运营能力的公司，生产的产品部分也出口国外。现在我国著名的滑雪行业公司有在新三板上市的卡宾滑雪，有专业滑雪手套制造商建华中兴，专业旱雪产品制造商星奥股份，以及河南晋安机械（生产魔毯）、北京波马嘉仕其（索道生产商）等，一些体育行业知名企业也积极在冰雪产业布局，比如 2016 年安踏体育收购日本专业功能性运动服装品牌迪桑特（Descente）。随着冰雪产业市场规模的扩大（据测算有 300 亿），会有更多民族企业进入冰雪市场，如果能够先期给予政策引导，鼓励支持国内企业与国际顶级生产商合资，或者支持国内资本对一些国际行业技术领先企业进行收购，都有利于使国内企业在中国冰雪产业高速成长期享受增长红利。

（下转第 117 页）

· 名人观察 ·

由疫苗安全到公共安全：忧思与治理

贾 康 欧纯智

摘要：本文研讨了疫苗作为准公共产品所衍生的公共安全问题，论述了必须普遍接种疫苗的原因以及结合市场与政府的相对优势联手解决疫苗的安全问题，提出优化特许权管理、把疫苗安全机制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安排的四方面建议。

关键词：疫苗 准公共产品 公共安全

作者简介：贾 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欧纯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特约研究员。

由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引发的问题疫苗案近期引起高度关注，网上舆情激烈。近 20 余年，国内疫苗事故频发，从美国、日本等国的相关经验看，发达国家的疫苗安全问题也由来已久，业已积累的国际经验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当下，中国的疫苗安全问题必须尽早纳入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建设系统。

一、疫苗安全问题引发高度关注

从国内近年的疫苗案来看，虽然不乏政府介入和监管处罚，但我国疫苗安全领域依然存在重大问题与隐患，问题疫苗屡禁不止。由于对疫苗的审批、生产、运输、保管、使用等环节的监管不到位以及违规、事故的处罚过轻等原因，导致悲剧频频曝光。如果不彻底整顿，那么可以预见，将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国人不再相信疫苗，不愿主动接种疫苗。

大众健康防疫所需的疫苗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众所周知，市场难以有效解决由公共产品供给而衍生的诸多问题，是强调政府管制不可或缺的重要论据，已为主流经济学公

认。然而，实际生活中政府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转，却不断提出了一个难以调和的新问题：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风险防范水平如何“够格”？据报道，问题奶粉、问题疫苗的受害者到法院起诉，法院不立案。更有甚者，有的受害人家属因为起诉、上诉等“寻衅滋事”行为，服刑两年。

问题疫苗的问题没有解决，生产问题疫苗的企业没有解决，但提出疫苗问题的人被解决了。处罚成本与犯罪收益不相匹配的公共治理环境，不仅仅会扭曲涉事案件的结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扭曲今后与此相关的社会生活与可能案件的发生发展。中华大地上已历经问题奶粉、问题食品、问题疫苗案件的层出不穷，这次触目惊心的长生狂犬疫苗案使得家长对疫苗心存疑虑。很多家长在问：“我们应该接种疫苗吗？国家为何强制接种疫苗？”

二、我们为何必须接种疫苗

毋庸置疑，我们必须接种疫苗。接种疫苗是社会所需的公共产品供给行为，原则上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公民义务，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一个群体内，某个接种疫苗的个体行为对该群体其他成员会产生外部效应，即群体内每个个体之间具有相互外部性。这是由于防止传染性疾病的免疫接种，既能保护接种疫苗的当事人，同时也能减少该人所在群体其他人得这种传染病的可能性。

假定一剂安全有效的疫苗在一定时期内对接种疫苗的人提供完全保护，那么一个未接种此疫苗的人感染这种病的概率会随着群体内其他成员接种疫苗人数的上升而下降。再假定接种疫苗是有“安全成本”的，会有一定概率的死亡或致残，即便这个概率极低，那么由疫苗安全问题造成的逃避接种将不可避免。人们会在接种疫苗但有可能小概率致死致畸以及拒绝接种疫苗但有可能患病并传染给他人之间做出选择。事实也是如此，2013年深圳康泰公司乙肝疫苗致死事件，经过媒体过度报道，公众猜疑、恐慌随之而起，10个省份的乙肝疫苗接种率下降30%，进口疫苗接种率下降15%。

实践证明，确实已经有人在拒绝接种疫苗。群体内，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数越多，那么这个群体感染该疾病的人数就会越多，且可能成几何级数增长。理论上说，对于这个群体的每个接种水平（接种百分比），个体都有可能计算出自己患病的预期可能性。然而遗憾的是，个体无法得知自己所在群体的接种水平，所以根本无法正确评估自己是应该接种还是拒绝接种，所以无论选择接种还是拒绝接种都很难做到理性。经济学家常常假定市场可以完善地起到配置商品和服务的作用，但是市场对于产生外部效应的公共产品

却很难发挥好“资源配置优化”作用。^①

从政府职责、社会全局利益和根本利益的视角看疫苗，通常的公平原则是强制所有人接种。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都有义务接种疫苗，我们也有权利要求别人接种疫苗。但社会性的普及接种前提，是安全有效具有公信力的疫苗。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比如本例中问题疫苗泛滥，导致防止传染性疾病的免疫接种没有得到普及，那么国家在重拳出击有效整顿疫苗市场的前提下，更有必要尽可能向民众降低防范相关疾病的医疗保险费用负担。虽然治疗在本质上不会衍生相关的外部性问题，但是防范感染疾病的低成本负担会改变人们接种疫苗的决策，更积极地选择接受。毫无疑问，免费或近乎免费的接种会促进疫苗接种的普及。

当接种疫苗成为一种强制行为，必然会在相当大程度上超越市场规律，无法设想能通过以市场化纯自愿的方式落实普遍接种。由于接种疫苗是入学的前提条件之一，现在网络上已有不少家长质疑国家强制疫苗接种的合法性。在这里依学理分析，可以负责任地说，接种疫苗是关乎公共安全的关键问题，强制接种疫苗的安排本身没有错，关键性的问题、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不良情况——如同中国当下的情况，是疫苗的安全性出了问题。但理性分析可告诉我们，建立在“政府失效”基础上支持“去集体化”的论点，是没有出路的。疫苗出了问题，我们就要整改疫苗生产与供给体系，而不是拒绝接种疫苗。暂时拒绝接种疫苗应是家长们在冲击之下的无奈选择，而这种现象，确实足应敦促管理疫苗的当政者深刻反思。如何有效解决疫苗的安全问题，考验的是执政者的智慧。

三、市场与政府管制怎样结合才是解决疫苗安全问题的良方

严格地讲，疫苗属于公共产品中的准公共产品，在供给侧宜实施对接市场的政府采购，在需求侧宜匹配适当的使用者付费机制，才能形成较好的绩效状态。^② 对于通过规范程序以其资质取得制造商、供应商身份的厂家，政府必须施加严密的特许权管理。不难看出，民众对公共产品的满意度往往要低于一般消费者对商品的满意度，因为人们很难对强制配给的东西（公共产品）提起很高兴致并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关注，往往是被动接受。一旦发现有安全问题，不满意度（即感性的愤怒与批评）却会迅速爆棚。疫苗的安全问题应该被极其重视却一直未解决好，其原因非常值得深究。

我们知道，优化“特许权管理”式管制，作为经济发展运行过程中处理准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一种努力，其自身机制已内含了如何让公共产品销售（或称配置）更合意的

①[美] 戈登·塔洛克：《公共选择——戈登·塔洛克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385～394 页。

② 贾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领》，《中国金融》2016 年第 1 期，第 25～28 页。

取向，关系到民众“以脚投票”的问题。近期围绕西安、天津引进人才落户的新闻，从中我们看到，居民个人决定在哪里居住，首先要考虑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对其个人的影响。问题奶粉、问题疫苗高发地，一定不会成为民众有能力“以脚投票”时的首选地。所以，政府有动力将其辖区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做好，这同时也彰显政府对民众的回应性，是政府的职责之所在；企业参与准公共产品供给的动力，来自于其对盈利的渴望、市场公平竞争的向往、生发出对质高价低产品的不懈追求、对消费者诉求的及时满足的联系，无疑又成为市场的比较优势之所在。

但如果在缺乏行政干预与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把疫苗的供给机制几乎完全交给市场，让许多民众采取自愿形式购买疫苗，那么显然市场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保证所有人都能主动接种疫苗，传染病的流行将无法避免；如果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把疫苗特许经营权交给政府部门由少数官员决定其配置，又会形成过度垄断与低效带来的种种不良问题，甚至造成官商勾结、腐败寻租。^① 当前中国的疫苗供给是政府实际交由高俊芳、杜伟民、韩刚君这三位疫苗之王垄断，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被爆出 2017 年的销售费用 6 亿，被怀疑内含大量官商勾结的“买路钱”。不难看出，市场与政府都无法独立完成较好解决疫苗问题的使命。然而，市场的优势在于能为那些可以充分内部化的外部性提供适当的解决办法，但又必须予以承认，私人市场的方法并不是普世的方法，能够更多考虑和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在其将“善治”与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相结合的制度建设，敦促我们更多思考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优势互补——即我们要在充满逐利偏见却高效的市场与弘扬公共价值却往往绩效不合意的政府之间，做出某种结合式选择，并着力进行资源整合与机制优化。^② 市场与政府其实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二选一关系，市场的充分竞争与政府超强的内化外部性能力，只有一起通过有效供给机制来发力，才是破解疫苗之殇的有效方式。

四、优化特许权管理，把疫苗安全机制纳入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安排

疫苗作为准公共产品，实行政府对生产厂家的特许经营权管理是可选择的基本供给模式。现代社会中，其治理机制有趋于复杂多元的特征，而一旦出现疫苗安全问题，就可能是震动全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不容有一丝一毫的疏忽。特许权管理的逻辑

^① 欧纯智：《我国基层征纳寻租交易构成的机理分析》，《财政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14～17 页。

^② 欧纯智、贾康：《公共利益视角下关于行政审批存废的认知框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 年第 4 期，第 25～32 页。

辑是清晰的：以适当的竞争性机制选择企业定位为供应主体，再施之以严密细致的全流程监督约束和全面绩效评估奖励制度。具体的制度细节，还必须做出不断的探索才能最后形成较成熟的方案。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的“问题导向”，从“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把市场与政府两方的作用机制结合好”着眼，^① 在此特提出如下关于疫苗供应机制的制度优化和政策保障建议：

第一，在疫苗安全问题上，积极借鉴相关的国际立法经验。日本早在 1948 年，就制定了《疫苗接种法》。相关费用方面：定期接种（相当于我国的一类疫苗）是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任意接种（相当于我国的二类疫苗）是个人负担，但可用于医疗保险。引人注目的是，里面具体规定了一旦接种出现问题的高赔偿额。若因接种出现一例死亡，当时就要由供应方给付 4250 万日元（折合约 200 多万元人民币），而且此后每年还要再给家属一笔钱。1986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NCVIA）规定：成立疫苗不良反应监测系统（VAERS）；成立国家疫苗项目办公室（NVPO）；要求接种点向接种者提供“疫苗信息陈述书（VIS）”。这些法定制度，从收集疫苗不良反应，到每个疫苗的风险和益处，再到由于接种疫苗而引起的伤害如何补偿等，都进行了全面的规范与管理。这些制度以及机构，构建了疫苗安全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确立了从疫苗的生产到流通，再到安全监测，以及出现伤害后的高额赔偿等，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国的相关法律建设应借鉴国际经验抓紧进行，尽快推出《疫苗安全法》，把防范疫苗安全问题纳入“全面依法治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制度安排。

第二，通过竞争性政府采购制度流程，形成疫苗生产厂商和供应商的遴选机制，由国家医药监督管理部门对中标的供给主体实施全面的、全流程的监督，全国有关部门对疫苗实施类似于“准专卖制度”的价格、利润率和供应链上各环节的特许经营权管理（包括应急储备、过期销毁等具体事项）。

第三，明确规定与疫苗安全事故有关的各方面责任主体的罚则与奖则，形成对厂商、供应商、监管部门一切相关责任人的严格、有力度的问责威慑与尽责奖励。出现严重问题者，不仅实施经济上的重罚，而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防伪技术等有效手段，大力提升社会公众特别是接种人、接种儿童家长的知情水平，对发现疫苗安全问题隐患并及时向政府管理部门举报者，给予有力度的物质奖励。

疫苗安全问题是在我国经过高速度“黄金发展期”而伴随“矛盾凸显期”对于社会生活形成特别冲击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其他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大都曾经遭遇过的问

^① 贾康：《发挥 PPP 模式在改革创新中的正面效应》，《地方财政研究》2014 年第 9 期，第 4～6 页。

题，当下中国的相关管理部门应积极引导全社会正视和理性讨论在冲击之下的相关应对思路与要领，政府需按应急处理机制安排好必要举措并推进到长远的制度建设与完善，社会各方应痛定思痛，协力亡羊补牢，在深化改革促进开放和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① 共同应对好这一现实挑战，有效提高我国的疫苗安全水平。

参考文献：

1. [美] 戈登·塔洛克：《公共选择——戈登·塔洛克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2. 贾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领》，《中国金融》2016 年第 1 期。
3. 欧纯智：《我国基层征纳寻租交易构成的机理分析》，《财政研究》2014 年第 6 期。
4. 欧纯智、贾康：《公共利益视角下关于行政审批存废的认知框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 年第 4 期。
5. 贾康：《发挥 PPP 模式在改革创新中的正面效应》，《地方财政研究》2014 年第 9 期。
6. 贾康：《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求是学刊》2016 年第 6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上接第 111 页)

参考文献：

1. 张艳玲：《北京奥运整体投入 2950 亿元含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人民网，2008 年 8 月 5 日。
2. 陶于：《奥运经济问题研究》，《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
3. 王子朴、原玉杰、靳英华：《奥运经济周期与体育经济政策调整的关系研究》，《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7 年第 6 期。
4. 侯宇鹏、鞠晓峰、段志刚：《基于 CGE 模型方法的大型体育活动对经济的影响研究》，《中国软科学》2008 年第 6 期。
5. Andrew K. Rose, Mark M. Spiegel. THE OLYMPIC EFFECT, Working Paper 14854, [http: //www. nber. org/papers/w14854](http://www.nber.org/papers/w14854).
6. The Economics of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January 19, 2018. [https: //www. cfr. org/backgrounders/economics-hosting-olympic-games](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s/economics-hosting-olympic-games).
7. Laurent • Vanat, 2017 International Report on snow & mountain tourism——overview of the key industry figures for ski resorts. 9th edition – April 2017.

责任编辑：沈家文

^①贾康：《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求是学刊》2016 年第 6 期，第 41～52 页。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8 年 7 月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和专家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IMF 维持 2018、2019 年全球增长预期，但提醒风险增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7 月 16 日发布更新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18、2019 年的全球增长率约为 3.9%，与 2018 年 4 月的预测值一样。不过，报告提醒称，影响经济增长的风险已经增大。目前，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不一，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增速已经减缓，而美国的经济增速仍高于潜在水平，新增就业依然稳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减少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的措施。然而，IMF 认为，随着已经持续很长时间的周期性复苏接近尾声，临时性财政刺激效应逐渐减退，今后几年美国经济增长预计也将减速。对于发达经济体，IMF 预计 2018 年增长率为 2.4%，比 4 月的预测低 0.1 个百分点，2019 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仍为 2.2%。

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IMF 预计 2018 年增长率为 4.9%，2019 年增长率为 5.1%，但对具体国家的预测也有不同。IMF 保持了原先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调低了拉丁美洲、新兴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大型经济体的增长预测。供给受阻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推升了石油价格，使俄罗斯和中东产油国等石油出口国受益，但给印度等石油进口国带来不利影响。对于新兴市场整体而言，正负面影响基本相互抵消。

IMF 警告说，当前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从而对信心，资产价格和投资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是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重大威胁。由于美国需求增长相对较快，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将进一步扩大，这可能加剧摩擦。美国发动的关税贸易保护行动，已经激发来

自中国、欧盟、加拿大、日本等贸易对象的报复措施或报复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型分析显示，如果当前的贸易政策威胁变为现实，商业信心由此下降，到 2020 年全球产出可能比当前的预测低 0.5%。在更为广泛的贸易摩擦下，美国将招致更多的贸易报复行为，有相对较大一部分出口将在全球市场上被征税，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影响。

此外，IMF 表示，欧洲的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在移民政策、财政治理、法治标准和欧元区制度架构等方面，欧盟面临着政治挑战。经过数月的谈判，英国退出欧盟的条件仍未确定。拉丁美洲今后几个月的政权过渡将增加不确定性。尽管一些地缘政治危险似乎正在消退，但在很多情况下，其根本驱动因素仍在起作用。

IMF 认为，各国应采取措施应对挑战。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行动，通过改革提高增长潜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同时重建财政缓冲机制，谨慎实施货币政策，使通胀预期有效地锚定在目标水平。各国政府还必须更加关注公民之间的经济公平，特别是保护贫穷人口。在应对挑战时，各国必须抵制内向型思维，并认识到在各种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多边合作至关重要。在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减轻全球过度失衡、金融稳定政策、国际税收政策、网络和其他恐怖主义威胁、疾病控制以及全球变暖等共同问题上，无法靠一国行动解决问题。报告指出，在很多国家，腐败现象削弱了对政府的信任，控制腐败也需要全球行动。最后，国际移民压力再度加剧，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二）世贸组织：新增贸易壁垒或危害全球经济复苏

世界贸易组织（WTO）2018 年 7 月 4 日在半年度报告中认为，主要经济体建立起的贸易壁垒可能危害全球经济复苏，而且其影响已经开始显现。WTO 是在有关二十国集团（G20）贸易限制的报告中做出上述表示的。该组织分析发现，G20 国家在 2017 年 10 月中旬至 2018 年 5 月中旬期间推出了 39 项新贸易限制举措，数量是前一时期的两倍，涉及的商品包括铁矿石、钢铁、塑料和汽车。新的限制政策将影响 741 亿美元的贸易，比一年前高一倍半。与此同时，包括降低关税在内的放宽政策共计 47 个，影响 827 亿美元的贸易，仅为一年前的 50%。

报告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终于开始产生持续性经济成长动力，但贸易限制行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把经济复苏置于危险境地。G20 国家必须竭尽所能防止形势恶化并促进贸易复苏。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旨在解决此类问题，但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却对该体系本身构成威胁，G20 经济体需要竭尽所能来缓和局势。如果主要经济体继续加快出台限制进口的新举措，那么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威胁将越来越大。

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不断升级的局势给各国经济增长和复苏都带来严重威胁，我们已开始看到一些前瞻性指标对此有所反映”“G20 国家采取的

新贸易限制举措明显增多，这应引起国际社会真正的关注”。他还称，在评估期结束后的几周内有更多限制措施出台，所以国际贸易关系的恶化情况可能比报告呈现的更为严重。这将影响全球经济的前景，他呼吁 G20 领导人以更为克制的方式对待相关事宜，来缓和局势。

WTO 的报告并未点名某个具体国家，但自年初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祭出一系列关税措施，对他所谓的盟国和经济竞争对手的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惩罚。

（三）IMF 警告美国财政刺激或加剧通胀和全球市场波动

IMF 于 2018 年 7 月 3 日警告称，美国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刺激政策可能会带来美国通胀意外上升风险，为此美联储可能需要更快加息，而美国利率水平更快上升将会加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IMF 在当天公布的与美国第四条款磋商（IMF 经济学家每年对成员国经济表现和宏观政策的例行判断与评估）报告中表示，在当前经济周期阶段，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可能会引发美国通胀快于预期上升，随之可能带来美国利率水平更快上升，并加大美国和海外金融市场波动。一些宏观经济基本面较弱的新兴市场将面临国际资本流动逆转风险。

IMF 警告称，美国财政刺激政策还会造成美国公共债务状况进一步恶化，令基础设施投资等更紧迫的供给侧改革缺乏财政资金，造成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扩大。IMF 执董们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短期内会提高美国和全球经济产出，但中期内会影响美国债务可持续性，并加剧全球经济失衡。考虑到美国财政刺激规模庞大，执董们认为美联储可能需要更快加息。他们指出，如果美国通胀意外上升风险成为现实，将会造成金融市场波动，并给全球带来负面影响。

执董们表示严重担忧，美国近期的贸易政策可能造成对美国外部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引发其他经济体报复措施，并削弱开放、公平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执董们敦促美国决策当局与其他贸易伙伴通过建设性合作来减少贸易壁垒和解决贸易与投资分歧，而不应诉诸有害的单边措施。

（四）OECD：全球主要农产品价格未来 10 年将保持低位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编制的《2018—2027 年农业展望》年度报告，全球大多数农产品生产将稳步增长，大部分谷物、肉类、乳制品和鱼类产量在 2017 年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其中谷物库存水平已升至历史最高水平。报告指出，全球农产品和粮食需求增长将出现疲软，但同时预计该部门的生产力将持续提高。

因此，预计未来 10 年主要农产品价格将保持低位。

报告指出，全球粮食需求放缓主要原因是：主要新兴经济体需求增长减速；人均主食消耗量趋于饱和；全球人口增长率进一步下降。报告认为，农业贸易在促进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全球粮食贸易需要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未来 10 年全球农业和渔业产量预计将增长约 20%，但各区域之间将有较大差异。预计人口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区域，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东亚以及中东和北非等将出现强劲增长。相比之下，西欧等发达国家区域的产量增长预计会低得多。

报告预测，受人口增长下滑、人均主食消费持平以及肉类产品需求增长放缓影响，全球需求疲软状况将在未来 10 年持续。肉类产品需求增长下滑将抑制动物饲料中谷物和蛋白粉的需求。随着消费和生产增长放缓，预计全球农业和渔业贸易增长率将为前 10 年的 50%。其中，土地广袤的国家和区域粮食净出口预计将增加。在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尤其是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国家及地区，其净进口将会增加。

报告预计，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谷物和植物油需求在预测期内基本保持不变。在过去 10 年里，生物燃料扩张带来了超过 1.2 亿吨玉米等谷物需求的增长。由于发达国家现有政策不太可能支持生物燃料扩张，大多数需求增长将来自鼓励使用生物燃料的发展中国家。预计，用于生物燃料生产的甘蔗需求增长将尤为突出。

（五）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加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粮农组织（粮农组织）2018 年 7 月 9 日发布报告指出，未来 10 年全球渔业产量将显著增长，但行业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亟需加强可持续发展，减少污染和浪费。据当日发布的《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预计，到 2030 年，源于捕捞和水产养殖的鱼类总产量将较目前水平增长近 18%，达到 2.01 亿吨。今后要实现产量的增长，需要在加强渔业管理体制，减少损失和浪费，解决诸如非法捕捞、水体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方面取得不断进展。“要达到粮农组织设立的让世界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目标，渔业非常关键。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扶贫济困方面，渔业的贡献与日俱增”，粮农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在谈到渔业发展时说。但他同时表示：“渔业正面临着各种挑战，包括需要减少某些鱼类的捕捞，以避免影响生物可持续发展。”

报告呼吁，在可持续渔业领域，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开展有效合作，特别是在政策协调、财政和人力资源调动以及先进技术运用方面。同时，需要制定相应战略帮助渔业部门适应气候变化、加强防范、减少海洋中的废弃物等，升级回收计划，实现循环经济。

（六）G20 警告贸易战可能严重损害全球经济增长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自 2018 年 7 月 21 日起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议就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等话题进行讨论。此次会议的所有参与方都意识到，贸易战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风险。欧盟、新兴市场国家的财长，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警告称，美国引发的贸易战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

与会各方一致警告，关税战导致“金融脆弱性上升，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全球经济增长失衡，不平等加剧”。公报草案显示，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风险已经升温，全球经济增长更不同步，同时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急剧升温使得新兴市场正面临市场急剧动荡和资本外流风险，市场波动风险也较大。法国财长勒梅尔表示，贸易战已经开始。如果美方不撤销钢铝关税，将难以想象欧盟会与美国谈判贸易协议。如果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国家实施更多关税，除了再次采取报复性行动之外别无选择。在欧洲国家讨论全球贸易的各个方面之前，美国必须“回归理性”并取消对钢铁和铝进口的关税。贸易摩擦可能会影响到政治，呼吁美国重拾理性，尊重全球规则，尊重自己的盟友，期待美国采取必要步骤，退出危机。勒梅尔希望解决 WTO 所存在的问题，认为问题不会因为诉诸关税就得到化解。

此次会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受美元升值等影响，阿根廷本国货币自 2018 年 4 月底出现大幅波动，累计贬值超过 40%。为稳定汇率，阿根廷央行大量抛售美元造成外汇储备大幅缩减。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向 IMF 寻求贷款援助，显示出新兴经济体在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和全球贸易局势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所遭受的威胁。阿根廷与 IMF 签订了三年 500 亿美元的贷款协议，目前阿根廷汇率市场已经逐渐稳定。然而，新兴经济体并未摆脱美元升值和贸易摩擦升级的影响。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认为，中国经济仍旧保持强韧发展态势，预计 2018 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 6.5%，比 1 月份的预测值上调 0.1 个百分点。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也纷纷对中国经济继续看好。比如，摩根大通就预计 2018 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望达到 6.7%，高于市场普遍认为的 6.5%。

为何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乐观？

一是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的基本格局尚未发生根本变化。过去 12 个月，全球经济活动基本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是中国将从开放市场中获益，外国企业也会继续从中国市场获得新机遇。

三是中国银行业去杠杆有序推进。德意志银行研究团队的实地调研发现，与市场认知相反，各金融机构对4月底颁布的资管新规应对稳妥，压缩影子银行对商业银行经营影响可控。与此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明显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发行过债券的国有企业潜在违约率降至2017年的1.5%，而中国商业银行在过去累计确认的不良贷款占目前贷款余额的6.4%，因此未来大幅确认不良贷款的可能性非常低。此外，去杠杆促进空转资金减少以及金融机构“脱虚向实”。

四是中国债务问题趋于稳定。日前，在国际金融协会主办的中国金融峰会上，评级公司穆迪副总裁马丁·佩奇表示，可以看到，中国债务发展轨道还是比较平稳的。中国家庭债务虽然增加很多，但是整体规模不大。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央企，债务有所减少。在去产能的情况下，整个债务问题有所缓解。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初期，债务有可能增加，但是生产力也在不断提高，经济重心的转移会对债务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

五是预计监管机构将推出更多逆周期调控措施。虽然国际金融机构并不认为中国监管当局会大幅放松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但他们认为，若下行风险开始显现，监管层可能会推出逆周期的调控政策来加以对冲。

当然，国际机构也提醒了需要警惕的问题。比如，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步伐和策略需保持平稳谨慎；在汇率上，要防止货币出现大规模贬值从而带动市场贬值预期重新出现；在贸易战方面，要尽力避免最差的情形，防止贸易战规模不断升级，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二）国际组织官员：改革开放40年中国减贫成就巨大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共有8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的扶贫经验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成就令世界瞩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6853万人，贫困县数量首次实现净减少；贫困发生率降至3.1%，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中国不仅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还注重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社会保障扶贫，促进贫困地区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这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愿景一致。中国的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多重经验。

世界粮食计划署战略协调与支持部高级主任斯坦莱克·萨姆坎戈：中国走在了世界减贫事业的前列，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世界粮食计划署愿意和国际农发基金、粮农组织

一起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与中国开展长期有效的合作，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早日实现。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本·滨瀚：过去 40 年，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不断创新减贫伙伴关系，与其他国家相互分享与借鉴减贫知识和经验，对全球减贫具有启迪意义。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和朝鲜代表马文森：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贫困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是不可能实现整个脱贫目标的。2030 年之后，需要考虑如何保持脱贫以后的发展状态。中国对此有更长远的规划，不止步于实现脱贫目标，而是向更美好的生活迈进。

（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为保护知识产权付出巨大努力

2018 年 7 月 10 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在纽约联合发布《2018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位居全球创新排名第 17，首次进入前 20 名。中国较 2017 年上升 5 名，超过了加拿大、挪威和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取得第 17 名的成绩，反映出中国政府优先研发和创新发展的政策取得效果，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变化的经济体，在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Francis Gurry）表示，中国排名的快速上升反映出中国领导层设置的战略方向，即发展世界级的创新能力，同时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基础转向依赖创新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以此保持竞争优势。中国取得的进展对实现多极化创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为保护知识产权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目前成为了知识产权的生产者，这是中国在国内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在 1984 年通过了专利法，之后不到 40 年时间里，中国的知识产权申报有了显著增长”。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际专利申请来源国，国际品牌和文化产品的数量也日益增长，“这无疑是一段令人瞩目的历程”“作为一个体量巨大的经济体，中国已经有能力建立起世界一流的知识产权系统”。中国不仅有若干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包括商标、设计等在内的有关知识产权的事务，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还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专门审理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经同中国的这些部门开展了广泛合作。谈及近期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方面的指责，高锐表示，围绕知识产权的纠纷应当依据确凿证据，认真进行分析研判，并按照相关程序进行仲裁。历史上围绕专利权的纠纷并不鲜见，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19 世纪的美国，都曾面临过这类问题。“可以说，每当有国家在技术领域高速发展，这种纠纷就会出现。”

在技术创新领域，欧洲曾经占据统治地位，之后美国、日本、韩国相继崛起，现在

中国也加入进来，“创新领域的确存在激烈的竞争，我们应当正视这一现实”。高锐表示，作为一个新的技术创新力量，中国推动了多极化创新格局的发展。

（四）摩根大通：贸易战短期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中国股票策略主管朱海斌日前在京表示，美国开始对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引发了市场的担忧，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暂时没有很大影响。朱海斌说，从2018年来看，关税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影响不是很大。估计25%关税对于中国2018年下半年GDP的直接影响在0.1个百分点，加上间接影响，总体影响大概在0.2个百分点左右，所以并不是特别大的冲击，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很大。

摩根大通一直强调，在贸易战方面，除了要注意关税动向外，还需要注意非关税部分的发展，主要是美国对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相关方面的限制。美国财政部原计划在2018年6月30日前针对201条款就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问题出台一些限制措施，现时间点已经延后。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的改革提案估计到2018年秋天左右才能完成。这个提案加强对所有国家在美国投资的审查，尤其涉及一些敏感的技术行业或新兴技术领域的行业。朱海斌认为，这一动向值得关注，尤其涉及中国与美国在未来技术交往、合作、并购各方面的活动。

（五）中欧商会：中国改革多领域取得进展

中国欧盟商会日前在京发布年度报告《后达沃斯时代的中国——改革势在必行》。2017年达沃斯年会后至今，中国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果，市场准入壁垒也有所改善。加强环境监管执法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变。报告称，大气污染防治显现实效。

报告高度评价中国减免消费品关税的行为。中国政府更好地响应消费者的各类需要及其需求的快速变化，表明了其对国内中产阶级消费者的高度重视。中国正竭力发展更具创新力的经济体，并努力营造能够催生新的、富有创造性的商品与服务的环境。中国欧盟商会报告指出，中国对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来华工作外国人分为A、B、C三类，具有创新技能和研发经验的外国人更容易获评A类。这有助于中国研发领域吸引并留住最合适的人才。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估计值	2018 年 预测值	2019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7 月)				
世 界	3.2	3.7	3.9	3.9
发达国家	1.7	2.4	2.4	2.2
美 国	1.5	2.3	2.9	2.7
欧元区	1.8	2.4	2.2	1.9
日 本	1.0	1.7	1.0	0.9
发展中国家	4.4	4.7	4.9	5.1
印 度	7.1	6.7	7.3	7.5
俄罗斯	-0.2	1.5	1.7	1.5
巴 西	-3.5	1.0	1.8	2.5
世界银行(WB,2018 年 6 月)				
世 界	2.4	3.0	3.1	3.0
发达国家	1.7	2.3	2.2	2.0
发展中国家	3.7	4.3	4.5	4.7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8 年 8 月)				
世 界	2.5	3.2	3.3	3.1
美 国	1.6	2.2	2.9	2.6
欧元区	1.8	2.5	2.1	1.8
日 本	1.0	1.7	1.1	1.2
印 度	7.1	6.7	7.3	7.5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3)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估计值	2018 年 预测值	2019 年 预测值
世 界	2.2	5.1	4.8	4.5
发达国家	2.2	4.2	4.3	4.0
发展中国家	2.2	6.7	5.7	5.4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8 年 7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估计值	2018 年 预测值	2019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7 月)				
世界	2.8	3.1	3.5	3.4
发达国家	0.8	1.7	2.2	2.2
发展中国家	4.3	4.0	4.4	4.4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18 年 8 月)				
世 界	2.5	2.5	2.9	2.7
美 国	1.3	2.1	2.5	2.2
欧元区	0.2	1.5	1.7	1.6
日 本	-0.1	0.5	0.9	1.1
印 度	4.5	3.6	4.9	4.8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7 年		2.2	1.6	3.4
	7 月	2.1	1.4	3.1
	8 月	2.3	1.4	3.3
	9 月	2.3	1.5	3.4
	10 月	2.3	1.5	3.5
	11 月	2.4	1.6	3.3
	12 月	2.3	1.6	3.3
2018 年	1 月	2.4	1.6	3.4
	2 月	2.3	1.4	3.3
	3 月	2.4	1.4	2.9
	4 月	2.2	1.6	2.8
	5 月	2.1	1.9	2.9
	6 月	2.4	2.1	3.1
	7 月	2.4	2.1	3.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7 年		3.7	3.1	5.2			
	7 月	3.8	3.1	5.4	52.7	53.1	53.6
	8 月	4.4	3.2	5.6	53.1	53.7	54.2
	9 月	4.4	3.0	5.7	53.2	53.9	53.7
	10 月	3.8	3.2	5.1	53.4	53.7	54.1
	11 月	5.0	3.4	5.5	54.0	54.9	55.1
	12 月	4.3	3.7	5.6	54.5	55.5	55.8
2018 年							
	1 月	5.0	2.7	6.6	54.4	55.6	55.4
	2 月	5.0	3.2	6.5	54.1	54.8	55.0
	3 月	4.3	3.4	5.4	53.3	53.4	53.7
	4 月	4.3	2.7	6.3	53.5	53.9	53.8
	5 月	3.7	2.8	5.4	53.1	53.4	53.4
	6 月	4.3	2.7	5.3	53.0	53.2	52.9
	7 月				52.7	53.0	52.5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6 年		1.6	2.7	1.4
	3 季度	1.9	2.7	1.0
	4 季度	1.8	2.6	0.2
2017 年		2.2	2.5	-0.1
	1 季度	1.8	1.8	-0.8
	2 季度	3.0	2.9	0.0
	3 季度	2.8	2.2	-1.0
2018 年	4 季度	2.3	3.9	2.4
	1 季度	2.2	0.5	1.5
	2 季度	4.2	3.8	2.3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7	-0.1	1.9
	3 季度	3.2	6.1	4.9
	4 季度	1.7	-3.6	6.2
2017 年		4.8	3.0	4.6
	1 季度	9.9	5.0	4.8
	2 季度	4.3	3.6	2.5
	3 季度	2.6	3.5	2.8
2018 年	4 季度	6.2	6.6	11.8
	1 季度	8.0	3.6	3.0
	2 季度	6.2	9.1	-0.4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6 年		1.6	2.7	1.4
	3 季度	1.5	2.7	1.1
	4 季度	1.9	2.8	0.9
2017 年		2.2	2.5	-0.1
	1 季度	1.9	2.6	-0.1
	2 季度	2.1	2.5	0.1
	3 季度	2.3	2.4	-0.4
2018 年	4 季度	2.5	2.7	0.1
	1 季度	2.6	2.4	0.7
	2 季度	2.9	2.6	1.3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7	−0.1	1.9
	3 季度	1.5	1.2	1.4
	4 季度	2.4	0.8	3.1
2017 年		4.8	3.0	4.6
	1 季度	4.3	2.6	4.1
	2 季度	4.7	2.7	4.6
	3 季度	4.6	2.1	4.1
	4 季度	5.7	4.7	5.4
2018 年	1 季度	5.2	4.3	5.0
	2 季度	5.7	5.7	4.2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7 年			1.2	4.4	218.8
	7 月			4.3	19.0
	8 月			4.4	22.1
	9 月	2.3	1.4	4.2	1.4
	10 月			4.1	27.1
2018 年	11 月			4.1	21.6
	12 月	−0.3	1.0	4.1	17.5
	1 月			4.1	17.6
	2 月			4.1	32.4
	3 月	0.3	1.0	4.1	15.5
	4 月			3.9	17.5
	5 月			3.8	26.8
	6 月	2.9	1.3	4.0	24.8
	7 月			3.9	15.7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2017 年	24501		3.0	33087		4.6	−8587
6 月	1948	1.0	5.7	2396	0.4	5.1	−448
7 月	1952	0.2	4.8	2394	−0.1	5.3	−442
8 月	1956	0.2	4.0	2398	0.2	4.4	−442
9 月	1984	1.4	5.0	2428	1.3	6.5	−444
10 月	1986	0.1	6.3	2456	1.2	7.1	−470
11 月	2023	1.8	9.1	2512	2.3	8.5	−490
12 月	2050	1.3	7.8	2569	2.2	9.7	−519
2018 年							
1 月	2025	−1.2	5.8	2554	−0.6	7.2	−529
2 月	2061	1.8	7.1	2616	2.4	10.6	−555
3 月	2107	2.2	9.4	2579	−1.4	9.1	−472
4 月	2112	0.3	9.9	2573	−0.2	8.0	−461
5 月	2153	1.9	11.7	2585	0.5	8.4	−432
6 月	2138	−0.7	9.8	2602	0.6	8.6	−463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4718	2893	1825
	2 季度	1617	872	745
	3 季度	1094	852	242
	4 季度	541	406	135
2017 年		2773	3004	−231
	1 季度	897	1263	−366
	2 季度	856	431	425
	3 季度	646	703	−57
2018 年	4 季度	374	608	−234
	1 季度	513	−1493	2006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6 年		1.8	2.0	1.8
	3 季度	0.4	0.4	0.2
	4 季度	0.8	0.6	0.3
2017 年		2.4	1.6	1.1
	1 季度	0.6	0.4	0.1
	2 季度	0.7	0.5	0.5
	3 季度	0.7	0.4	0.5
	4 季度	0.7	0.2	0.3
2018 年				
	1 季度	0.4	0.5	0.1
	2 季度	0.4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3.7	3.0	4.0
	2 季度	1.1	1.2	1.3
	3 季度	0.9	0.3	0.7
	4 季度	1.2	1.5	1.5
2017 年		2.7	5.2	4.0
	1 季度	-0.5	1.6	0.6
	2 季度	2.0	1.1	1.5
	3 季度	-0.1	1.5	0.5
	4 季度	1.4	2.4	1.4
2018 年				
	1 季度	0.3	-0.9	-0.3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7 年			0.8	241.1	9.1
	6 月	0.3	0.3	63.0	9.0
	7 月				9.0
	8 月				9.0
	9 月	0.3	0.9	59.9	8.9
	10 月				8.8
	11 月				8.7
	12 月	0.4	0.9	41.2	8.7
2018 年					
	1 月				8.7
	2 月				8.6
	3 月	0.0	0.7	58.7	8.5
	4 月				8.4
	5 月				8.3
	6 月				8.3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6 年		1.8	2.0	1.8
	3 季度	1.7	1.8	1.7
	4 季度	2.0	1.9	1.6
2017 年		2.4	1.6	1.1
	1 季度	2.0	1.6	0.9
	2 季度	2.5	1.8	1.1
	3 季度	2.8	1.9	1.4
	4 季度	2.8	1.4	1.3
2018 年				
	1 季度	2.5	1.6	1.3
	2 季度	2.2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3.7	3.0	4.0
	2 季度	-0.2	2.9	2.5
	3 季度	5.3	3.0	4.7
	4 季度	3.8	3.6	4.2
2017 年		2.7	5.2	4.0
	1 季度	2.8	4.8	4.2
	2 季度	3.7	4.7	4.4
	3 季度	2.6	5.9	4.2
	4 季度	2.8	6.7	4.1
2018 年				
	1 季度	3.6	4.1	3.1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环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出口额
月份	出口额	增长	增长	进口额	增长	增长	减进
		(%)	(%)		(%)	(%)	口额
2017 年	21949		7.1	19623		10.0	2327
6 月	1802	-2.5	4.2	1595	-3.8	6.9	207
7 月	1785	-1.0	5.8	1616	1.3	9.2	169
8 月	1834	2.8	7.0	1629	0.8	9.3	205
9 月	1850	0.9	5.2	1613	-1.0	5.6	236
10 月	1811	-2.1	9.1	1635	1.3	10.8	176
11 月	1887	4.2	8.4	1685	3.1	9.3	202
12 月	1919	1.7	0.9	1693	0.4	3.0	227
2018 年							
1 月	1903	-0.9	9.1	1709	1.0	6.2	194
2 月	1839	-3.3	1.8	1658	-3.0	1.7	181
3 月	1865	1.4	-3.2	1669	0.7	-2.0	196
4 月	1874	0.5	8.2	1697	1.7	8.5	177
5 月	1878	0.2	-0.9	1709	0.7	0.6	169
6 月	1908	1.6	5.7	1740	1.8	8.5	167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520	960	- 440
	6 月	32	- 250	282
	7 月	- 1627	- 1645	19
	8 月	118	- 26	144
	9 月	45	140	- 95
	10 月	339	617	- 278
	11 月	- 7	0	- 8
	12 月	- 350	- 254	- 96
2018 年	1 月	14	426	- 412
	2 月	9	336	- 327
	3 月	- 411	189	- 600
	4 月	- 130	204	- 333
	5 月	271	92	178
	6 月	85	- 396	482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6 年		1.0	0.1	1.3
	3 季度	0.3	0.4	0.5
	4 季度	0.2	0.0	- 0.2
2017 年		1.7	1.0	0.4
	1 季度	0.7	0.5	0.3
	2 季度	0.5	0.8	0.4
	3 季度	0.6	- 0.7	0.1
	4 季度	0.2	0.3	0.1
2018 年	1 季度	- 0.2	- 0.2	0.0
	2 季度	0.5	0.7	0.2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1	1.7	- 1.6
	3 季度	0.1	2.3	- 0.1
	4 季度	0.7	2.6	1.0
2017 年		2.5	6.7	3.4
	1 季度	0.4	1.9	1.4
	2 季度	1.7	0.2	1.9
	3 季度	0.0	2.1	- 1.5
	4 季度	0.0	2.1	3.3
2018 年	1 季度	- 0.1	0.6	0.2
	2 季度	0.5	0.2	1.0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6 年		1.0	0.1	1.3
	3 季度	1.0	- 0.1	1.3
	4 季度	1.6	0.6	0.2
2017 年		1.7	1.0	0.4
	1 季度	1.5	0.8	- 0.6
	2 季度	1.6	1.8	0.9
	3 季度	2.0	0.6	0.6
	4 季度	2.0	1.0	0.8
2018 年	1 季度	1.0	0.1	0.5
	2 季度	1.0	0.2	0.4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1	1.7	- 1.6
	3 季度	1.1	1.3	- 3.1
	4 季度	1.9	5.4	- 1.2
2017 年		2.5	6.7	3.4
	1 季度	2.0	6.6	1.5
	2 季度	3.3	6.8	4.3
	3 季度	2.8	6.9	2.7
	4 季度	2.0	6.5	5.3
2018 年	1 季度	1.5	5.1	3.9
	2 季度	0.6	4.9	3.0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7 年		3.3	2.24	2.8
	6 月	3.6	2.24	2.8
	7 月	3.7	2.26	2.8
	8 月	4.8	2.22	2.8
	9 月	1.1	2.27	2.8
	10 月	3.4	2.35	2.8
	11 月	1.5	2.34	2.7
	12 月	2.2	2.38	2.7
2018 年	1 月	1.0	2.34	2.4
	2 月	1.8	2.30	2.5
	3 月	1.3	2.41	2.5
	4 月	2.1	2.37	2.5
	5 月	1.3	2.34	2.2
	6 月	- 2.2	2.47	2.4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	(%)		(%)	(%)	
2017 年	782865		11. 8	753792		14. 1	29073
7 月	65202	3. 0	13. 4	62014	- 1. 0	16. 5	3188
8 月	66092	1. 4	18. 1	62031	0. 0	15. 5	4061
9 月	65652	- 0. 7	14. 1	63360	2. 1	12. 3	2292
10 月	67176	2. 3	14. 0	63326	- 0. 1	19. 0	3850
11 月	68325	1. 7	16. 2	64937	2. 5	17. 3	3388
12 月	68775	0. 7	9. 4	68272	5. 1	15. 0	503
2018 年							
1 月	68026	- 1. 1	12. 3	63209	- 7. 4	7. 8	4817
2 月	67599	- 0. 6	1. 8	69752	10. 4	16. 6	- 2153
3 月	65619	- 2. 9	2. 1	65167	- 6. 6	- 0. 5	452
4 月	68477	4. 4	7. 8	64162	- 1. 5	6. 0	4315
5 月	67979	- 0. 7	8. 1	70777	10. 3	14. 0	- 2798
6 月	67883	- 0. 1	6. 7	67052	- 5. 3	2. 5	831
7 月	68573	1. 0	3. 9	69029	2. 9	14. 6	- 456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21179	189450	- 168271
	6 月	661	15475	- 14814
	7 月	642	12695	- 12053
	8 月	2354	8472	- 6118
	9 月	- 1109	15365	- 16474
	10 月	1828	9869	- 8041
	11 月	1961	8487	- 6526
	12 月	4847	27409	- 22562
2018 年				
	1 月	- 2164	17179	- 19343
	2 月	1485	10285	- 8800
	3 月	5233	13257	- 8024
	4 月	- 1011	12636	- 13647
	5 月	7835	13486	- 5651
	6 月	2567	18900	- 16333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6 年		1. 4	1. 8	0. 3	- 3. 6	7. 1	- 0. 2
	3 季度	1. 5	1. 7	0. 9	- 2. 7	7. 6	- 0. 2
	4 季度	2. 0	1. 7	1. 0	- 2. 5	6. 8	0. 4
2017 年		3. 1	1. 7	1. 3	1. 0	6. 3	1. 6
	1 季度	2. 3	1. 8	1. 1	0. 0	6. 1	0. 6
	2 季度	3. 8	1. 8	1. 4	0. 4	5. 6	2. 5
	3 季度	3. 1	1. 7	1. 3	1. 4	6. 3	2. 2
	4 季度	3. 0	1. 3	1. 5	2. 1	7. 0	0. 9
2018 年							
	1 季度	2. 3	1. 2	0. 8	1. 2	7. 7	1. 3
	2 季度		1. 3				1. 8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6 年		2. 8	2. 3	2. 0	1. 5	4. 2	5. 0
	3 季度	2. 6	2. 0	2. 2	2. 0	4. 3	5. 0
	4 季度	2. 6	3. 3	3. 4	2. 8	4. 5	4. 9
2017 年		3. 1	2. 1	3. 8	2. 9	5. 9	5. 1
	1 季度	2. 9	3. 3	4. 4	2. 6	5. 6	5. 0
	2 季度	2. 7	1. 8	3. 9	2. 3	5. 8	5. 0
	3 季度	3. 8	1. 6	3. 6	3. 2	6. 2	5. 1
	4 季度	2. 8	1. 5	3. 4	3. 4	5. 9	5. 2
2018 年							
	1 季度	2. 8	1. 4	4. 6	3. 0	5. 4	5. 1
	2 季度	2. 9	2. 6	3. 5	3. 3	4. 5	5. 3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7 年		6. 4	4. 5	12. 8	5. 2	27. 5
	7 月	6. 3	4. 3	12. 8	5. 1	
	8 月	6. 2	4. 3	12. 6	4. 9	
	9 月	6. 2	4. 3	12. 4	5. 0	27. 7
	10 月	6. 3	4. 3	12. 2	5. 1	
	11 月	5. 9	4. 3	12. 0	5. 1	
	12 月	5. 8	4. 4	11. 8	5. 1	26. 7
2018 年						
	1 月	5. 9	4. 3	12. 2	5. 2	
	2 月	5. 8	4. 2	12. 6	5. 0	
	3 月	5. 8	4. 2	13. 1	5. 0	26. 7
	4 月	5. 8	4. 2	12. 9	4. 9	
	5 月	5. 8	4. 2	12. 7	4. 7	
	6 月	6. 0	4. 0	12. 4	4. 7	27. 2
	7 月	5. 8			4. 7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2017 年		3. 7	3. 4	3. 1	3. 8
	7 月	3. 6	3. 4	3. 1	3. 8
	8 月	3. 8	3. 5	3. 1	3. 8
	9 月	3. 7	3. 6	3. 1	3. 7
	10 月	3. 6	3. 5	3. 0	3. 7
	11 月	3. 7	3. 4	3. 0	3. 7
	12 月	3. 7	3. 1	2. 9	3. 7
2018 年					
	1 月	3. 6	3. 4	2. 9	3. 7
	2 月	3. 6	3. 2	2. 9	3. 7
	3 月	4. 0	2. 9	2. 9	3. 7
	4 月	3. 8	3. 4	2. 8	3. 7
	5 月	4. 0	3. 2	2. 8	3. 7
	6 月	3. 7	3. 4	2. 8	3. 7
	7 月	3. 8		2. 8	3. 7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4212	4325	-114	4410	6441	-2030
6 月	362.1	383.9	14.2	359.7	536.7	-177.0
7 月	323.4	347.9	-58.1	388.9	515.2	-126.4
8 月	346.2	381.6	-28.2	336.7	541.6	-204.9
9 月	350.3	374.4	-18.8	376.8	618.2	-241.4
10 月	362.0	369.1	-20.2	389.9	590.1	-200.1
11 月	366.2	382.2	12.1	396.2	578.5	-182.3
12 月	361.1	354.1	8.7	385.3	525.3	-140.0
2018 年						
1 月	365.4	352.4	-41.3	405.3	597.2	-192.0
2 月	336.6	351.9	-15.3	382.1	529.1	-147.0
3 月	385.0	406.7	-21.7	441.9	601.8	-159.8
4 月	373.0	394.4	-21.3	394.2	554.1	-159.9
5 月	393.7	412.5	-18.8	405.2	538.9	-133.6
6 月	399.0	399.9	-0.9	417.2	560.1	-142.9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888	830	59	2178	1507	670
7 月	70.3	63.7	6.5	187.7	124.7	63.0
8 月	78.7	73.6	5.1	194.8	138.8	56.0
9 月	78.5	74.3	4.2	186.7	134.9	51.8
10 月	75.8	72.7	3.1	188.8	136.8	52.0
11 月	82.8	73.4	9.4	166.9	131.4	35.5
12 月	77.6	67.0	10.6	176.0	126.0	50.0
2018 年						
1 月	66.0	88.5	-22.5	170.3	142.0	30.2
2 月	76.0	76.5	-0.5	174.1	143.9	64.2
3 月	82.9	75.1	7.8	202.3	138.1	59.2
4 月	73.1	72.1	1.0	197.1	137.9	59.2
5 月	82.0	79.0	3.1	191.3	132.6	58.7
6 月	82.8	73.8	9.0	202.0	143.2	58.8
7 月				228.7	186.4	42.3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2991	4473	-1446	3535	2378	1158
7 月	223.9	339.5	-115.6	346.8	208.5	138.3
8 月	233.0	360.5	-127.5	390.8	224.2	166.6
9 月	286.5	379.2	-92.7	308.0	205.6	102.4
10 月	228.5	374.6	-146.1	315.8	215.0	100.8
11 月	260.9	404.2	-143.3	334.4	219.0	115.5
12 月	276.8	419.1	-142.3	375.3	241.5	133.9
2018 年						
1 月	249.6	406.6	-157.1	336.9	164.0	172.9
2 月	260.3	378.7	-118.4	313.3	190.4	122.9
3 月	291.7	428.0	-136.3	368.7	218.3	150.4
4 月	256.4	396.0	-139.6	362.5	209.3	153.2
5 月	289.7	434.6	-144.9	365.1	213.6	151.5
6 月	271.5	442.9	-171.5	365.7	210.2	155.6
7 月	257.7	437.9	-180.1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5737	4785	952	4095	4322	-227
7 月	488.3	386.1	102.2	321.6	346.2	-24.6
8 月	471.1	405.5	65.6	357.8	396.2	-38.4
9 月	551.2	417.0	134.2	338.2	367.3	-29.1
10 月	447.9	378.6	69.3	367.2	400.7	-33.5
11 月	497.1	420.1	76.9	374.9	381.1	-6.2
12 月	490.4	435.3	55.1	359.8	370.0	-10.2
2018 年						
1 月	492.3	457.4	34.9	307.2	361.2	-54.0
2 月	445.3	417.1	28.2	350.8	350.5	0.3
3 月	513.3	448.8	64.5	394.5	387.0	7.4
4 月	498.7	435.6	63.1	371.8	384.4	-12.6
5 月	507.1	443.3	63.7	391.8	418.3	-26.6
6 月	511.3	449.9	61.4	374.8	393.9	-19.0
7 月	518.5	449.4	69.1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5503	5899	-396	3174	2595	579
7 月	468.8	485.7	-16.9	271.1	217.4	53.7
8 月	463.7	491.8	-28.1	277.7	220.6	57.1
9 月	496.3	526.2	-30.0	289.0	222.8	66.2
10 月	464.6	503.8	-39.2	275.4	223.4	52.0
11 月	502.6	553.2	-50.6	288.8	229.1	59.7
12 月	490.8	553.5	-62.6	295.1	233.7	61.4
2018 年						
1 月	483.9	521.4	-37.6	273.8	247.0	26.9
2 月	337.0	387.5	-50.5	223.7	194.5	29.2
3 月	486.7	546.1	-59.4	299.9	239.9	60.0
4 月	460.0	498.5	-38.5	267.3	225.8	41.5
5 月	485.4	521.3	-35.9	291.2	247.1	44.1
6 月	482.2	532.3	-50.1	282.5	230.4	52.1
7 月				283.6	261.2	22.4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2178	1951	227	1686	1569	117
7 月	183.3	164.5	18.7	136.1	138.9	-2.7
8 月	192.1	168.7	23.4	152.3	135.1	17.2
9 月	185.9	165.5	20.5	145.6	127.8	17.8
10 月	194.6	169.9	24.7	150.9	142.4	8.5
11 月	200.2	176.3	23.9	153.2	151.1	2.2
12 月	194.5	176.8	17.8	147.9	150.9	-3.0
2018 年						
1 月	209.3	184.8	24.4	145.5	153.1	-7.6
2 月	179.8	156.8	23.1	141.3	141.9	-0.5
3 月	216.4	178.8	37.6	155.9	144.6	11.2
4 月	216.8	183.3	33.5	145.4	161.6	-16.3
5 月	207.2	186.7	20.5	162.1	176.6	-14.5
6 月	196.7	181.5	15.1	129.7	112.7	17.1
7 月				162.4	182.7	-20.3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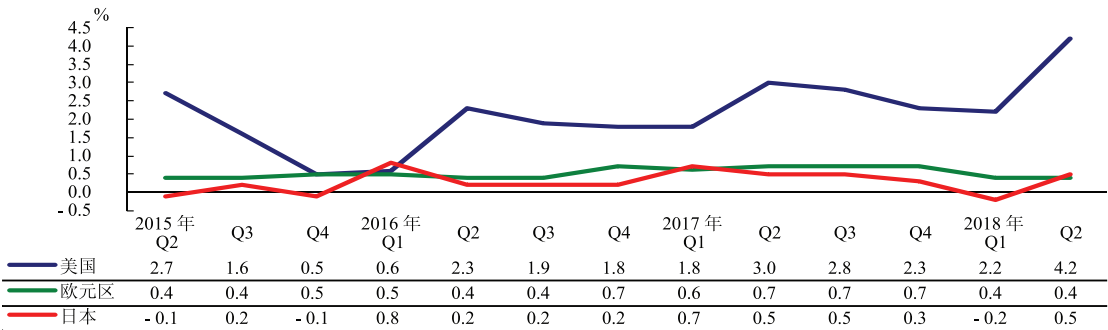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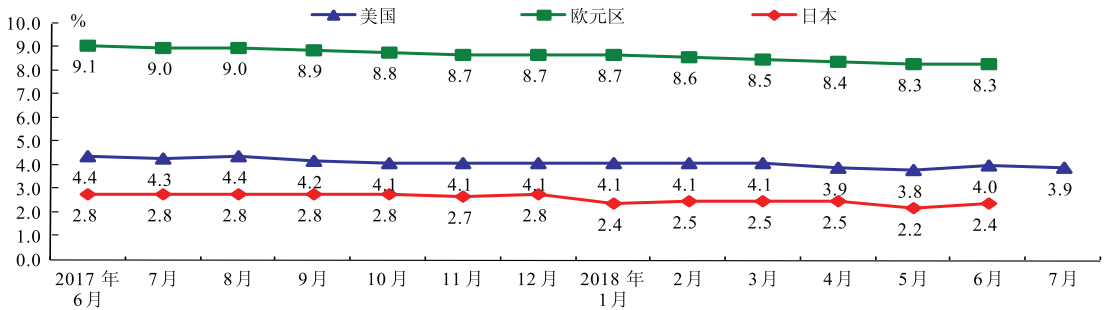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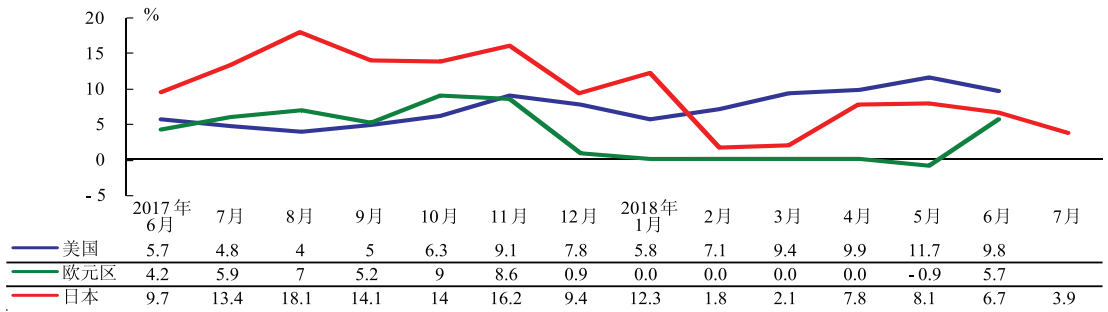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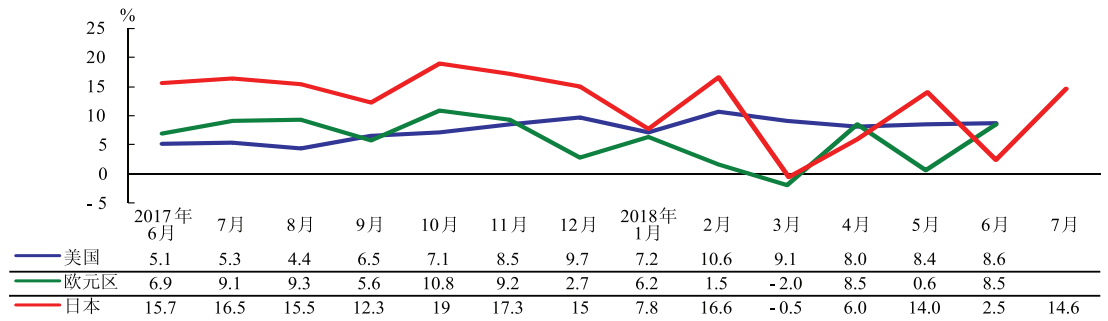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Research on the model city of service outsourcing to promote the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ervice industry

Wang Xiaohong and Xie Lanlan

The demonstration city is the leading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In demonstration cities,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s scale has expanded rapidly, its business structure has been optimized, its industrial orientation has been clarified, its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its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s a policy innovation highland of China’s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the demonstration city has remarkable policy integration effect. Thirty – one demonstration citi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radiating and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economy,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in service industry and pushing the opening up of service industry.

(2)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n Gonghua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time and space as a whole, which is also the law of time and spac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a dialectical unity of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spatial specificity, a dialectical unity of gradualness in time and selectivity in space, and a dialectical unity of space – time differences and goal consistency. This is the intrinsic space – time development law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 up policy, from being put forward, being implemented to being promoted in an all – round wa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law of space and time development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is helpful for us to look back and better analyze the dangerous beaches, deep pools, rapid currents and slow currents we have experienced in the past, after touching the rocks and crossing the river. It will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us to go through bigger rivers and more dangerous beaches in the future.

(3)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developing consumption—oriented economy

Song Ruili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hina’s economy is gradually entering the stage of consumption – oriented developmen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promoting consump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basic role of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actors such as income, technology, population and policy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consumption – oriented economy in China, but they are also restri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relatively

slow reform of consumption system, the low proportion of labor remuneration,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consumption technology, the large amount of consumption – oriented investment arrears and the outflow of high – quality consumption purchasing power. For these reason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suggestion of developing the five – force – combination of consumption – oriented economy.

(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ree largest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world

Li Di

After comparing the three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of the NAFTA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Mexico as the core, the European Union with Germany, France, the Netherlands and Italy as the core and the East Asia with China, Japan and Korea as the core, we can find that the current thre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have such features as: the trend of centr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being obviou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networks in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being obvious;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being further specialized and networking; the service trade being mainly concentrated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e innovative ability presenti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North America, European Union and East Asia; and the goods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East Asia being increasingly active. Factors such as Britain’s departure from Europe, the amendment of NAFTA and the US tax reform act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three major networks. At the same time, “Internet + manufacturing”, new changes in circulation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will promote new adjustments in the world’s three largest production networks.

(5)Competition for the leading role of innova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Trump’s trade war against China and China’s coping strategies

Zeng Zhimin, Lu Pengqiao and Zhang Ruomei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ep adjustment of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overall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aunched a trade war with China since 2018 on the basis of a huge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Unlike American economic nationalists, the US trade deficit is caus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s, the US export restrictions on high – tech industries and the unique position of the US financial market. On the basis of Sections 232 and 301 investig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a trade war which is clearly in violation with global trade rules. Its strategic intention is to consolidate it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glob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economy and to curb China’s development in key area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acing the systematic containing strateg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ipul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trade war, enterprise war and talent war, China must speed up with a clear – cut bann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 with endogenous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furth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6)Research into the mechanism and practice of free trade port construction in China

Wang Zhenzhen, Chen Ting and Zhao Furong

As an all – round change in the flows of goods, capital, informat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law and regulation, the free trade port has the potential to drive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free trade port construction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location advantage, system innovation, logistics network, education system and national policy.

Taking international famous free trade ports of Shanghai, Hainan, Hong Kong, Singapore, Dubai and Busan as exampl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 free trade port.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free port construction in China.

(7) The impact of tariff cuts on employment changes in China——An analysis based on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perspectives

Zheng Xin and Xue Tongrui

Tariff cuts have reduced the prices of foreign imports, having an impact on employment in the regional labor market. Becaus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and the degree of trade opennes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rovinces, the impacts of tariff cuts on employment vary. By sorting out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dicators,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degree of China's regional tariff reduction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ariff reduction on employment changes in regional labor market throug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es. On the whole, tariff cuts inhibit regional employment growth, but regional differences exist. The deeper the tariff cuts, the greater the negative impact on regional employment changes, while the lower the degree of tariff cuts, the greater the increase in employment or smaller the decrease in employment.

(8) The Olympic economic effe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ice and snow economy in China

Tian Dong

The hosting of the Olympic Games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host city, enhance the brand value of the city, stimulate the short-term growth of tourism and sports industry, and release the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of the host country.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bring about the crowding out effect of short-term investment growth, inadequate utilization of venues and facilities, and debt expansion and other risks. Relatively speaking, the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shows that hosting the Winter Olympic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form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ice and snow economy,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Olympic economy.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ice and snow economy in China, we should combine with the movement trend of global ice and snow sport participants, focus on cultivating and constructing high-quality ice and snow resource areas and ice and snow consumption market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form a first-class ice and snow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brands.

(9) From vaccine safety to public safety: worries and governance

Jia Kang and Ou Chunzhi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ublic safety problems arising from vaccines as quasi-public products, expounds the reasons why vaccines must be universally vaccinated and the necessity to combin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to solve the safety problems of vaccines, proposes to optimize the concession management and put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including bringing the safety mechanism of vaccines into the arrange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ystem.

Editor: Huang Yongfu